

俄國革命命運運動史綱

• 譯 蘭 季 吳 • • 著 基 斯 夫 洛 格 波 •



• 行 發 局 書 命 生 新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5457B

~~272252~~



俄國革命運動史綱

吳季蘭譯

波格洛夫斯基著



新生命書局發行



著者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的內容與初版不同之處，撮其大要，不過一端。作者說明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發生的原因，估計這個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并找出了這個帝國主義之民族的根源——可是，自有列甯和希爾費丁的名著*以後，有一部分便已成陳詞舊語了。但認定這個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這便是在世界關係和世界經濟的平面上去找這次戰爭的原因，——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中，民族的成份，只能有附帶的和次要的作用。二十世紀初葉遠東的衝突，

*係指列甯的帝國主義及希氏的財政資本二書——校者

我在別處也曾經說過，實際上，就是德國帝國主義，和英美帝國主義，雙方前哨的短兵相接罷了。俄國和日本是他們的工具，俄國和英國爲爭奪近東而起的舊仇及德俄在一八九五年干涉日本侵掠亞洲大陸的傾向便是此次戰爭的導火線。俄國帝國主義的本身的利害關係，只有次要的意義，——猶如他們在一九一四年的衝突中，所起的次要作用是一樣。俄國的資本主義，在此地既甚積極，可是，這是舊的商業資本主義，而不是新的財政資本主義，且不是新的工業資本主義。

『商業資本主義』或『商業資本』的理解，在我看來是十分明瞭，而無絲毫的迷惑。可是，人們研究政治經濟的壞習慣，常不顧具體的事實，不識歷史的遠景，殆其結果，人們便『迷惑』道：商業資本怎能從一般的資本主義的系統中分割出來，這是什麼意思呢？不知歷史爲何物的人們——然他們又是歷史教師，——開口便說道：『商業資本』始終不能作爲歷史的範疇。歷史知識之退化，一至於此，殊可慨嘆。二十年前，所有中學生都顯然知道，曾經有個時代，交換是集成的，（海上貿易，爲當時技術的基礎，這種『偉大的』海上貿易卽在中世紀時所造各種船舶，亦能載運千百萬普特的物質，）然當時的生產却還是小規模的。

爲剝削農民化身的小生產者起見，商業資本家便和大地主聯合起來，造成了一種有等級的專制的國家制度，——此種制度，在俄國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紀的初葉。較之任何地方，都要久遠。但若把這種制度拿來與現代的商業資本混爲一談，則與以國家政權和專制主義混爲一談是同樣的錯誤，當今之世，在各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商業資本并不需要什麼專制主義，亦不需要什麼農業制度，——商業資本，通常是假手於經濟，經過市場而活動，不用『非經濟的強制』：然而在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尙鞏固之地，在商業資本尙帶有半自給經濟之地，那裏的商業資本却仍不惜用盡一切機關的力量施以直接的壓制，他的機關內，有專制主義、官僚主義、地主等等，如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國歷史中我們所能看到的一樣，現在殖民地的國家，也正是這樣的情形。

本書此次再版，實質上，我所應有的主要的說明，就是如此。第二個大的變更，都帶有校訂的性質爲多。在本書初版中，評論俄國農民及其與地主的鬥爭在歷史上的作用，作者曾以自己的言詞去解釋列甯的意思，但是有些人不明白列甯的意思，反而詆毀本書所引用的章句，謂爲非馬克思主義的邪說，作者實在認爲可恥，作者爲免除重演這樣的笑話起見，在本

書中，全引用列甯的原文。

其餘的更正，都是無關重要的，或則純粹是文體上的性質。

波克洛夫斯基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譯者序言

波克洛夫斯基是俄國有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大歷史家之一。依里奇曾經稱他是俄國的麥林格，他的著作價值當然用不着說了。他關於俄國的歷史著作是很多的；并且每種著作都表現了他的特別手腕、特別方法和特別見解。他現在年近六十歲了，然而，他的研究興趣，還是特別高；他時常發一些警人的歷史文章，使許多讀者，一見感覺新奇或難懂，然而，牠是科學的，結果，博得許多研究歷史的人的贊賞。

就這本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俄國革和運動史綱說吧，也是有許多特別獨到的見解。例如他說，日俄之戰，俄國當時的原動力并不是帝國主義，而是俄國的商業資本；又說二月革命

是工業資本對商業資本一種克服，這都是很值得尊重的見解，讀者在本書中去了解好了。

這本書是作者在莫斯科政治大學的講演稿，在系統上，固然沒有特別標出每講的題目，可是在材料上，是很豐富的；說到材料豐富，恐怕讀者讀這本書時會感覺統計太多，很乏味吧，然而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研究歷史的必需手段；不錯，歷史是人造的，但歷史又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研究某個時代的歷史而不從某個時代的經濟着手，是不會得出科學的結論。

本書的長處即在此，牠從數目字上說明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俄國革命運動一起一伏的原因；牠從數目字上說明了沙皇的統治是什麼一回事和其對內對外政策的實質；最後，牠從數目字上說明階級關係的轉變等等，也是很有趣味的。

總之，這本書所用的方法，初看是很驚奇的，其實是很自然、很科學的。我們把牠介紹給中國研究歷史的人們，不僅可以瞭解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俄國革命運動的經過，並且可以作為研究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革命運動的借鏡。

歷史是很無情的，中國最近的歷史前途怎樣呢？我們在這本俄國革命運動史裏面或者可以找得出一個答案吧？

第一講

我講授俄國歷史的計劃，我自己以為有些陳舊了，這個計劃，是我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在舊史威特羅維亞講授俄國革命運動史所用過的，這個計劃，由十九世紀前半期十二月黨講起，沒有講到十月革命就告結束了。近來你們也許聽過我在史威特羅夫大學所講的十月革命史。但這門功課此地有另一位講師擔任，雖然如此，我現在所講的功課，却仍以十月革命為出發點。

近來在歷史的功課中，我們應特別注意現代史，所有從事什麼新的發明，才不致有誤

會發生，因為每個馬克思主義者，不管其說的什麼和罵的什麼，縱使論及石器時代，亦不能不從當代着想，爲此之故，我們就常受資產階級教授的攻擊，我們不能無當代的印象，這不是我們自鳴得意，實在非如此不可，我們敢大膽說一句，只有從當代着想，才能估量已往。這一點當然要令資產階級的教授，全然神經錯亂，因此他們便武斷說我們都不是學者，而是政論家，并且是無聊的政論家，所以說我們的著作，完全沒有什麼意思。這完全是笑話，如果某個時代的社會學，確實是科學的方法，那末，只有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別的方法都不是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不願意多費時間；你們可以讀一讀「俄國文化史略」，此地只值得引證幾個例子，證明資產階級最聰明和最靈敏的歷史學家，當其誠懇的想了解各種事變的時候，每次都要無意的站在歷史唯物論的見地之上，請看三年前，——一九二三年春天，在布魯舍爾所舉行的最後一次的歷史學家國際大會，便可一目瞭然，不消說，那裏都是些資產階級的教授，你們可以推測，現在的布魯舍爾是協約國的第二首都（在大陸上協約國的第一首都都是巴黎，第二首都都是布魯舍爾），簡直不容任何共產主義者參與其間；那裏的確也沒有一

個共產主義者，然那些大學教授，所做的報告却完全是根據歷史唯物論的精神，有一位教授報告科學和藝術的復興，中世紀末古典學派的復興，說這是商業資本的影響。我是研究商業資本在俄國歷史中的作用的人，他這個說明，對於我當然是特別快愉的。但他所論及的不是俄國，而是西歐。

另一個例子，復證明他們闖入了我們所打開的大門，——在這個大會上，有一種這樣的思想，說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基郎特派（關於這一點，我們是當然知道的）是階級的政黨。這一點在我們看來當然不是新的，——庫諾夫和考茨基當其榮盛之年，早已把這個意見確定了，——而資產階級的教授却把這個東西供獻於國際大會，實屬新奇之至，在我們和你們看來，這都是些老生常談，然在他們看來，却是很時髦的真理，他們說：基郎特派是代表某一階級利益的政黨，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與你們所知道的俄國立憲民主黨相類）。

像這樣的例子，一天一天的增加，這是證明要了解歷史，除了我們老生常談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以外，沒有別的道路，並且證明現在資產階級的學界中，他無意的廣用了這個方法。根據這個觀點，我便要重複一句，要研究當代，必須觀察已往。這樣一來，便可使那些懼怕

學院化而與現代相隔離的讀者們，安心無慮，同時，復可證明我在上面所說的話我這門功課的計劃有些陳舊，亦委實是不錯。

先從當代講起吧。二十世紀初葉以前俄國革命運動的軸心究竟是什麼呢？我們的工人革命，——我們大家都曉得，同時講授十月革命的教員也對你們解釋過，——是世界的現象。這不僅是一個在狹小範圍內所能說明的民族革命，這不僅是完全由俄國的條件，由俄國的空間與時間諸條件所產出來的一個革命。帝國主義的戰爭，決定了革命破裂的時機。因此之故，在我們俄國，革命的爆發和社會主義的轉變，便較其他各國為先——但俄國工人革命的本身，却仍是世界工人革命的開端，國際工人運動史中的一段插話。倘若我們要探索俄國革命之地方的與民族的根源，那末，我們當然無須求之於工人革命，而是要在農民革命之中，要在土地轉移於農民手裏的時候去追求，才有頭緒。土地歸農民，是革命唯一的結果，且為資產階級所同情。昨天我剛剛讀了伊蘇果也夫的文章，他說：不管俄國如何反動，而土地歸農民手裏，是必須同意的，這在俄國的社會中，已經鑄成鐵案了：土地不能從農民手裏奪回去。此為伊蘇果也夫所宣告同意的，此外他以為隨革命而來的公民平等和廢除各種等

級，——不管你用什麼法西斯蒂的鐵，也是不能剷除，不能撲滅的——這是必須表同情的。這都是我們資產階級所願承認的事實，——土地歸農民，——這乃是社會主義以前的俄國民族革命的軸心，這不是世界運動史中的插話，而是俄國特有的現象。列寧說：『土地問題，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礎，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民族的特性。』（『見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俄國革命中的土地政綱』的結論。列寧全集第九卷，六一四頁）

關於土地歸農民的意思，列寧說得非常之確切。他說：地主經濟消滅之後，自由的資本主義的農民羣衆，即爲資本主義發展之基礎，因爲地主經濟，在經濟上完全是反動的，而資本主義的農莊成份，是開我國農民經濟史的先河。在此種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之上，因國內的市場日益擴大，與全體人民的生活程度、氣力、動機、文化都蒸蒸日上之故，資本主義的發展定要自由得多，迅速得多，以至於無限量。』

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時列寧的主張便是如此。現在經過十年了，我們看待資本主義已經不同。我們當引着農民經濟走完全不同的河道。在這個河道中，我們所達到的暗礁，是『農夫的資本主義』。此事毋庸再事發揮，你們也與我同意的，——這是最大不過的實體，

圍着我們，四方八面壓着我們的實體。

這是事實——俄國農民欲爲獨立的小生產者，——這是什麼呢？這是俄國全部土地歷史（至少始於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葉）的軸心。三百年來小農經濟與大地主的經濟爭鬥——都是爲生存的權利而爭鬥。

本來農奴制度：絕不是像庸俗所說一樣，是由於流蕩的農民受土地的束縛而產生的，你們讀一讀克流切夫斯基的著作便可知道。這個相傳已久的俗譚，不特爲馬克思主義者所傾覆，且久爲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所破壞。羅石可夫曾經揭破過此種俗譚，步其後塵者，有純粹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立憲民主黨人巴夫羅夫、西尼文斯基在其『俄國古代的封建制度』一書中也曾把俄國十六世紀的農民是租借貴族土地的流氓底俗譚完全駁得體無完膚，這個俗譚是在十九世紀時偽造出來的，該俗譚欲證明歷史上著名已久的『二月十九日偉大的改革』地主掠奪農民，是合理的。

爲要說明地主何以有權奪取農民貧瘠寸土，則非造出一個理論不可，說古來的土地是貴族的，農民不過是租借這個土地罷了，倘若如此，當然可以減少佃戶的土地。實際上不是這

樣的，二十年前羅石可夫便已證明過十六世紀時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領有制都是發生於小的自由農民土地私有制的廢址之上，此等遺跡，我們在當時的律書上可以找出很多。——農奴制度的法律與地主的行為在使農民的私產日削月割，地主們奪取農民的土地，使農民無法經營其經濟。在此種基礎上，於是便爆發了許多曠日持久的農民革命；舉世紛亂，幾無寧日；始則有烏克蘭的哈米林茨基的革命，繼則有史亭克拉新的暴動，最後，在十八世紀末葉復有普加齊夫的騷動。

所有這些都是農民為求獨立的小主人的權利而舉行的死戰，而地主則盡力驅除農民，使農民由獨立的小主人變而為有一片『份地』的佃農，使農民經濟僅足糊口，不料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及慈善的馬思羅夫居然認為這是自然的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現象，但實際上，這却是長久的偉大的鬥爭的結果。經過『偉大的改革』以後地主們才打破農民本來僅足糊口的地位，迫得農民由出賣食物的小生產者，一變而為只在地主田莊上為市場而生產食物之人了。此時農民只為地主而生產剩餘生產品，而自己不能佔有這些生產品。這個完全不是自然的現象，農民始終不能甘心的。記得一九〇五年，小生產者的天性在農民的腦海中非常深固。二

十世紀初葉，農民復渴求土地，爆發起來與地主相搏戰，幸得此次國內有工人運動可以利用；所以農民的鬪爭，比前較為順利。至一九一七年時才達到他們的目的：地主和寄生蟲大遭失敗，地主的土地於是亦歸於農民手裏，數世紀以來農民渴求而不得的土地，卒歸農民所有，而不依賴貴族了。

上面這個例子，使你們顯然可以知道，你們如欲了解現代，則非深究已往不可，我們現在所講的功課，只限於十九世紀，此實因我們的時間無多，你們是工作者，你們對於過去不久的事實，——由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葉的事實，必須認識；而認識這個事實，必須時間：所以你們要寶貴時間，因此我們現在的功課，便以十二月黨的革命做出發點，換言之，便是從那一個一目瞭然的軸心講起。十二月黨人不能離開他們所處的時代，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對於十二月黨人是全部景緻的中心。不寧惟是：他們所處的時代愈益緊急，則土地問題在他們的政綱和策劃中的作用也就愈大；他們所處的時代愈安寧，則土地問題愈可置之高擱。十二月黨最主要的觀念，最注意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土地問題和農奴制度的問題。在『北社』中的土爾克尼夫和『南社』中的比斯特爾，是十二月黨的運動中的最重要的

和最深謀遠慮的人物，他們兩人心目中所最注重的，差不多全是這些問題，這個軸心既已反映於他們的政綱和策劃之中，那麼，這個軸心便自然會昭然在人耳目。十九世紀三十年間革命運動的意義即在於此。

要了解此時的革命運動，及十九世紀所發生的一切革命鬭爭，我們必須愈致力於想象，我認爲十六世紀的農奴與一六一七年蘇維埃時代的農民的區別，你們是不難由推想而知，這種推想的作用，在現在非常需要。因爲，關於十九世紀革命運動的歷史，大部份都是從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智識份子的歷史學家，不消說，是資產階級的，因爲智識份子，不成爲一個特殊的階級，可是，智識份子自成一派的特點却在這個過程中完全表現出來了）。其觀察歷史的過程，——顯然是根據個人主義的觀點。

十九世紀的革命運動，在他們看來，是爲自由而奮鬭的。可是自由不是目的本身，而是爲實現最高目的爲轉移到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這個事實我們和你們是非常明瞭，非常清晰的，——十九世紀後五十年代的資產階級，雖也知道社會主義，而且大談特談社會主義，這是事實，然而資產階級不知自由是個手段，這也是事實。爲自由而與專制政體實行鬥爭，

資產階級以爲這是目的本身。這個目的的本身，如何判定呢？自然的，求自由的志向，是人類天賦的情感。這是說什麼呢？這是資產階級的歷史觀之生物學的根源，誰都知道的。人生欲自由，這個自由的趨向，乃小生產者求獨立的趨向，在俄國說來便是農業、生業者、農民，在工業方面的小生產者，便是小手工業者。小生產者求獨立的趨向，在鄉村中每爲大地主和私有者抑制，在都市中則爲大資本所屈伏，小生產者求自由的傾向亦即伏根於此。——關於這一點資產階級及代表資產階級說話的智識份子當然是不同意的。他們說，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他們的解說，在他們看來覺得更要複雜得多科學得多。在此種見地之上於是便創造了俄國革命史中現有的奇談。人與人發生鬥爭，因爲有些人們知道什麼是自由，有求自由的趨向，所以才起而與壓迫他們的和剝奪他們自由的人們相戰，首先即與君主專制相戰。因爲在君主專制之下，不特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在政治上沒有自由，即農民在公民上也是沒有自由的（農民就是農奴），這自然是因爲君主專制，政治元首，與農奴制度有密切關係有以致之。由此你們便可以在我的及一般的著作中遇着一個這樣的名詞，——即所謂農奴的國家。當此之時，凡有求自由趨向之人，必須與這個猛獸決鬥，——這個猛獸，就

是君主專制所封的農奴制度。十九世紀中葉擁護自由的戰士，已經粉碎了這個怪物之一部，獲得了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號的農民解放，嗣後，此等戰士竭力要把這怪物當頭一棒，作一最後的打擊，事在十九世紀後五十年和二十世紀的初葉。最後一九一七年二月推翻了君主專制，此時的資產階級，特別是代表資產階級說話的智識份子，便欲托庇於自由神的王國內，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到了這種程度，他們絕對想不到，到了這種程度，在他們看來，是奇怪的、盲目的、野蠻的，所以他們痛哭了，流淚了，宣誓不要這種革命，說這種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直到現在，他們才承認（我說過的）革命之某幾種結果：土地歸農民與公民平等。此外他們就不肯再越過一步了。至於談到自由一層，他們便垂頭喪氣，失望已極，他們甚至情愿受亞力山大第三底統治。他們中間曾有一個寫過，最好不過的期望，——便是亞力山大第三的復辟。

我們且不理他們，不管他們的妙想天開罷。這裏是一九一七年的小史，這個小史，——是一個極嚴厲的小史，不特對於智識份子是一樣，即對於我上面說過的歷史概念也是如此。他們為自由鬥爭了十年之久，結果他所獲得的自由，完全不是他們心目中所夢想的，而是別

的自由。在一九一七年事變的光天之下，所有這些自欺欺人的概念，在不偏不倚的歷史學家看來，是瞭如指掌的，實際上，沙皇是地主的沙皇，農奴國家之元首，只有在農奴制之下，才能存在。可是沙皇并不常常代表地主的利益，這種事實，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究竟作何解釋呢？沙皇曾經解放過農民：沙皇解放農民這個事件在他們看來，便是由於擁護自由的戰士攻擊了沙皇主義所得來的讓步，但那些戰士恰恰在這個時候，很少顯露頭角，因而便造作種種政治的和經濟的理論，來解釋沙皇主義之所以在一八六一年迫不得已實行讓步的原故，藉以自圓其說，他們說，沙皇所以讓步是因為國家要建設鐵路。但是國家何以不能在農奴制度時代建築鐵路呢？於是又有另一種說法：沙皇所以要解放農民，是因克里米的戰爭，意法英人大敗俄羅斯之故，克里米戰爭的失敗是農奴制的俄羅斯孱弱無力的表現，——因此，便需要強大俄羅斯使俄羅斯能角逐於國際鬥爭之場。這種說法，多少是矯柔造作的，費盡心血力求解釋，而不指出其最主要點，——例如，整個十九世紀君主專制所實行的保護關稅政策，重征外國商品的賦稅那回事情吧。這件事情對於地主是否有利呢？這是極端不利的，地主必須購買一切用品，——他和他的家眷穿慣了呢絨和絲綢，著慣了國外的衣服，用慣了國外的

家具等等，——購買此等物品付錢要多三倍；因為商品入口時付了很重的關稅。地主時常痛哭流涕，反抗這個政策。在十九世紀初十年間，地主無時不反抗這個保護關稅政策，整個的十九世紀，關稅非常之重，只在短促的時期內由十年末至七十年末，才算例外（正當地主在表面上大受致命的打擊，因剝奪地主的農奴取消農奴制度之時）。

矯揉造作的解說，應該細加思索，決不應毫無考慮。個人主義解釋十九世紀的俄國史，是為自由而反抗君主專制的鬥爭史，而對於君主專制的本身的解說，却說他不是農奴國家底元首，——此種解說，不甚深刻，有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使我們依然迷惑莫解，因此，我要重複一句，我們應當多致力於想像與推測去找問題的答案。為求自由而反抗君主專制的鬥爭，實質上說來便是兩種資本主義形式的劇烈鬥爭，即到處蔓延的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的鬥爭，這個現象，是世界的，絕不是俄國特有的；法蘭西的大革命，便是這個鬥爭中的一段小史之一，一八四八年德意志的革命，也是這個鬥爭中的一段小史之一。這個鬥爭，只有在英國才沒有這樣利害。因為英國的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非常僥倖，兩者界限分明，——商業資本跑到殖民地去了，在殖民地內商業資本制度一直保持到現在，工業資本則居留於英國，

且在那裏統治着，——由於這種分工，所以劇烈的衝突，才不至時常爆發，十八世紀美國的革命，也是此種衝突之一，另一個衝突則正在發展。我們若把這些衝突除外，則英國的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實可說是，時常安居無事，然而這只是英國的特點。在大陸上，此種衝突幾於各國都有，而衝突較為利害的，則在俄國，因為這兩種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在俄國是非常後進的，且忙於追隨西歐先輩的模樣，在此種急忙之中，這兩種資本主義，比之西歐，便更要毫不容氣的互相蹂躪，互相傾軋，互相抵觸。

你們中間，誰讀過我的『俄國歷史概要』的，當然還記得在俄國境內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鬥爭的歷史，因為這個鬥爭的歷史，是我的著作的中軸，——是俄國歷史的中軸。因此，關於這點，我便不必贅述。我描寫這個情景，只涉及最普遍的要點。商業資本，剝削獨立的小生產者，不參加生產，不創造生產，不組織生產，只依靠非經濟的壓制的助力，他的特點，他的最出色的成績，——在俄國境內不發展，亦不榮盛，——就是種植。如北美南部諸州的種植，就是利用黑奴而種植棉花或烟草，黑奴是這些企業中活動工具之一，此種種植，是商業資本最出色的生產，種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現象，而非封建的現象，這是人工所造成

的資本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及無產階級作工的工廠，正立於相反的地位，其不同之處，你們自己亦可想而知。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在我們俄國有些種植經濟的萌芽，有些地主使其農民變為月工，換句話說，每月給他一定的食品（非常之少），而奪取他所有的土地，取消其所有的財產。當時的地主，有些變為與種植業主相似，而農奴的農民，則有些變為與黑奴相似。這種情形常反映於俄國的文學中，第一，有描寫農民吃了這些地主的虧而失望至極的小史（第一次的小史，就是拉齊車夫作的『由聖彼得堡旅行至莫斯科』。第二，有吉爾齊諾夫所作的小史『是誰之過歟？』的小說，該小說中有一特殊的名詞即將軍『黑奴』之名。這是此種過程中所表現的魑魅魍魎，然此種過程的本身在俄國却沒有充分的表現出來。俄國的地主經濟對於種植事業從未達到過高度的發展。實際上，地主能使農民從僅足糊口的經濟變而為具有一片分地的佃農，就算是心滿意足了，——農民起初并不是佃農，而是農奴，嗣後方變為佃農。然要施行此種手術，便必須對於農民大用特用非經濟的壓制，故商業資本為要剝奪獨立的小生產者的分地，為要掠奪小生產者所產生的剩餘生產品，便必須創造一個偉大的官僚主

義的國家機器而以門諾馬河夫爲首領，載着門諾馬河夫冠冕走遍於俄國領土的，就是商業資本。在他看來，地主和貴族只是他的代辦人，只是他的機關而已。所以『俄國境內的主人翁』對於俄國貴族的態度，有時毫不客氣，——雖然這個主人翁有時回憶自己，也是貴族，實際上商業資本的勢力，有左右一切之概，比之地主的私有財產之勢力，更爲雄厚，更爲廣大，所以他自視後者爲卑不足道，且對待他的機關亦毫不客氣，好像我們對待自己的蘇維埃機關一樣：裁減和更動一定職員并支配一切事業。君主專制制度對待地主和貴族，也是如此，因爲這是他的機關，商業資本是必要的，——且他供給了大批的入口稅，破壞了地主的荷包。資本主義是必要的，不僅商業資本主義，即一般的資本主義，也是必要的。必需解放農民，——地主雖然在呻吟嘆息，雖然，不是所有的主人都完全有利，但農民也終於解放了。

倘若我們以這個觀察，去觀察君主專制乃政治上有組織的商業資本主義，那末，我們就懂得革命運動中一切的悲劇了，工業資本是由於商業資本自然而發展起來的，——由商業資本變而爲工業資本，你們在馬克思的著作和你們的政治經濟講義中都可以知道的，用不着

我來多說，——自然，工業資本的發展，要有完全不同的條件，這是必要的。工業資本要組織生產，因此，他便無須乎非經濟的強制。工業資本是生產過程中的主人翁，但他無須乎一切人工的援助去束縛羣衆；我在其他的教科書上，曾經說過，工業資本壓制人們的手段，不像商業資本一樣。商業資本是椎擊人們的背部，工業資本而是餓其肚腹。他的手段，更要巧妙，但無論如何，總不出乎人的體力之外。

工業資本不要非經濟的壓制，這是君主專制絕大的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不特在俄國是如此，在世界各國亦莫不皆然。歷史是非常刻薄的東西，所有現在歷史過程中所不需要的，便立刻變而爲有害的和令人難堪的東西，因此便非拋棄他不可。這是俄國君主專制自己親身所閱歷過的。實際上講起來，尼古拉第二客觀上並不比其先王惡劣，何以見得呢？他之爲人，狂亂不如巴夫拉，其殘酷不如尼古拉第一，無論何種場合，他總不劣於他們，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巴夫拉第一雖遭厄運，然君主專制沒有因此顛覆，而尼古拉第二在位三十年中並沒有遭到什麼厄運，後來他死於不幸。這也是對外政策的關係使然，而不是對內政策之故：不是敵人致他死命，而是他自己因對外戰爭失敗，致自戕其身。這樣看來，尼古拉第二是不劣

於其先王，然而歷史恰恰對他刻薄，而不對他的先王，其故安在，很明顯的，因為尼古拉第一和巴夫拉第一是當時的歷史所需要的，因為當時是商業資本統治之秋，是商業資本如花盛開之際，資本主義須要此種元首，而在二十世紀初葉那就完全不需要了，歷史既不需要他，對之自然也就完全不姑息，好像飛輪把無用之物，從機器中滾拋出去一樣神速。工業資本主義的系統，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系統，不要非經濟的壓制，而須要別種東西，便是自由的無土地的來往自如的工人，能夠時常調動的勞動後備軍。橫塞於工業資本主義道路之上者，是農奴制度，此即十九世紀前五十年間工業資本主義之所以必須沿此路線進攻之故，——反抗農奴制度，——一八六一年，工業資本主義已經鑿開了一條門徑。被取消的那一些農奴制度只不過是工業資本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工業資本獲得了產業後備軍，因此便獲得了向前發展的可能。

在二十世紀初葉，工業資本已經不要商業資本的政治組織了。這個組織，在工業資本主義看來，是有莫大束縛；他就依靠已經開始的工人革命起而反抗這個組織，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他居然借工人革命的助力，把君主專制完全消滅，但同時他又消滅了他自己——

這一點在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腦海中，是從來沒有夢想到的。古代聖賢說得好（我不能舉其姓名）倘若人們確知其將來，那末，他們便會失掉他們一切踴勉從事的動機。只是因為這個將來他們不知道，所以他們才會努力的去幹。因此工業資本主義在實質上，便不期然而然的替社會主義，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這不特在俄國是如此，即在世界各國，亦莫不皆然，無怪工業資本主義，當其創業和作戰之時，竟不知為誰辛苦為誰忙了。

倘若我們以這個觀念去論十九世紀的革命鬥爭，那末，所有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同時，又是擺在資產階級先父先祖前面的問題，指顧間便可了事，且自然而然的可以解決了，然則，實際上，在一八六一年何以解放農民呢？因為工業資本主義和建築鐵路及其他種種關係，必須解放農民；因為俄國鐵路的建築，恰好是我國十九世紀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莫大的動力。

俄國五金工業，即因俄國鐵路的建設而發展起來了，五金工業，是重工業，是一切工業的基礎。這個基礎的奠定，與當時鐵路的建築有莫大的關繫，然而這個關繫，當然不是像史特羅威所說的一樣。在他看來，鐵路的建築，是國家的必要，——是國家要建築鐵路；事實

上，這是爲資本主義往前發展所必要的。鐵路的建築，——是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妥協，商業資本取消了農奴制度，對工業資本的讓步。兩種資本，彼此各表示其意見。商業資本說，好了，我給你自由工人，你要多少我就給你多少，我來取消農奴制度，然後我便要求那些在我支配之下的小生產者的穀物，盡量的使之流通起來。工業資本說，我來替你建築鐵路網吧：這是你從來沒有的唧筒，從來沒有的水管啊。試問你向來有什麼東西？只有河道和運河，只有小百姓用貨車運送穀物，現在將有火車運行於全俄羅斯，你的穀物且能大批的運輸出去，千百萬普特的穀物，可從農民的穀庫一下載出來，多麼好呢。

要使你們能具體的牢記不忘，只給你們一些數目字就夠了。在一八五〇年，即距改革前十年，俄國輸出有以下的數字：三七五、〇〇〇噸小麥，而在一八七〇年，即改革後十年，就輸出了三一、五七三、〇〇〇噸了。黑麥的輸出，在一八五〇年爲九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八七〇年——爲四四二、〇〇〇、〇〇〇噸。

可知穀物的出口，因鐵路的建設而大大的增加了。地主由此得利多少，我們以後再說。地主不是到處得利的，地主得利是有條件的。然而商業資本得些什麼利益，——這是不難明

白的。商業資本的流通如果增加五六十倍，則其利潤當然也要增加五六十倍。商業資本在俄國這樣繁榮，實爲空前所未有。工業資本替商業資本造成種種的可能使剩餘生產品的流通獲得空前的發展。工業資本自己亦因此而得了自由的工人。——這個歷史，是非常明瞭非常簡單的。地主還衣其貴族的錦衣繡服，峨其冠而紅其帶，趾高氣揚，以爲他自己是一個很高貴的等級。從事實業的商人，勢力日益澎漲，有時雖在地主的前面鞠躬致敬，但其心坎裏却已經暗想道：『貴族老頭兒，你爲何一傻至此？』

由這個觀點，我們就懂得我現在要講的第一次革命，即十二月黨的革命。我描寫這個革命，只涉及最普遍的特點。至於此次結黨行兇的歷史我不能詳細解釋，這個歷史，在我的『俄國史概要』書中所講的分量也不少，你們要知道這歷史的詳細，并可看我的『四卷俄國史』，那裏有更多的材料。此地我只講幾句很普通的情形作爲舊事重提吧。

在十九世紀二十五年間，即俄國自拿破崙的戰爭告終以後，馬上在俄國境內接二連三的开始組織秘密社團：始則在一八一四年有『俄國騎士團』，繼之一八一七年有『救亡同盟會』，在一八一八年有『幸福同盟會』，最後，——約在一八二一年就有所謂『十二月黨的

秘密團』，這是一個真正的陰謀團體，當此等秘密社團到了發難之際，——純然是對付王室要人的襲擊，——正是亞力山大第一突然逝世之時，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亞力山大第一突然死於距首都遙遠之地，亞索夫海岸大幹洛克，當時正是俄國無主之日，因為其弟君士坦丁（亞力山大第一無子）早已誓不就王位了，但朝野上下均無人知道此事，其次弟尼古拉巴夫羅維治亦未知悉，因此亦不肯就王位。當此王室凌夷，朝廷多故，實為早已成熟的秘密社團舉行陰謀的導火線。一八二五年舊曆十二月十四日，暴動於彼得格勒，嗣後同年十二月終又在南俄發生暴動。暴動均被鎮壓，秘密社團的社員亦完全被捕并提交法庭審判，結黨行兇的首領，盡被吊死，其餘的人，則處以流刑，十二月黨的一曲長恨歌，於是便從此遺恨千古了。為自由而反抗君主專制的戰士，在俄國是第一次出現，風行十九世紀的俗譚亦從此而感動了後來無數的戰士。這個俗譚之主觀的心理的意義，我不願費辭爭辯；其意義是非常之偉大的，這個俗譚，的確感動了後來不少的戰士。

但是什麼是這部歷史客觀上的根源呢？我們須從高處，——這個高處完全是相對的——探入低處去找極庸常的事實，這些極庸常的事實，是俄國第一次自覺的反抗君主專制企圖推

翻君主專制之革命的基礎，——這個庸常的事實，便是俄國穀物的出口。在十八世紀英國因爲工業革命的關係，英國能銷售大量的入口穀物，而在英國市場上主要的穀物供給人，就是俄羅斯。所以英國的工業革命，竟成俄國特殊的地主田莊革命的出發點。地主的田莊，因此便變而爲出產穀物的工廠。這個變化，起於十八世紀的末季，然特別感覺激烈的，只在拿破崙戰爭以後，即十九世紀二十年之中葉。

小麥的出口，其增長之速，大有一日千里之勢。（黑麥及其他穀物之出口，亦同樣增加）在四年之間（註）穀物的出口，驟增五倍，俄國穀物出口之驟增，勢必引起真正之革命運動。當時地主的田莊比以前倏然要多生產五倍的穀物，輸往世界市場，這正是真正的革命了。秘密社團的發展，也恰恰在這幾年中登峯造極，這兩個事實，彼此不能不有連帶的關係。

此等秘密社團的目的，是什麼呢？倘若我們試一探求十二月黨人的社團（我稱他們爲十二月黨人是回憶往事之意，因爲暴動的運動終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之故）之合力點，那麼，便毫無疑義的這些秘密社團的合力點，就是取消農奴制度。北社中（比得格勒社），腦經最銳敏的，莫如尼古拉·意文諾維治·土耳其金也瓦，在他看來，取消農奴制度，乃是如一

切文學上和政治上活動的中軸，而南社中，有比斯特爾大佐，他的思想，也不離乎土地革命和農民問題，二者不愧爲當時的中心思想，試問：當時地主們何以提出取消農奴制度的問題呢？好了，這個事實，當然又是政治經濟學所講過的，農奴勞動，是一般勞動使用中最草率的形式之一。農奴經濟，是非常草率的經濟，農奴勞動，是非常不生產的勞動，我不引證數目表，只引幾句考瓦林斯基文選中沙不羅茨基——特靈托夫斯基的文章就夠了。農奴勞動的底生產非常之低。這一點還在十八世紀時，就早爲世人所熟知，而其所以能保留至於今日，一是因爲生產的勞動形勢非常之少，再是因爲這個勞動，是非常便宜的勞動形勢。農奴的農夫爲貴族工作，既無絲毫的報酬，這個農夫，當然是最便宜的工人，因爲其他的一切工人總是要報酬的。故當俄國穀物出口的增加，與穀物價格之高漲尙在比較遲緩之時，地主的經濟當然還能應付市場的需要。那種生產力極低的農奴勞動，地主對之自然也非常心滿意足。

可是恰恰的在這年當中穀物價格的高漲，好像狂濤怒浪一般。在十八世紀後五十年倫敦市場中穀物的價格，平均每四分之一噸（爲十二普特）約值五先令，在十九世紀初十年中，穀物每四分之一噸則值七十四先令，再過十年，每四分之一噸價格，幾乎漲到九十先令了。

在這幾十年當中，穀物價格的高漲，是非常利害的。同時，革命的高漲亦與俄國穀物出口的高漲無異。穀物價格之高漲既出人意料之外，市場對於生產品的需要，自然也就要一天一天的擴大，這是擺在地主目前的任務，這個任務，甚至在一八〇九年時，地主們還認識得不很清楚。一八〇九年，在『自由經濟社』的著作中，你們還可以看到稱贊農奴經濟的頌辭，即贊頌他的舊式農奴勞動的剝削，但一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之末，即過了七八年之後，解放農民問題，變為很嚴厲的問題了。著名的普希金反抗農奴制度的『鄉村』詩，居然博得國王亞力山大第一的唱和。這大概是在一八一九年的事情，在十年當中，已經有了急劇的變化。亞力山大第一的心腹和同事亞拉克也夫也來編纂解放農民的草案。大局至此，勢非得已。在我們看來，是非常清晰的。在田莊裏的農民勞動必須設法使之加強。但是，用什麼方法呢？這就是當時的根本問題。

地主們開始看到，農民的怠惰，令人可怕，農民的工作，非常之少，同時，這也就是十二月黨人耶枯希金所看到的。他找出了農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必須想出怎樣補救的辦法，使農民勤於勞動。耶枯希金曾經到過斯謨林田莊上，看見該地的經濟，弄得一塌糊塗，

因此他便將他所觀察的結果發表出來：「他們（農民）對於此種方法，即舊的經濟方式，當然不能和平了事，但亦不能希望用此等方法去改善他們的境遇。他們說，我們忍受了千辛萬苦，主人們還依然是一毛不拔，不管什麼工作，都無再幹之必要，因此爲貴族工作也好，爲自己工作也好，始終沒有盡自己的氣力努力勞動。這樣看來，自然必須想出補救的方法，去促進他們勞動，使他們勤於勞動才好。」這是祕密社團中最有名的社員之一，且應該說，是十二月黨人中最尊貴的黨人之一耶枯希金的言論。耶枯希金是在尼古拉第一盤詰之前不屈不撓的有數人物之一，雖然尼古拉第一曾處他以嚴刑苛罰（置於獄中，鎖住他的手足，如是者足足一月之久），但他終不變其本色，且在檢查官審判之時，他的答覆，是非常可貴的；其操持之堅實非他人所可企及，即比之里也夫亦更爲可貴。里也夫是十二月黨的詩人，是十二月黨的謳歌者，是詩人風骨之一，但里也夫在法庭審判時的操持，比之耶枯希金，相形之下，實大遜色，在下次的演講中，你們可以看出。耶枯希金表現自己是個真正的革命者。這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曾公開的說，關於農民的改革，是他生平最苦心焦慮的一回事。他公開的說，『必須使他們（農民）阻勉從事勞動。』他在其供狀中，仍然是個誠懇的正直的人，與

在審判時無異。他不願隱匿自己的論調。

耶枯希金所想出的策劃，非常簡單。給他們自由，奪回他們所有的各種土地。那時他便要用自己的雙手的勞働，去獲得食物，或則租賃土地，如此，便要努力生產多做工作以償地租，或則變而為農業工人，替他人耕種土地。這種思想，是很普遍的，不特在耶枯希金的腦海中具有。即在史謨林省許多地主的腦海中也會經時常這樣想過。該地有個地主寫過，『怎樣能使地主的利益，與農民的自由符合一致呢？我以為，這是非常容易的。看看我的建設罷。我讓農民居住於田廬，給他們土地和牧場，其餘的土地，——即一切可耕之地，留為己用。又將農民固有的土地，轉給他處的農民。』要補充一句，在一八一九年俄國進步的地主，——阿斯特細邊地的地主，里夫特良和恩史特良二省的地主，已經實施了這種農民的改革，阿斯特細的男爵，并曾經指示俄國其他各處的落後的同僚以許多必由之路。如在農民的田莊上，使用鞭條一事便是一個好例。以前是用笞杖，笞杖對於衛生，非常有害且不適用，鞭條不但適用，當時的衛生家并且還曾經證明過鞭條的使用是無害於衛生的。他們又指示了釀酒的道路，——第一次釀酒的工場，建立於阿斯特細省。他們復指示解放農民的道

路，把自己的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并準備了將來蔚然可觀的萊多維亞的社會民主黨，因為他們解放農民的方法，結果是利於馬克思主義者。當耶枯希金提出解放農民的方法之時，用很漂亮的話答覆他的，不是無產階級，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農民自己。農民伴爲不懂的問他道：『阿父啦，土地是誰的呢？』——『土地當然是我的，不過你們可以自願的租去耕種。』接着又有很漂亮的答案『唔，阿父啦，百事沿舊罷；我們是你的，土地是我們的。』等到農民都知道了土地是不能取得的時候，他們便揚言道，『不行，這樣我們是不同意的。』耶枯希金會將其策劃具呈於當時的內務總長可主比，可主比是個非常聰明和非常細膩的老頭兒，他便答覆他道，改革當然是可以的，但這種改革會引起莫大的暴亂，此種暴亂，可主比與耶枯希金，均將不勝其擾，因此，最好還是把這個增進農民勞動的強度的計劃，置之不理，另想別的辦法罷。下次當我們詳細的研究十二月黨人的策劃的時候，便可看到，十二黨人對於這一點曾經爭辯過的，他們始終要使農民永爲純粹的自給的小經濟。

（註）在一八一三年小麥和黑麥的出口約爲五百萬普特，自『大陸封鎖』廢棄以後，在一八一七年小麥的出口，增至

二千二百萬普特，黑麥的出口，增至二千萬普特。作者。

第二講

阿爾明斯基的文章，也許你們讀過了，他的立論這樣：紀念十二月黨的百年嘉辰，建立十二月黨人的紀念碑等等爲什麼呢？十二月黨，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說，這是欺騙兵士到先奈斯基廣場去的地主，等到沙皇開始射擊兵士時他們便不要臉的拋棄他們。十二月黨人是純粹爲地主利益和只眷念地主利益的代表。他只引出比斯特爾的『俄國真理』書中一些晦塞迷惑的章句作爲證據。阿爾明斯基提出一個問題，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我們將紀念什麼？是紀念我們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二十週年；抑或是紀念地主欺騙兵士的一百週年呢？

至於紀念或此或彼的嘉辰，我是同意阿爾明斯基的，因為我們用不着紀念一般的嘉辰。嘉辰是資產階級的習慣，每逢一定的期間，特別是人類誕生的期間，個人誕生的期間，即舉行慶祝典禮。因此嘉辰是非常的個人主義的東西。然而每逢十二月，不論其為第二十週，第十八週或二十二週，我們應當記憶我們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每次不妨回憶回憶，談論談論。作些文章，開開晚會等等去追憶這個革命。這些都是十分好的，然而沒有人提議，每逢十二月要紀念十二月黨，可是，表示十二月黨的一百週年，也是必要的。何以必要，——我在結論中說吧，現在我應當先說與阿爾明斯基相反的意見，十二月黨人絕對不是盡為地主，盡在先奈斯基廣場上欺騙兵士的人，只有一部分才是的，至於其他沒有到先奈斯基廣場上那一部份，是頗好的真正的革命者，最少也是國內自成一派的頗好的民主革命者。他們所缺乏的只有一點：他們不是社會主義者，亦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這完全是對的，可是當時俄國一般講起來，沒有什麼無產階級，且不能有什麼無產階級，因為農奴制度存在之故，這是最明顯不過的，此時想十二月黨成為無產階級的政黨——這無異想蘋果樹上的蘋果在五、月成熟一樣，因蘋果要到八月或九月才能成熟。這一點十二月黨人是無罪惡的，至於其他的

一切，十二月黨人，達到非無產階級革命的極限了；你們知道且我前次講過，十二月黨的土地政綱，是我們的全部革命運動史（直到一九一七年人民委員會蘇維埃公布土地法令為止的中軸；我們大家是從比斯特爾的土地政綱着手去做的。不錯，這是萌芽，然而天地萬物，即從此萌芽而生長的，你們研究革命，找到革命的萌芽，你們是奇異的。

十二月黨的運動不僅不止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彼得格勒之先奈斯基廣場上，且其最嚴重的運動亦不在此地。何以所有的視線，都集中於彼得格勒，且至今歷史家的眼界，仍注視於彼得格勒，這因為彼得格勒決定一切運動的命運，運動的命運之決定於此是毫無疑義的。但是阿爾明斯基只看到主觀方面，無怪他說十二月黨人是欺騙兵士的地主。他既然由主觀方面去看，自然必須從主觀的路線去估計十二月黨人，其意義即等於說，凡他們政綱之顯明及其運動的堅決，也從主觀的路線去觀察了。十二月黨最顯明的政綱和最堅決的運動，不在彼得格勒，而在離彼得格勒甚遠，即今之奇也夫斯基省、窩林斯基省、波多爾斯基省的領土內，是當時俄國軍隊主要力量集中之地，是極左的十二月黨的組織，所謂「斯拉夫大統一社」，是由窮苦人們和下級軍官（特別是砲兵軍官中的智識份子），組織而成的，他們的政

綱，當然與地主的利益漠不相關。從『斯拉夫大統一』命名的本身已經表示出，他們從事革命，不在俄羅斯民族的範圍，而在全斯拉夫民族的範圍。你們聽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五十年間所謂大斯拉夫主義，所謂合法的地主的著作，你們不妨記憶他們的淵源，如猶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是為九十年代的合法的民粹派（普列哈諾夫和列寧曾與合法的民粹派鬭爭）之革命的先覺者，『斯拉夫大統一社』，是合法的大斯拉夫主義的先覺者。『斯拉夫大統一社』以統一所有斯拉夫種族而為一個聯邦共和國而建設偉大的自由的斯拉夫國家為職志，這個國家——抵亞得里亞海，二——至波羅的海，三——至白海，四——至黑海。他們建設聯邦的疆域，有此偉大的策劃。這是他們政綱中理論的部份。這個理論的政綱，他們未能做到這一步，所以他們一切計劃，遂無形中破壞了。更具體說來，『斯拉夫大統一』有很奇妙的一點，即我們常見的『德謨克拉西』這個固有名詞。他人只說共和國，民權等等此類的名詞，甚至比斯特爾也沒有用過『德謨克拉西』的名詞，而『斯拉夫大統一』則用這個名詞，他們說：他們是德謨克拉西主義者。另一個奇妙之點，就在他們的人生觀方面，——他們是非常自由的思想家，有些是澈底的和堅決的無神論者的代表，關於這一點資產階級的著作當然是

以個人主義的眼光去解釋，他們以爲『斯拉夫大統一社』的創造者波里索夫曾與其砲隊久居於波蘭一位地主家內，此地有豐富的法國圖書館，所以他讀盡了十八世紀法國的無神論者和唯物論者的作品。我們對於這個結合，——德謨克拉西和無神論的結合，——較之那個偶然的事實，所謂波里索夫有機會讀盡了迪特羅、格爾文齊、哥爾巴哈等等的著作其興趣更多。

『斯拉夫大統一』恰恰是唯一的堅決的運動之首倡者和發起人，他們與十二月黨人的陰謀，即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終齊爾尼果夫團之暴動頗有關繫。一般輿論都說十二月黨人軍事行動的中心是彼得格勒，然而實際上，唯一的真正的武裝暴動，雲淒雨泣，慘狀畢現人們死亡相繼的暴動，却是齊爾尼果夫團之暴動。普列哈諾夫批評此次的事變，非常中肯，十二月黨人，毅然決然，奮不顧身，指示後人必由之路。第一，這是武裝的暴動。人們荷槍實彈以赴之，以備射擊，以便作戰。第二，這是沒有絲毫勝利機會的暴動，因爲以一團之兵，而抗全軍之師，寡不敵衆庸夫俗子亦皆知暴動者之期望軍隊響應，毫無根據。軍隊果然不響應他們，於是騎兵將軍吉伊斯馬爾一舉手一投足遂削平這個暴動，主要的因爲吉伊斯馬爾有大砲，而齊爾尼果夫沒有大砲。無怪許多參與暴動的軍官，——古新民、彝撲力、謨拉威夫、

河斯撲托爾——在戰場上，自殺而死。此次十二月黨的暴動是最悲慘的事變，這個悲慘的事變是由於『斯拉夫大統一』之準備，亦只有『斯拉夫大統一』才能準備，與士兵有聯絡的，只有他們，在兵士中做過宣傳的，亦只有他們，不錯，一八二〇年暴動後所解散的仙米諾夫團的兵士曾經協助過他們；他們有交通的機關，聯絡南社首領和士兵羣衆間的聲息，倘無此等首領，則南社的參與人，恐怕不能接近『斯拉夫』了，也恐沒有此次的暴動了。

這樣看來，要在十二月黨的極左派、民主派和無神論派中間找出什麼地主的利益，是萬分困難的，這個極左派又組織了唯一的真正的武裝暴動，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個極左派是非常重要的一派，阿爾明斯基對此派的批評，當然是不適當的。再看一看其他的吧。此外，『斯拉夫大統一』並不著名於世，研究十二月黨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歷史學界，對於他們的事業，幾乎完全緘默無言，這就是我們之所以值得慶祝這個百年嘉辰的緣故。因為這個機會可以出版關於『斯拉夫大統一』的書籍。在中央文書保管處的出版大綱內，擬定刊行十二月黨百年嘉辰紀念冊，恰恰載有關於『斯拉夫大統一』的書籍。

倘若我們考察『斯拉夫大統一』，那末在十二月黨的社團同一空間內，我們便可逢着在

比斯特爾領導之下的南社。這是什麼？阿爾明斯基引出比斯特爾的『俄國真理』一段話，爲保持地主的利益，應當取消農奴制度，使不致喪失地主的收入。阿爾明斯基故張其辭，認爲激動十二月黨人的利益是狹隘的階級的利益，地主的利益。上次我已經解釋過，在十九世紀初亞力山大第一時代，地主經濟及其地位在社會運動中有何種的作用，在這裏我不否認地主的利益，佔主要的地位，這是毫無疑義的。不過阿爾明斯基所引的章句（我先聲明，這是真的），與這個文章，——『俄國真理』之整個的意思和神氣，極端相反。比斯特爾在『俄國真理』上所陳述的綱領，其社會的和經濟的基本意思是什麼？其意思與土地國有最相近似。比斯特爾是十二月黨的有數人物之一，他懂得只有對於廣大的國民羣衆有利益的時候，革命才有可能，所以他主張關心農民的利益。在革命之際，或在革命之後，立刻把所有國家的土地合併爲一個公共的基金；嗣後將這個基金，等分爲二，一半分配居民，但不能作爲私產，而只可使用。在這一半的基金內，每個居民，可得一份。

如果你們記得，一八二五年農民的分地只等於全部三分之一（在十八世紀時，農民分地尚有二分之一，可知地主掠奪農民的不少）那末，你們便可想到，比斯特爾的策劃，可

給農民極大的填補的土地了。這一半的土地歸區邑處理，區邑又將這些土地分配於各居民，比斯特爾說，於是，俄國每個公民，將爲土地的領有者，俄國或無一人不領有土地了。按比斯特爾的意見，這些土地應從事必要的生產，換句話說，即從這些土地上可得必要的生產品。另外一半歸國家處理的土地，則應從事『豐富』的生產，換句話說，即從這一半土地上，應得到剩餘的生產品；爲增大這個剩餘生產品的獲得起見，國庫可將這些土地大批出租，甚至可以出賣於私人之手。比斯特爾的綱領并不反對資產階級的土地領有，不過有一個問題，尙不清楚：所有的農民，既然得了土地，且其土地的數量，比以前增加了，則我們的資產階級的土地領有者，從什麼地方去取得勞動者呢？那時有什麼方法可以激勵這般農民到土地私有的土地上，到資產階級的田莊上去作工呢？這個問題，（對於比斯特爾是很奇特的），他們仍然沒有解釋這個問題，所以奇特的緣故，正因爲這個問題，——對於所有民粹派的運動也是不清楚的。比斯特爾及其黨人終於趨向土地社會化之一途，不特這一半的土地應爲社會化，且所有的土地亦變爲社會化；實際上，比斯特爾分國有土地爲區邑土地和國家土地二部份，顯然是逢迎十九世紀初葉俄國土地領有制之資本主義的趨勢。這是一個妥協。

比斯特爾并不是個抽象理論家。像『斯拉夫大統一』一樣，具有四海統一的斯拉夫聯邦的計劃。比斯特爾是個實行家。

比斯特爾，順應當時的環境，提出這個分土地爲二部份的綱領，而沒有把土地國有徹底實行。但是這個一半的土地國有，也就是消滅地主階級，這是不言而喻的。別的是說不通的，倘若你們看看比斯特爾論貴族一章（在考瓦林斯基的『文選』中有這一章），那末，你們便可知道，比斯特爾的思想，在邏輯上極力消滅一切的等級，尤其是貴族。阿爾明斯基所引的章句，是有貴族的見識，與上面的意思，杳鑿不入，可惜至今還沒有說明，但是所有讀過『俄國真理』原稿的人就容易曉得。比斯特爾的『俄國真理』，是不完成的原稿，有半句中斷的，有一行塗抹後寫上另一行的，又復塗抹再寫上第三行，又塗抹了，旁邊又添上第四行，這樣一來，原稿至少有三四行文字在一起。他引證的章句，究屬那行文字呢？這是討論比斯特爾的先決問題：我們決定採取那行文字作爲證據（因爲文字有好幾行）以後，那末，可以斷定作者的意思了。不過現在必須根據已有的兩個事實來下判斷：一爲土地國有（這個土地國有是一半的，在這土地國有制之下尚允許有資產階級的土地領有制存在）。二爲保護

地主的利益。這兩個東西聯結一起，邏輯上是不通的，我們在『俄國真理』以外，可以找到比斯特爾一種著述，他主張（俄國第一人）沒收大地產。不錯，他只主張沒收最大的地產，在五四六二海卡爾特以上的地產，無條件的收爲國有，換句話說，就是沒收，若土地在此等份量以下，地主可以得到一定的貨幣代價，這又與阿爾明斯基引用的所謂保存地主利益的章句，互相抵觸。

這樣看來，阿爾明斯基所引用的章句，還不能證明比斯特爾是地主利益的代表者。況且他亦不是地主利益的代表者，他本身還是無土地的貴族，（正確些說，他是『無農民的貴族』，因爲他有土地；而沒有人民，）這種情形，在我們很好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當然不能作爲證據。然而羅沙可夫却居然以這種情形作爲證據。他曾經按十二月黨人所領土地的多寡而分他們爲各個等第。這種分法實在令人不可思議，因爲人在運動中所處的地位，不是由其個人的財產多寡而決定的。否則，我們就不懂恩格思之爲人了，他是個發財的人，是個工廠主，然同時他又是歐洲革命的工人運動的開創者之一。很明顯的，這個論法是不適當的。我所以要指出這一點的緣故，因爲在著作中有人說，比斯特爾是沒有土地的貴族，問題不

在這裏，實際上因為他反映其他一階級的利益，所以他才不是貴族。

我作過文章指出一個似是而非的事實。誰讀過我在『少年俄羅斯』中所發表的文章，他就記得，比斯特爾是舊日近衛騎兵的軍官，莊嚴璀璨的大佐，總司令維廉石清的副官，無疑的，他是俄國第一個政治上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有勢力者。這是似是而非的事實。比斯特爾的政綱顯然是小資產階級的，當然，不是資產階級的，——若說無產階級的，實是滑稽，——但這顯然是小資產階級的政綱，模範的小資產者聖西門，是比斯特爾的政治經濟學的老師；比斯特爾是第一個『俄國的聖西門主義者』，列寧命某人為聖西門主義者之名，六十年以前已經有他了。這個小資產階級性反映於比斯特爾的政治綱領和社會綱領之上。

第一，比斯特爾猙獰的仇視資本，——『豪富貴族』；對於比斯特爾，豪富貴族是主要的毒藥，以他的眼光看，豪富貴族比封建貴族更為惡劣，所以在其『俄國真理』開卷便與這個貴族相戰。在他看來，主要的是不許有這個『豪富貴族』，而使俄國人民一律平等。根據這點平等趨向，比斯特爾是個模範的雅各賓派。他的土地分配，一半歸區邑所有，而將這些土地分配居民，每人所得的土地，完全相等，——這恰恰是模範的雅各賓的特性。這個平分

土地的雅各賓的政綱，載入現代法蘭西立法的民法之中。法蘭西的承繼權，法蘭西的民法（Code Civil），不利於大財富的積蓄，比其他各國爲甚，這是比斯特爾的純粹小資產階級的政綱的一方面。還有很奇異的，這個大佐，舊日的近衛騎兵，總司令的副官比斯特爾非常關心市僧，非常注意當時俄國沒有一人注意過的和在一般計較之列的那些人民，他諄諄譴責道：無論如何不能將市僧的土地改爲國有，至其他的土地，可收爲國有，則在他言外之意中表現出了。最後，比斯特爾的小資產階級的特性，不僅在前線上顯出，且在後方顯出了，他確然是反猶太者，雖然不是很猛烈的。他擬定把俄國所有的猶太人集合起來，給他們一些武裝力量，并派他們去奪取巴勒斯坦，使他們離開俄羅斯。

無論從那方面去看，比斯特爾是模範的小資產階級者，他是『斯拉夫大統一』最親近的鄰人，實際上他的革命性不下於他們（歷史不能證明此點，因爲比斯特爾在其活動以前已經被捕了，所以不能顯出他的本領，倘若他得以自由或者他可以做到的），——他亦遠不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之人。比斯特爾是有他的階級本色，但顯然是別的階級，而不是地主階級。比斯特爾在其政治綱領上，在其策略上，均與他的本色階級相符合，所以比斯特爾是更重大

的急進派。在政治綱領上，比斯特爾是法國共和政論者德九提特拉西的信徒，德九提特拉西是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運動家之一，在拿破崙第一當國之時，他僑居於美洲，并著有『孟德斯鳩的法意釋義』一書，他在這本書上特別憤急的反抗任何個人專政。按德九提特拉西的意見，國家的元首，行政內閣，應有數人，而不應由一人獨斷獨行。比斯特爾完全與這個見解相同。比斯特爾擬定許多普通名詞，如『王權會議』，『王權國會』，『元老國會』等等指不勝屈的名詞定為國家最高機關，簡單說，是『行政內閣』，他的通信及其著述也沿用這個字眼。一國的元首，應屬於行政內閣，此外要有國民會議，當然，這是由德謨克拉西的原則選舉而成的。比斯特爾對於選舉不主張任何財產上的限制，所有這些機關，純粹根據共和的德謨克拉西的步驟而產生。

所以，在政治方面，比斯特爾是非常的附和共和政論者，他主張所有的國民，均有政治上的權利，沒有例外，這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因為其他的十二月黨人絕不是民主主義者，最後一點是比斯特爾的策略，我們只能根據他的草案去估計他的策略，因為他自己沒有實用過他的策略，——比斯特爾的策略，純粹是革命的策略，是武裝暴動的策略。比斯特爾希望

他所屬的軍團，歸附自己，并和這部軍團去逮捕亞力山大第一，攻下莫斯科，在聖彼得堡的禁衛隊和海軍中起暴動，於是由武裝手段，完成革命。此外比斯特爾還有十分奇妙的特性，這個特性，也是整個的革命運動的軸心：比斯特爾認為勦滅羅曼諾夫王朝，是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這是十分徹底的沙皇致命者，他已經看出，只消滅一個亞力山大第一這是不夠而必須剿滅一切。一九一八年夏天尼米薛達捕獲羅曼諾夫於烏克蘭，她確是破天荒的實現這個莊嚴璀璨的代表俄國小資產階級利益的近衛騎兵和俄國總司令的副官比斯特爾的草案的人。在辯證的歷史過程中，真是無奇不有。南社沒有暴動。不錯，『斯拉夫大統一』所組織的唯一暴動，是以比斯特爾最親切的同志之一謨拉威夫·阿波斯托爾為其領導。謨拉威夫·阿波斯托爾是十二月黨人中宣傳家有數人物之一；他曾經在士兵中間作過宣傳，但是他的一生事業只限於此。比斯特爾本人因被告密而被捕，事在暴動以前，甚至在聖彼得堡十二月十四日的暴動以前，所以關於南社之事只能根據他的草案去判斷。現在必須對於十二月黨的極右派北社，加以研究。

我們已經研究過二個派別了，——所謂『斯拉夫大統一』和比斯特爾所領導的南社就是。在南社的成份中，雖有貴族在內，——在南社中有王候窩爾清斯基有烏克蘭的鼎鼎大名貴族家氏之一的代表謨拉威夫·阿波斯托爾，——可是這個南社是由貧乏的軍官組合而成的與『斯拉夫大統一』無異，同樣的，南社亦有兩個小資產階級的派別。一派是左的，急進的和觀念朦朧的，另一派是觀念更清晰的和更確切的，然而右的，顯然與『豪富貴族』妥協的，這派的首領對於他們并不憎惡。這兩派的性質，可以比擬社會革命黨的左派和右派。右派社會革命黨，可比擬比斯特爾派，左派社會革命黨，可比擬『斯拉夫大統一』派。你們可以說，『斯拉夫大統一』與社會革命黨相比，是不公允的。是的，不錯，現在的社會革命黨，是醜態難堪的東西，然而（現在的社會革命黨）不可以把他看作是全部運動中一些特殊的東西嗎？將來在三月一日五十週嘉辰的時候，我們也許是要紀念人民自由黨人。這個日期我們不能完全空過的。十二月黨百年嘉辰，我們也不能完全空過的。雖然已近在眉睫的我們的敵人，資產階級的史家，已經把十二月黨的第三派，即我現在所說的北社，放在第一個位置，這并不是沒有意義的，北社是純粹資產階級的和地主的一派，你們現在大概都知道，此實毫無足疑。

這個第三派，已經在其憲法中表顯出他的思想了，這個憲法，是謨拉威夫編纂的，又載在特魯白茨基的口供錄上。在這個憲法上，最先可以看出選舉的財產資格。現在我們引證的原文不是從考瓦林斯基文選上得來的，而是將要發表的真正的原文，該原文說：

『公民必須具有下列資格：年齡至少在二十一歲，居住——是有經常的一定的寓所（土着的財產資格），精神健全的，財產上能個人獨立的（整個的無產階級不在公民之列），嚴格的文約公共稅務的；沒有違犯法律的；個人的私有財產，有：（1）不動產值五百盧布的銀幣和（2）動產值一千盧布的銀幣。』

確實的說：所有俄羅斯國家的工人，不是公民（即可為居民，而不是公民），但是以自己的勞動得到一定的資財的時候，換句話說，若符合上述的條件之時，便馬上得為公民。一七九一年法蘭西的憲法：『合法國家』（*Peys Legal*）規定公民的財產資格，土地不下五百盧布，或動產值一千盧布，簡單說，即不遜於優裕的富農。公民為俄羅斯共和國或帝國的幹部，因為這是兩個變體：一方面，——是共和國，另一方面，——是君主國。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居民，而不是公民。

這還不夠。倘若我們再看憲法中關於國家管理機關本身的條文：那我們還可找到更會明顯的東西。

『每縣具有法律規定的動產和不動產的公民，每年得選舉一個千長 (Taisatsky)。』這個千長便是這一縣的首領。千長爲誰？千長須具有至少年齡二十一歲，品行端正，不動產的價值不下三萬盧布的銀幣，或動產不下六萬盧布的銀幣。

有一個十二月黨人曾經讀過這種憲法的原文，看見選舉的財產資格這樣高，他加上一個注解：『差不多一切公共的領地，都沒有千長。』在公共領地中每縣要找一個有土地值三萬盧布或動產值六萬盧布的人簡直沒有希望。這個財產資格之高，顯然是滑稽之至。這樣一來，二十個千長中，當然有十九個是地主了，千長既是地主，那末，他以前的農奴，無論如何，都不能參加選舉了。

憲法規定：

『凡使用公共領地內的土地的人們，不是財產的領有者』，因此，他們不在選舉者之列，你們知道，農民的土地是公共的領地，所以農民不是公民，不是土地的領有者，於是乎他們

便不能參與選舉。這是原文中最精粹的地方。

關於解放農民的草案，憲法規定：『地主的土地，仍然屬於地主』，（住宅、菜園、耕具和牲畜，屬於農民）。由是農民只得一些田宅和菜園，並沒有什麼田地。謨拉威夫和特魯伯茨基指出這種辦法不妥帖，嗣後允許每家再加多二畝土地。不是每人加多二畝而是一家加多二畝。農民所得的土地完全不足用。這個政綱，顯然是地主的政綱，其用意是置俄羅斯於地主支配之下。

聖彼得堡派的情形就是這樣，聖彼得堡派有二個變體：一個是君主政體的變體，另一個是共和政體的變體。北社共和政論的首領是里尼也夫。

北方十二月黨的策略，也在這種政綱上顯現出來了。『斯拉夫大統一』和南社的南方十二月黨人，均為民主論者和革命者，他們有武裝暴動的理論，且在齊爾尼果夫斯基團暴動的實際上實現了這個理論。北方十二月黨人，完全沒有幹過暴動。所以慶祝十二月黨不應於十二月十四日，而應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即齊爾尼果夫斯基團暴動之日。特魯白茨基在其被捕後一天說十二月十四日沒有預定任何的暴動。

在十二月十四日特魯白茨基及其同志本來預定要幹什麼事呢？這一天他們預定指示兵士不要尊奉尼古拉·巴夫羅維治爲國王，而始終擁護辭不就位而無人知道的君士坦丁·巴夫羅維治爲國王，召集那些未曾宣誓奉誰爲王的團部，於廣場之上或在其他的地方，備着武裝，一方面以便對付政府，另一方面以便對付社會。特魯白茨基的計算，他詳細的說過：政府看了武裝的兵士萬衆一心，也許可以讓步和同意北方十二月黨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召集全國各省的等級會議於聖彼得堡，等級的分配：貴族二人，商賈二人和官有的農民（非農奴的農民）二人，這個等級會議應作爲立憲會議。這個會議應該規定憲法，以後須根據這個憲法而管理俄羅斯。農奴的農民，當然，不許參與會議，關於這一點，毋庸再說了：農民的土地是公共的領地，農民不是私有財產等等。

特魯白茨基說，他們準備作種種的讓步，但等級的選舉會議則無論如何，却須堅持。這是他們最低限度的政綱。另一方面，特魯白茨基及其社團看來，不許騷擾是最主要的條件之一，凡同情於憲法的人們可以幾個幾個的跑到他們那裏去。

這樣一來，一方面，政府看見了這許多武裝羣衆便不致於放槍射擊而向羣衆讓步，另一

面，社會看見這些兵士的行動合乎規矩，聽從長官的指揮，不搶掠，不紊亂，而且靜待等級的會議，該等級會議，地主和資本家，復可大佔優勢，社會上的人士，必定會同情於這個運動，對於這個運動輸誠附和。特魯白茨基所想像的情景大致如此。在這種情形之下，以特魯白茨基的眼光看來，萬一開起火來，恐怕是最危險的了。開火——是特魯白茨基的邪鬼。所以在這個開火的前天，特魯白茨基曾誠惶誠恐周詳慎重的探問過，究竟開火不開火，十二月十四日的前夜，他與其最親切的助手及其他的軍官商議，他最後一句說：『列位先生，步隊不放槍，而砲兵隊還是要開火的。』特魯白茨基再補充一句：『從此以後，我決定不參與任何的運動了。』特魯白茨基也就實踐其言了，當先奈斯基廣場上示威運動那天早上，他就不到先奈斯基廣場上去了。雖然他是北方陰謀暴動的首領，且事前曾選舉他為指揮者，他居然與其舊友出去閱讀尼古拉·巴夫羅維治登王位的宣言。他自己說，行到某地，讀讀宣言，以後又到某地復讀宣言。

當先奈斯基廣場上，慘演悲劇之際，而其指揮者却在讀尼古拉的宣言，這種情景，當然是奇異的。不消說，紀念特魯白茨基的一百週年，也許是不可思議之至。然無論如何十二

月十四日的一百週年還是要紀念的。很明顯的，此次運動的領導者，不是革命者；他們也不願意革命。他們懼怕開火，一至於此，雖則他們有二度奪取大砲而歸其支配的可能，然他們不敢接受。有些砲兵軍官謁見里尼也夫，說：我們可以給你們大砲，你們要不要，里尼也夫等便問他們道：『你們的兵士是否和你們一塊呢？』他們說：『不』。那時里尼也夫們就不要大砲了。本來示威運動之際，應該使砲兵隊的人數全體出發，荷槍實彈準備作戰才成。這樣也許可以發生效果。但是大砲的本身又是射擊技術的武器，大砲的開火又為世人最害怕的，因此他們便堅持不用大砲。中尉潘諾夫及其步隊能奪取此等大砲而棄之不取，因為大砲不在十二月黨的計劃之中。十二月黨的計劃，是示威運動，和迫脅政府，使政府召集有名的等級會議，就算了事，——此外沒有其他的要求了。

這樣看來，陰謀暴動的領袖，當然不是革命者，況且他們也不當作自己是革命者。特魯白茨剛才被捕，便暢所欲言竟成卷冊，尼古拉第一的屬吏根據這個卷冊編成陰謀暴動的參與者主要的名單。特魯白茨說得詳細之至，無絲毫遺漏，甚至忘其正確姓名的諷刺詩人某某（不是陰謀的參加者）。他竟在下次盤詰時加以更正：『對不起，我沒有說出他的姓名；』

這是某某』，——特魯白茨基願爲『誠實之士』雅不欲掩蔽其素志於萬一。

里尼也夫的供詞，更令人發生怨感，在第一次盤詰時即告訴了比斯特爾。他不知道比斯特爾已經被捕了。比斯特爾十二月十三號被捕，十六號盤詰里尼也夫，在這三天內電報不通，甚至政府也不知比斯特爾已逮捕了。里尼也夫說：南方有大佐比斯特爾一人，從事陰謀暴動的組織等等。

看見這些供詞，不禁憂恨橫生，雖則如此，但是十二月十四日還是值得回憶的，因爲雖然此次暴動的領袖極醜顏無恥之至（無須隱蔽），雖然他們不是革命者，如果除開他們，沒有他們，毫無疑義的在這一天，聖彼得堡就開始革命了。這一點我們可從尼古拉·巴夫羅維治的日記作爲可靠的證據。尼古拉·巴夫羅維治說明他何以開槍的原因，他公然說：

『因爲白日已趨於薄暮，羣集的庶民（尼古拉看人民爲庶民）有震動之虞，暴動將至非有決絕的手段不可，（只轉述他的大意）。』

尼古拉本人曾經期待許多時候，而十二月黨的示威運動，仍然行動鎮靜。尼古拉許久不願開火，因爲他恐怕一開火將必爲軍事行動的信號，這個軍事行動，將鬧到怎樣的地步又是

鬼神莫測，故一直到工人在伊索其夫斯基寺院中投擲薪片向尼古拉攻擊以後，他才開火。那時尼古拉看見薪片橫飛，他才知道人民羣衆已經開始進攻了。

我在『四卷俄國史』中另引其他有名人物，也夫金尼烏爾田白佳斯基王子的著作在這個書中，描寫運動的羣衆，維妙維肖，羣衆在馬路上罵聲不絕於口，以後，到先奈斯基廣場上的羣衆，刻刻增加。這一部份羣衆實行參加軍事行動了。此時轟擊尼古拉的，不僅木薪，且木石交加。被派出去攻擊十二月黨的騎兵隊，因為兵士們感受他們長官的訓誡大都只向空中放槍。

人民開始參加暴動了。關於這方面的情形，清尾良細夫說得異常詳盡，其父的僕人自十二月十四日事變以後二十年一告訴了清尾良細夫說此等農民對此次事變有怎樣偉大的感想，說來好似這是貴族的暴動一樣。很明顯的，羣衆對此次的運動是有很深刻的興趣。羣衆不曉得特魯白茨基是怎樣的人，羣衆亦不曉得陰謀暴動的領袖和他們的政策。羣衆只看見反抗萬惡的君主專制，反抗萬惡的農制奴度，已經開始了，并有武人參加暴動。羣衆不知道這些武人的大砲曾經事前決定不放。這一點羣衆是不了解的，羣衆只看見開始反抗沙皇主義了，如

果聖彼得堡的十二月黨立定意思號召人民的暴動於聖彼得堡，毫無疑義的，那時他們顯然極容易號召的，——這是十分清楚的。聖彼得堡在這個十二月十四日，可變為真正的人民暴動的舞台，與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的精神，先後輝映。然而十二月黨不願這樣做去。不錯，這不在他們計劃之內。當時的武裝隊伍，有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而徘徊歧路的領袖，還正在思索；究竟開火不開火，當尼古拉沒有決定放槍不放槍以前，當大砲沒有開火以前，此時正合特魯白茨基的妙算，因為開火與武裝暴動，不在北方十二月黨的計劃之中。

現在你們可以看到，阿爾明斯基完全的和整個的批評只論及十二月黨的一派，——即十二月黨的右派。但把這個右派，完全當做是欺騙兵士到先奈斯基廣場上的人民，這種說法是不公正的。他們沒有組織什麼暴動，他們只組織示威運動，此外沒有別的。但是此次運動，雖不完備，却是革命運動的肇端，這個肇端所以不能發展和不能擴大的緣故，我們只能歸咎於這個運動的指導者，絕對不是客觀上沒有發展和擴大的可能，況且在為鬼為蜮的牧師甲邦領導之下的那種運動，我們還要紀念，我們記憶那種運動，是紀念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工人們所流的血，——故我們不紀念十二月十四日，也是不可以的，因為這一天流過工人們的

血，流過兵士們的血。當然，用木石攻擊尼古拉的工人們，曾經持有槍彈，『庶民』中較勇敢的人們集合於元老院屋頂之上，攻擊尼古拉和騎兵隊。所以第一次的槍林彈雨一齊傾注於元老院屋頂之上，第二次才齊向十二月黨人放射。當時既然爲國計民生的名義，而流了許多人民的鮮血，那末，我們現在是有充分的理由去紀念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了。

此
页
空
白

第三講

前面兩講我們曾分析過第一次反抗舊農奴制的君主專制的俄羅斯的革命運動。以後，在八十年間（一九〇五年以前）我們再不會有如十二月黨運動一樣的有許多計劃的覺悟的羣衆運動。但是在這個時期中，不但是在進行着革命運動的準備，而且同時革命運動本身亦在進行着，只不過在別一種形式之下就是了。這種形式在十二月黨運動時已經有了萌芽，但沒有具體的表現。在十二月黨運動時已有恐怖手段的胚胎。十二月十四日留利亦夫在加哈夫斯基的幫助之下想暗殺尼古拉藉此搗亂敵人——這是十二月黨之一點。在另一方面，我曾經簡

略的提過，就是十二月黨人曾經有過影響羣衆宣傳羣衆和鼓動羣衆的企圖。十二月黨人爲了這個目的，曾在一八二〇年謝米諾夫斯基團暴動之後，散發過傳單（這點因爲簡略的緣故，沒有提及）。牧師馬拉味亦夫瓦·何布斯多賴并會引用舊約全書上的話來證明上帝不喜歡沙皇，因此誰聽從沙皇誰便是上帝的敵人（這點我上面已經講過）。這是十二月黨人的兩個次要之點（一方面是恐怖手段，另一方面是宣傳鼓動羣衆，在羣衆需要的基礎上去激動他們）；此種手段充滿了當時所有一切的革命運動。一直至十九世紀的末期。重敘一句，羣衆的行動却只在一八二〇年才開始。

現在我們要說到那些培養與造成革命運動的條件。在這裏我們要除淨那些陳舊的偏見，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還要把歷史內外顛倒一下，正如最近一位讀者對於我的『俄國史』寫給我的信上所說的一樣。他說：你的書很難讀，這並不是因爲你寫的文字困難艱澁，而是因爲你把內外歷史顛倒。把我們經常所習慣的歷史事實完全內外倒置過來。他繼續說：因此你的書在第一次讀的時候便很難了解，我要讀三次，最後才能了解他。我想我現在與你們作第一次的談話，一定有些地方使你們很費腦力，我們普通都以爲：十九世紀的上半期，尼古拉當

位，這是最黑暗反動的時代，全俄都變成了營房，到處蹂躪不堪。生活與運動絲毫進步都沒有，像死的靜寂的池塘一樣。在十九世紀之中葉，主要的克姆雷之役及其失敗的刺激以後，這晴天霹靂的打擊才破壞了這死池裏面的沈寂和恬靜，而開始活躍起來。六十年代是『偉大改革的時代』，人們都活動起來了，一切運動都向前進行；最後，在七十年代，立憲改良的與革命爆發的企圖失敗以後，於是又重新回復到靜寂的狀況中去，但是這個時期却比較短得多，總共只有十三年，而以前的靜寂時代却經過了四分之一的世紀以上——幾乎有三十年之久。普通都這樣的描敘史事。但是假如你們是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從經濟的基礎方面觀察這個問題，那你就可看到直截相反的圖畫：十九世紀前三十年，是運動異常迅速向前發展之時；其停滯加厲之日却是自由資產階級認為安樂、愉快、自負自豪的時代。在尼古拉朝，大工業發展之速，只有一八九〇年威特時代能夠與之抗衡。威特時代工業發展的速度強快得多，其原因是很明顯的，就是因為動力大大的增加了。尼古拉朝的工業雖屬貧困微小，然其進行却是非常之速。

試把一切工業的基礎（五金工業）來看罷。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之年）我們共有一百

七十個五金工廠和製造所，有二萬二千五百工人，每年產量有四萬九千噸（三百萬普特）。但經過二十五年之後，在一八五〇年時代，我們則有二百九十九個五金工場與製造所，共八萬八千五百工人，年產二十四萬五千噸（一千五百萬普特）。因此可見工人增加了四倍，而生產品則增加了五倍。但工廠與製造所的數量之增加却遠不到兩倍，這些事實對於你們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一目了然的，這些事實是說明工業資本主義的進步（而不與之相反），因為新的工廠與製造所，較之舊的，要大得多，在這部門中經過新的資本的集中，資本主義的發展於是更向前進了一步，在紡織工業中亦是一樣，在這時期的末葉我們看得特別明顯。在一八四三年全俄共計有四十個紗廠，共三十五萬錠子；而在一八五三年，已有一百萬錠子，同時在一八四三年每一錠子產紗十六基羅格蘭姆（一普特），而在一八五三年每一錠子每年產紗十九基羅格蘭姆（四十八磅）。在這十年中增加了三倍的錠子數，而其生產品則是每一個錠子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所以在尼古拉第一時代工業發展得非常之快，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所從來未有的發展。其他的例子我暫且不舉，例如在第一次革命之後，一九〇九年以及後幾年的發展，這個時期的發展，也是很厲害的，我現在只能談到十九世紀為止。

假如你們從此再去看我們大改革時代的工業，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工業發展的速度，那末你們便可得到完全不同的數目字：在一八六七年全俄工場中所用的棉花共計三百二十九萬八千普特（五萬四千噸），在一八六八年共二百五十五萬六千普特（四萬一千八百噸）；在一八六九年共三百二十萬八千普特（五萬二千五百噸）；在一八七〇年，共二百八十萬一千普特（四萬五千八百噸）；在一八七一年共四百十六萬五千普特（六萬八千二百噸）；在一八七二年又是三百六十萬六千普特（五萬九千噸）；在一八七三年共三百五十三萬普特（五萬七千八百噸）。於此可見棉花的數量常在三百萬普特左右；雖然有一次達到四百萬，但馬上又由四百萬降至三百萬。——這是一幅很清楚的工業停滯的圖畫。在五金工業中，情形稍為不同，比較好一點。這就因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鐵路建築迅速進行之故，建築鐵路需要鐵軌，因此便推動了俄國的五金工業的發展，但無論如何，五金工業的發展總還是很『平靜的』。在一八六七年產一千七百五十萬普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噸），生鐵在一八六八年產一千九百八十萬普特（三十一萬一千三百噸），在一八六九年產二千萬普特（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噸），在一八七〇年產二千二百萬普特（三十六萬零三百噸），在一八七一年也產二千

二百萬普特（三十六萬零三百噸），在一八七二年產二千四百萬普特（三十九萬三千一百噸），在一八七三年產二千三百萬普特（三十七萬六千七百噸）。總之，這裏雖不像紡織工業一樣停滯不進，但其進行却仍然是很遲緩很『平靜』。普通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去年在斯特威洛夫大學也這樣講過）主要的都說是因為農奴解放的緣故。你們都知道農奴的解放是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妥協的結果；然其利益大部份却在商業資本身上，農奴解放使得商業資本能夠把國內的剩餘生產品比以前更多的輸運到外國去。爲使商業資本能順利的進行起見，在解放的過程中，於是便採用了兩種手段。第一，儘量的多留下地主對農奴的特權；特別，把農民放在一個半解放在小生產者的情況中，那時半封建式的商業資本就容易對待他們。因之農民就被禁在農村中，不能脫離『密爾』（即『農村公社』的意思——譯者）的爲連環保證制所束縛……等等。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則採用租稅的壓迫，增加稅項，卽不增加租稅。農民身上的負擔亦極繁重，因爲農民要償還贖金之故。有許多地方，這些稅項贖金竟超過了農民土地收入的百分之百，這種租稅的壓迫，使農民迫不得已只有把自己的剩餘生產品多多的出賣；有時，甚至還須使農民出賣自己的生活必需品；食糧不足，營養不足，但總還是要賣之又

賣，賣掉一切。商業資本在農民解放時代的優勢，即表現於此。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我自已亦這樣回答過的），當然，整個的是正確的：在此種條件之下，國內市場不是飛快的強度的發展，他的發展是非常遲緩。因此之故，我們的工業也就發展得非常遲緩。我現在且舉一個在農奴解放後十二年中的工業投資表來看，便可想見其遲緩。當時所有的股份公司的資本共計二萬萬盧布，而投在工業中的却只有一萬三千萬盧布，同時投在紡織廠中的，則僅六百萬盧布。（不用說，紡織工業對於國內市場特別需要。）

所以我們的紡織工業幾於完全沒有發展。其最堪令人注目的，便是：我們本國的工業甚至還不能供給那在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後所造成的狹小的市場。這個不可非難的事實可以把當時英國輸入俄國的貨品的數目表來證明。在一八六七年英國輸入俄國的貨物不到四百萬金鎊。在一八六八年——四百五十萬金鎊。在一八六九年——六百五十萬金鎊，在一八七〇年——近七百萬金鎊，在一八七三年——竟達九百萬金鎊。換言之，即一八七三年進口的數量兩倍於一八六七年的進口，這裏是有沒什麼停滯的；這裏的速度非常之快，英國輸入俄國的貨物年年加多，這就是很有力的證明，俄國工業的發展比較『解放後』的農民的運命還更

痛苦，更正確些說，便是農民的解放並沒有充分的擴大國內的市場，甚至這樣狹隘的市場，俄國的工業也不能供給。

因此我們便可見到在經濟部門中所有的圖畫全與普通所描寫的相反。停滯時代是俄國資本主義與俄國工業異常迅速發展的時代。反之，大改革時代却是俄國工業與資本主義遲緩進行之時。自然，這些情形都要反映到社會運動中去，正在尼古拉第一時代，便產生了著名的四十年代，勃林斯基的言論，蓋爾僧的言論，俄國文學的全盛時代，辯臘諾夫斯基時代等等。而在七十年代，則產生了一小部份革命者的激烈的鬪爭，至在廣大資產階級的羣衆中其上層分子多停頓在黑暗愁苦的狀態之中。但是爲要研究我們的題目，研究革命運動，那我們就沒有必要來詳細研究這些文化的圖畫，而只要研究上述經濟情形的直接結果就夠了。

尼古拉第一時代工業發展極盛的結果是什麼呢？我想，你們自己也能回答，即在舞台上出現了勞工問題，這裏舊的資產階級的歷史家一定要瞪着眼睛問：什麼？在尼古拉時代已有勞工問題麼？是的，勞工問題在俄國是在尼古拉時代萌芽的，尼古拉第一就是俄國歷史上第一個工廠法的著作者（一八三五年的法令）。這法令的遺跡之一，在不久以前我們（大家

都是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或者你們中有一部份是工場中的工人——大家都遇見過，我們現在開除工人，必須多付兩星期的工資——這是在一八三五年的法令上便已規定過開除工人必須在兩禮拜前預先通知他。這法律在前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在設立工廠檢查員以前，并不十分恪守遵行，因為沒有人在那裏監督他，但每月必須付兩次工資，在這一點上看來，這個法令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到現在還依然有效。這是在一八三五年尼古拉統治最盛的時候，而那時的財政部總長就是尼古拉衣·江克林；他正是俄國工業的保護者，因為那時候沒有特別的工業部，只有財政部工商科。（當時出版了一本極好的雜誌，『工商科雜誌』，該雜誌是關於尼古拉時代經濟的統計的主要作品。）江克林看見俄國工業如此偉大的發展，覺得有安慰尼古拉之必要，說俄國不會造成像西歐當時那樣激烈的工人問題。江克林指出：西歐的工人是無產階級，故當經濟恐慌發生之時工人們便無路可走。失業，飢餓，自然要跑到街道去暴動。我們的工人是什麼人呢？我們的工人是農民，他們在鄉下有土地；如果在工廠中沒有工作，他們就可以回到鄉下去，那裏他們可以找到工作；所以在恐慌發生的時候，像西歐那種恐慌的結果在我們俄國是絕不會有的。殊不知，尼古拉的慰藉却正是因為我們勞動問題的發展會

成爲西歐的形式，這才是最可令人注意的地方。尼古拉熟知『共產主義』這個字，尼古拉在加文約克將軍於一八四八年七月槍殺了巴黎暴動工人之後，好熱烈的贊揚他。這并不是沒有意義的。尼古拉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是實際的工作人員，（尼古拉在理論上雖然是一個混蛋木偶，但他在實際上却不是一個盲人。）他很能清晰的瞭解，發展的方向，發展的結果。

假如我們用這個多少有些出於意料之外的觀念來觀察著名的二月十九日的大改革，那末我們便可以看到有許多完全出於意外的論調。爲什麼農民從土地解放出來呢？客觀上是商業資本需要把農民變爲小生產者，以便商業資本之剝削，但在主觀上却還有他種更有趣味的企圖。有個農奴解放的首領，加微林曾經寫過些很有意味的文字，但要先費兩分鐘來說明加微林的社會觀念，你看加微林怎樣解釋私有財產之產生：『人在外界所創的東西，就成爲他的私有財產，這私有財產在他身後，則留給他的子孫，或遺給他的親近。從這裏就產生了新的不平等根源。某人製造得多些，某人就多一些財產，他人製造得少些，他的財產也就少些，或竟完全沒有私產（！），但不知爲什麼緣故在各種民族中早晚都造成了一種平等的理論，

把人類的歷史充滿了血與淚并絕對的否認一切的不平等，殊不知此種不平等却正是人類社會的主要規律！』照加微林的意見來說……：貴族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這并不是不幸；而且是非常之好的事情！

『因此之故（就是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我們便可從飢餓的無產階級的地位中永遠解放出來，并且用不着與此有密切關連的財產平等的幻想的理論；對上層階級之必不可免的依賴與仇視；及其最後的結果——社會革命亦可完全免去。』一八六一年二月的農奴解放，同時便是預防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你們看，這在實際上是沒有成功的；但這種主觀的意志是有的；而且不僅是加微林的主觀意志，并且亦是農奴解放令修輯委員會的意志。修輯委員會對農奴解放用這樣的理由說：『農民所得的分地無論如何少，但他的生活狀況，總比現在那種困難的情狀要好些。』主要的并不在給全體農民以充分的土地，（這點從商業資本的觀點上看來，是非常有害的，因為不能強迫農民工作）。而是要在使農民大家多少都有一點土地，使他們的手足都為分地所束縛。在別一處，委員會曾詳細說明為什麼要保存農村公社（土地公社與連環保證制。理由就在這裏：『工人聯合，集體的反對派反對資本家反對政府

以及其他一切的不良的結果，只有在與一般的田地利益毫無關係的游民中才會產生起來，他們覺到個人力量之薄弱，於是便大家團結起來，仇視政府，仇視私有財產與社會秩序。」

你可以看到爲甚麼在俄國要保存土地公社，愚蠢的社會主義者以爲公社是將來社會主義的萌芽，而更聰明的專制政府的官僚與坐在修輯委員會中的地主却極清楚的知道，事實正與這個相反；——假如你奪了農民的土地那末他們便會建立工會，以後并且還要設立政黨；假若你把他束縛在土地公社中，束縛在一小塊的土地上，那他就會被這連環保證制的天然繩索所縛住；什麼政黨的念頭他們都不會想到；甚至連職工的組織也不會去設立。這樣看來在十九世紀的上半期不但勞動問題在俄國已經存在，而且政治上爲防止工人階級不軌的行動的發展，還採取了許多行政的實際的方法。（我想，這不用告訴你們，你們大概都已經知道了，修輯委員會在五十年代未進行自己的工作，而加微林寫這段話的時候還要早些，在五十年代之中葉。）那時，并且還有社會主義，與社會革命之宣傳（順便說一說，不久以前，我們自己還以『社會』革命這個名詞來代替『社會主義』的革命）。政府并且還採用了許多的方法來防止這個災害。

當你們觀察了這些現象的全體的時候，那你們對於這個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俄國社會主義，將不會覺得奇特，這是我們剛才觀察了的現象一種必然的另一方面的反映。工業迅速的發展，就與勞動問題的產生相連系，因此政府便作反無產階級化的爭鬪，因此一部份反對派的智識份子的心理，就必然要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這許多的現象，彼此都有極密切的關係，沒有絲毫奇怪與神祕在內。奇怪與神祕的却在別的地方。你們都知道，這套曲子，（指社會主義——譯者）（在我國以及在全世界）都是從工廠中及工廠的無產階級中產生出來的，（編輯委員會認為農村公社是反對社會主義唯一的利器）。於此就須要稍加解釋了。

這個解釋實在是非常簡單。因為每個從經濟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客觀現象，他要反映到某一社會階級或派別的頭腦中，必須要先經過他們的階級的或派別利益的三稜鏡的反映。那麼俄國十九世紀時代的智識份子，究竟代表些什麼東西呢？在這些智識分子中產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小組，即在一八四九年消滅的『彼得洛林夫斯的陰謀』，無疑的，勃林斯基是在這個小組內的；陀思退也夫斯基當時亦在內；總之，這個陰謀牽涉到當時智識份子所有的名人與領袖；非常奇異的，這些智識份子都不注意共產主義；其中有一個人是共產主義者

(斯彼書腦夫)；他堅持武裝暴動的理論，在他所遺下來的著名的誓約上，曾經規定每個委員必須參加搏鬥；在這誓約上很具體的寫着：『接到通知時，我馬上應該參加搏鬥』——即武裝暴動，這是彼得洛夫派中惟一的共產主義者；其他多是傅立葉主義者——即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爲什麼當時俄國的智識份子都傾向在這一方面呢？爲什麼他們始終相信沙皇政府的官僚認爲是反社會主義的鄉村公社乃社會主義的萌芽呢？爲了解釋這個問題起見，須看一看當時俄國的智識份子到底是些什麼東西！

若以爲當時的智識份子是那時發展着的大工業的機關中的辦事人員時，那就錯錯了。在大工業中做事的人，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大多數是外國的專家。甚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們的廠長，著名的工程師等等直至技師大，都是外國人，本國人是非常少的。十九世紀上半期甚至下半年期，我們的智識份子大多數都是自由職業者的代表。對的，在尼古拉時代，政治上並沒有此種自由職業者的特別等級；那時還沒有律師，但有醫生、教員、文學家。自由職業的代表，照他的勞動的種類來看，是純粹的手工業者，是純粹的獨自工作者。這正是我們智識份子中最明顯的小資產階級。同時，這對於我們目前都有非常大的影響，這就表現在

我們的幾個文字團體的觀念上，他們對十月革命，如吃苦藥一樣的難受。另一部份的智識份子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教育界。社會民主黨於一九〇五年間在教員聯合會中的力量非常薄弱。那裏完全被社會革命黨所把持。社會革命黨就指揮這部份羣衆，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却只有很小的很狹窄的小組，沒有多大的影響；因此我們便常常束手無策。我曾經在這有些羣衆中做過工作，我常常產生悲觀的心理，以爲和教員們去擾擾不休是值得的；這是沒有救藥的事情，而我們要去做更有用的工作。這當然是不對的，但是這種心理，是非常之特殊的，因此，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這正是小資產階級的一部份；這就是在俄國之所以產了崇拜公社的奇怪的社會主義的緣故。他產生在十分固定的基礎之上，因爲工人運動推動了社會主義的思想。他甚至於還推動了江克林總長及沙皇尼古拉·巴夫羅維希去思索社會主義；當然更應該推動當時的智識份子到這個思想上去。但因當時的智識份子純粹單獨的手工業者，因此他就不能接受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蓋爾僧一八四八年曾在巴黎的空氣中，熏染了一分鐘（而且僅僅一分鐘）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但是他後來又回復到鄉村公社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中去了，那些沒有受過一八四八年的空氣的陶養（西歐）的人們，當然不

能侵入到這種社會主義中去；只有在俄國找他們所能了解的社會主義，他們就在傅立葉，普魯東的書籍中找到了。普魯東在十九世紀的中葉，完全統治了俄國社會主義的思想。直到米哈衣洛夫斯基止，在實質上只不過是各種異形各式的普魯東主義者。這就是四十年——到七十年代，俄國民粹派社會主義者的宇宙觀的來源。

現在我再來分析這個運動的本身，在分析這個運動的時候，主要的，我應該講一講他們對於俄國的預言，因為他們這種觀點對於我們是最有興味的。

很明顯的，對於我剛才分析過的那些智識份子，農民是他們的革命羣衆，他們也完全期望農民。在這裏我們又有了很有興味的事實。無疑的，革命運動前進的推動者是工業的激烈的發展，與勞動問題之勃興，這是只用大事日誌來看就不難證明的。彼得洛休夫派——這是一八四八年到四九年正是俄國紡織工業發展的時代；六十年代的開始，與工業資本的初次勝利及農民的解放，頗有密切的關係。農民的解放雖然是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妥協的結果，然而農民從地主之下解放出來，這個事實，無疑的是正在需要自由勞動的工業資本的勝利。七十年代的運動緊接着六十年代的下半期的罷工運動而來。第一次大罷工在一八六五年摩羅卓

夫廠中，迨至一八七四年，彼得格勒亦發生了大罷工的潮浪，這潮浪引起了著名的內務部的通告。最終，隨着一八七八年彼得格勒第二次罷工潮浪之後，乃有人民自由黨革命運動之日趨緊張，這次的罷工，從普列哈諾夫書上大家都可知道。因此我以為在革命運動與工人運動的潮浪中間的相互關係是十分明顯的。但是當時的智識份子沒有見到，亦沒有感覺到這一點，而他們的主要的希望却放在農民身上。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對公社的崇拜都與這個有關係的。請原諒我不能從文學的立場上來解釋這些鄉村公社的文學，因為時間太少而且這些書籍亦沒有多大興味。我們對於這些民粹派的書籍花費了許多的時間，原因就是因為這些革命運動的宣傳品，由於當時秘密的條件，一部份則我們不能引用，因為沙皇政府的檢查官對於一切從宣傳鼓動的書籍中所引來的辭句非常的仇恨；即使這些辭句是很舊的，亦是一樣，十二月黨人的告謝米諾夫團的謝米諾夫傳單，印着許多的空點，就很足證明這一點了。這些書籍我們不能引用。但是他比我們普通所依賴的那些雜誌上的文章及書籍却沒有趣味得多。這些書籍中反映着當時的運動，正如一件東西反映在幾十面鏡子中間一樣。假如我們能仔細的去觀察這些運動的本身，那我們便可以得到更明確的圖畫，這就是我之所以在我的文

章中描寫趙爾尼色夫斯基的時候，不把他當做是起草給農民傳單的著者看待的緣故（這個傳單是趙爾尼色夫斯基做的，從施爾顧洛夫的回憶中已經完全證實了）。這真正是他寫的傳單，這傳單的本身有極大的趣味，因趙爾尼色夫斯基在分地剛出現的時候，他就預言了他的經濟意義。所以對於這個傳單我們值得來說一說，他這樣寫道：

「你們的土地將要發生些什麼變動呢，將要發生下列的變動：當測量之後，強迫的分去你們以前的土地，有的鄉村中分去四分之一，有的三分之一，有的三分之二甚至有些地方還在一半以上，這僅僅照了政府命令行事，還沒有把地主的貪心與那些測量人對地主的偏袒計算在內呢。但是測量人對地主不加偏袒是不會有的——因他們偏袒地主，地主才能給他們金錢；所以結果留給你們的土地比較從前的一半還少；那從前家產有兩俄畝地的人，現在還不到一畝了。在一畝田裏農民或者要替地主做與以前兩畝一樣多的工役，或則每半年交與以前一樣多的貢稅。但是，農民少了一半的土地怎樣能過活呢？就是說，農民要走到老爺那邊去乞求說：請你再給我一些土地吧，照政府所規定的，我的糧食太不夠吃了，而地主則回答道：給我多做些工役，或者要多繳些貢稅給我！他對農民可以誅求無止！而農民對於地主的

要求則須完全同意；因之農民對地主的工役也就更大，或則貢稅愈重。

是不是僅僅爲了土地一件東西要你增加稅呢？不！你的草場亦要給地主呢！——（按照政府的命令）。牧場差不多都要從農民手中奪去了。對於森林，地主亦要向農民征稅役，——你看森林差不多在每一鄉村中都從農民處取去了，命令上說：森林是地主的財產，農民若不付錢給老爺們連枯枝都不能動一動。有些在湖塘邊小河內釣魚的時候，老爺們亦要向你要求租役。一切所碰到的東西，地主都要向你要求增加工役與貢稅。地主連農民身上的最後的一絲一縷都要奪去的。簡言之，一切都照沙皇的命令而轉入地主手中，你們則變爲一無所有的貧民。』

你看，要費多少的時候來清俄國智份識子的腦袋，趙爾尼色夫斯基在一八六一年所寫的那些東西直到九十年代末列甯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那本著名的書籍中還要加以解釋。同時，俄國偉大的經濟學家在農奴解放之初就已清楚地了解了：分地的意義，地租的必然的加重，（新式的工役式與耕工制之必然的產生）；新式的工役制這些東西在一八六一年時就十分明顯。你們是知道的，趙爾尼色夫斯基的傳單是沒有散發的，因爲他的草稿被人家沒

收，這傳單並沒有印刷，因之他也不會有鼓動的力量；他只不過是在農奴解放時在農民中間一種極有才幹的智慧的有極大鼓動力量的紀念品罷了。

我再不引用別的傳單了（這類宣傳品很多），我只指出：趙爾尼色夫斯基在經濟方面有此種驚人的澈底的見解；但他在政治方面却保持了一種極笨拙的主張他認為『教育階級』（就是智識份子）有獨立的力量與意義，他們的運動可以得到某種政治的成效。不管利姆克（俄國歷史家之一——譯者）如何反對我，但我無論如何還是保持我的觀點，認為『大俄羅斯』即使不是趙爾尼色夫斯基自己寫的，亦是在趙爾尼色夫斯基所影響的小組中的人寫的。而你們可知道，『大俄羅斯』派人的行動的方法是這樣的：送德政碑，獻請願書，乞求，依賴自己在道德上的威權。『大俄羅斯』派公開的講：『我們不是草野農夫，槍斃我們是槍斃不了的。』爲什麼不能槍斃呢？一九〇五年正月以及以後的事變，顯然證明沙皇政府要槍殺誰都可以的。沙皇政府並不因爲智識份子穿了燕尾服（當時智識份子所穿的）就不敢槍殺他們。智識份子應該要求政府召集立憲會議這一類的東西。讀趙爾尼色夫斯基的告農民書，那你們就可以見到他對於行動的方法是很謹慎的。他這樣說：

『要使得全體農民都一致；以便時機一到可以一致起來。但是在時期沒有到的時候，要注意自己的力量……不必空呼悲痛；這就是要保持安靜，在表面上絲毫不露聲色。總之，孤獨的一個人不要發動。假如在一個鄉村中騷動起來，而在別的鄉村中還沒有什麼準備，那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事情破壞了，把自己斷送了。等到大家都準備了（這就是到處預備着助力時）那時就可開始，而在時機未到之時切不要輕舉妄動。要有謙遜的容貌，要在自己的農民的弟兄中加以解釋，使他了解真實的狀況。』

很奇特的，這些都留在他的告農民書上，而以前本還有下面的一段，後來就塗抹掉了：『兄弟們！還有一點，你們要請兵士們教你們如何遵守軍事的秩序。大的操練，你們是用不着的，只用你們能夠走軍步，步伐整齊——沒有這點是不成功的。教你們緊密的聯合起來，聽從指揮；不要懼怕；不要驚慌；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大膽，同時要有冷靜的理智，就是要有冷靜的腦子。』

這是小小的軍事準備的藥方，載在趙爾尼色夫斯基的傳單中，但是後來因為這是危險的東西，所以便把他塗掉了，而『要保持平靜；在表面上要絲毫不露聲色。』這幾句話却留下

來了，這是趙爾尼色夫斯基的別一方面的特殊的預示之點。我上面所讀的這幾句話不但證明趙爾尼色夫斯基是我們農村政綱的祖先；而且是孟什維克的策略的祖先；這個策略便是：

『爲什麼要騷動呢？這是毫無結果的，要保持安靜』，輕輕的緩緩的依靠資產階級（即趙爾尼色夫斯基的『教育階級』）。『教育階級』（這是沙皇政府不能槍斃的）用和平的壓力的方法，逐漸去取得沙皇政府的一切讓步。

這是關於趙爾尼色夫斯基的。但是爲要使你們不要以爲在一八六一年時，在俄國都是孟什維克的觀念所統治一切之故，那就讓我來舉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觀念的例子。這就是著名的『少年俄羅斯』的宣言，這宣言引起了當時的孟什維克異常的囂張與咒罵，得到蓋爾僧與巴枯寧方面很利害的批評。而在這裏復有許多有味的預言。很奇怪的，我們現在證明了這個宣言是一個因革命運動而被禁在牢獄中的人寫的，因當時憲兵獄吏的疏忽，這宣言居然得以寫成而且散發。『少年俄羅斯』的宣言曾已印刷并且散發，這一點恰與趙爾尼色夫斯基的宣言相反（這宣言只有草稿）。這個宣言有許多誤字，這就是因爲當時的祕密印刷技術不很高明的緣故。

『少年俄羅斯』的社會學是非常之有趣的。他把俄國的社會分成兩派——帝制派，人民派。——帝制派的基礎是什麼呢？

『在這種混亂上，在這兩派的衝突上（這種衝突，在現代社會經濟制度存在的時候，在少數人佔有資本成爲另一部份人的支配者的制度存在的時候，是不能夠消滅的。）再加上了——一種難堪忍受的社會的壓迫，這種壓迫消滅了現代人類最優良的材能。』

因此帝制派的基礎是資本主義，這是很明顯的了。以後就分析現代社會制度之荒謬。我現在還是要講他的預示諸點。第一，當『少年俄羅斯』派人勝利之後，他們將怎樣對付帝制派的人呢？

『關於羅曼諾夫族人——將有另一種決算。以他們的血來償付人民的災患，長久的專制統治，與不了解現社會的要求。全羅曼諾夫族的頭顱，應該成爲滌罪的禮品。』

你們看，這簡直與彼斯替爾一樣的懸在空際。究竟採用什麼方法來完成革命呢？

『我們研究過西方史，這種研究對於我們便不是徒勞無益的；我們不僅要比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者要澈底而且要比一七九二年的大恐怖主義者還要厲害；我們爲要消滅現存制度起

見，我們將來所要流的血，雖比一七九二年雅各賓黨人所流的血多三倍，我們亦不懼怕。」

以後我們便要批評『大俄羅斯派』。『少年俄羅斯』派的思想是各大區域的聯邦共和國，同時政權則須在國民會議及各區域會議的手內。但『少年俄羅斯』派與十年後那些頑固剛復的聯邦主義者却迥然不同。

『少年俄羅斯』派寫道：

『我們堅決的斷言；假如運動成功的時候，在政府機關中居領袖地位的革命黨，無疑義的，應該保全現在那種集中制（是政治上的而不是行政上的）以便在政治集中的助力之下，在可能的最短的時間內，建設另一種經濟的及社會生活的基礎。革命黨應該把專政放在自己的手中，無論怎樣絕不放棄。國民會議之選舉，應在政府影響之下進行，政府應該即刻注意，不要使這會議的成份中參入了現制度的擁護者。（若果還有這類人活着的時候）。』

你們看，這是非常奇趣的預言：革命黨專政，一切的權力實際上都握手中，然而并不像政綱所說的一樣，要立刻實行其聯邦制。

我們再說幾個預言，自然，在現在看來也許非常之幼稚。（我們現在知道；社會主義經

濟在實際上更複雜得多)。但是在歷史上却仍有其意義。

『我們要求社會工廠中的管理人，應由社會選舉，經過相當時期，一定要他做工作報告。我們要求社會的商店，店中的貨物，要照實價去售，而不應由商人任意決定，使自己迅速致富。』

下面這二點，其意義直到現在還完全保存着：

『我們要求完全解放女子，給她們與男子同樣的政權與民權。』

『一切教堂的財產應歸國有，用以償還內外債項。』

在這裏無疑地他們違背了社會主義，因為他們說到償還債款。但是他們想用教會的財產來付這一類債款，這反宗教的意志又是十分明顯的了。

你們看，這是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第一個紀念品。（趙爾尼色夫斯基在策畧方面不是一個革命家，僅僅在理論方面是個理論家。）在這個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第一個紀念品中存有許多預示之點，但是這件東西無疑的是來自與無產階級毫無關係的小資產階級的學生羣衆間的。許多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的特點都已經有了。主要的，從這個觀點上去觀察則六十年

代七十年代的革命運動對於我們是極有興味的。從革命運動的發育學上我們也值得研究他。我們對於口號，儘力的追求其最後的根源，是有很大的意義的。你們看，這最後的根源種得非常之深，證明歷史運動的客觀力量，完全不顧人們對於這個運動的觀念如何，而自有其一定的結果。六十——七十年代時，那些創作俄國革命的書籍的小資產階級，不自覺的預先暴露了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某幾個特點，因為他們在那種自發的客觀的直接壓迫之下，所以他們便握住了那幾點。十分明顯的，這對於共產主義方面亦有某種的有力的影響。在『彼得洛休夫』派中曾有一位斯彼書尼夫，他除了我上面所說過的那種關於搏鬥的誓約外，什麼東西都沒有遺留下來。在六十年代的革命者中有一個脫加屈夫，無疑的，他是俄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個俄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後來是所謂雅各賓派的首領，（雅各賓派就是要設立舊的祕密的組織，目的在奪取政權的一派）。當然，這種要求是只有在舊的小資產階級的布郎基的形式中才能實現。這是很特殊的一點，另外一點，馬克思名字在六十年代開始響亮起來了，我們在脫加屈夫處可以遇着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章句。這些章句我以後不想多說了。但是有一段請讓我引用一下。即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評。試看脫加屈夫對於資產階

級的經濟學是怎樣說的。

「在他們的學說與理論中，如明鏡一樣，反映出那養育他們的，購買他們的著作的，給他以恩金及月桂冠的，（就是說給他勳章及好位置的）……階級的精神及意志的極上的變動。實質上完全是一樣的問題，他們照着店東地主的要求可以完全直接相反的去解決，譬如當說到工人罷工的時候，經濟學者的口唇上就發出咒罵的聲音來，但是在說到廠主罷業的時候，他們的嘴唇上就滿堆着得意的甜蜜的微笑。他們肩上的力量是活的、動的、每日每時發展的力量。當他很自負的踏進人類進化的舞台以後，到現在還不到一世紀便已經成爲整個智識世界的主宰者了。現在他什麼事情都做，吞食一切，他到處都支配和指揮，對什麼東西都佈發他的命令。這個力量是資產階級，而工具就是資本。自然，在資產階級補助之下而存在的科學，亦將與其飼養者同其運命。當其飼養人還沒有掃清中世紀之跡痕，還沒有從封建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時候，當他對於過去還有幾分戀戀不捨的時候——經濟學在每一步上都是很怯懦、游移、謹慎的。但自亞當斯密特甚至自李嘉圖及山野（*Smith*）以來，資產階級的狀況却完全變動了，他已經站在前哨的地位，他已經在國民經濟的有機體中種下了很深的根

源；同時經濟學也就變爲更資產階級的了，更無恥地來宣傳市僧的教義了。」

我把這個簡單的來做個小小的證據說明俄國出版界中脫加屈夫之解釋歷史無疑義的是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在這個空氣中在俄國的革命的小組中，產生了一個後來常爲孟什維克所嘲笑而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五日差不多一字一句都實現了的計劃——就是預定革命的計劃。這些預定革命的計劃（當然是很幼稚的）第一次在一八六八年在尼且也夫的小組中發現了。在現在沒有一個智識的人，會認尼且也夫爲一個小有聰明的強盜，他組織了一個癡狂的秘密小組，想用這個小組的力量來進行什麼半強盜式的革命，尼且也夫是俄國的巴枯寧派人（這可以認爲已經證實了的）。而尼且也夫小組是巴枯寧式的革命在俄國第一次的企圖。現在我來指出這個第一個巴枯寧革命的缺點。至於那些預言諸點，其音調雖極暗啞，但是也很值得響他幾下。

這就是當時的巴枯寧派對於革命策劃：

『是好的行動者在一八六九年五月以前應該集中在彼得堡與莫斯科；而一部份則應集中在那些有大學的城市中。在這時候，應該準備及進行各學校學生的運動，要求集會結社的』

自由；而且應該用貧人（就是貧窮者受過教育的人的組織）開始在貧窮的羣衆中宣傳。行動的本身應該移到省城及縣城中去，主要的集中在小販、學生及省會中的貧窮者身上。從十月起，首都的及省城的宣傳員轉到民衆中間去；因之，至少須有四分之三的行動者，由首都派到各省去，其方向則由俄國的西境直至安那堡，因為這是對國外僑民最重要的一條道路，所以沿路各省的準備工作頗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在一八七〇年春天，就開始羣衆運動，羣衆革命。

你們將要說：這是笑話。當然，這是笑話。這正如第一個小孩子畫的預定革命的路圖。但這種暴動的略圖，有計劃的準備，却在六十年中從巴枯寧派的筆頭裏暴露出來了。因為普通對巴枯寧派的批評以爲只會搗亂，只會拋炸彈，所以這一點，很可以改正普通一般人。從巴枯寧派的組織中產生了第一個革命的計劃，這個計劃是純粹小資產階級的，我想你們在上面所引用幾節文字中，見過絕不止一次了。在這裏，甚至連脫加屈夫也沒有受共產主義的熏染。把革命看做是貧窮者的革命。同志們！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必加以嘲笑；難道我們在一九一八年沒有喊「貧民」革命的口號麼？我們叫這個口號時甚至不顧老馬克思主義者的反

對，如斯切班諾夫同志在真理報上的批評。對於這個批評，當時不會有什麼人加以注意。斯切班諾夫寫道：『貧民』與無產階級不是一樣的；我們應該依靠在無產階級及鄉村半無產階級的身上，而不要依賴真正的所謂『貧民』身上。在這些『貧民』之中，有『流氓』，蕩子及赤貧者，這許多人都是反動派的支柱之一，是一九〇五年及以後幾年中的蹂躪軍。但是，不管這許多，我們總還是叫貧民革命的口號。因此我們不必向六十年代喊貧窮者革命的巴枯寧派加以過分過重的攻擊。更奇異的一點，就是他們之注意強盜，巴枯寧曾對之含有極大的希望。他說，革命者在人民中第一個應該注意的份子，就是強盜。這種見解到六十年代的時候，當然是陳舊不堪了，因為六十年代是鐵路時代，而強盜則為鐵路時代以前交通不便時的一種職業，在鐵路上搶掠東西是很困難的。因之對強盜的注意，就被技術的發展停止了。

無疑的，這在本質上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運動，但是這運動在客觀上却造就了一個後來多少實現了的計劃。結晶在波爾雪維克黨內那些將來的革命組織的特點，實際上說來，在六十年代已經存在了。祕密組織之要求，一定的計劃，武裝力量暴動，所有一切實際行動的方法，在當時都已經有了，我們以前總以為當時的運動是到民間去的和平的宣傳運動，於此復

可把我們的腦子大大的刺激一下。在巴古却爾斯基的書上，你們可以找到這樣的言論。而這個到民間去的運動是與拉夫洛夫的書『歷史的信』有關連的。這個關係，我自己以前也曾講過。但是加時民在自己的却加屈夫一書中極力的證明，『到民間去』這個口號，巴枯寧派在拉夫洛夫的書出世前兩年就提出來了。但是這不是從書上產生出來的，而是從實際的革命家那裏產生出來的，是從那時準備這個有些可笑然而有計劃的暴動的人們那裏出來的。

但是，應該說明的就是這『到民間去』的運動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革命運動間最嚴重的一部分。菲爾納克在他的『回憶錄』——這是那時最好的文件之一——中說道：

『在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九年我住在外省，并且極清楚的知道蘇馬爾斯基省，太泊夫斯基省及伏路任斯基省的狀況；我可以絲毫無訛的證明，到民間去的運動是在一八七〇年之初的運動，其時間很短。各人的實際工作不一，有的僅有幾星期，有的二三個月，到一八七〇年之末則已經停止了，所存在者只有那些在第一次幸而脫逃的人捲土重來的企圖而已。曾經在彼得洛夫斯基縣住了十個月（我們朋友在伏而斯基縣住得還要久些），我們當時在地方上聲氣的流通，雖極容易，但始終沒有找到一個人來和我們聯絡。』

這是七十年中大革命家之一的一個有力的證明。在這裏我們還要把結衣其的回憶『半世紀』拿來補充一下。結衣其敘述自己到民間去的很有趣的歷史，同時又因他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歷史是那一點最有趣味，所以使我們覺得更加有味。他說，他準備到民間去正像去看自己最愛看的戲一樣，他們儘力模仿農民的外貌，穿農民的衣服，說農民所說的話等等；而且當他們在某一條鐵路上被他人當做真正的農民的時候，他們便非常的快樂，但是他在這愉快之中就忘了一件小事，忘了學習鄉村的工作。當這個裝扮得極像的農民到了農村中，人家就給他鐮刀要他使用，那他怎麼辦呢？他就開始工作了，起初把他當做真正農民看待的主人，於是便對他說道：『喂！朋友，你要斬斷我的或那女人的脛了。看前面女孩子怎樣刈，你就照他做吧！』明天復問他道：『你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外表看來像農民，而刈草都不會？』當然，不會刈草的人不配做農夫。其他鄉村工作的人員，亦受到同樣的遭遇。

這種智識份子的出發點是很明顯的！領悟了農夫的外表而忘記了實際勞動中農民的實質。因之到民間去的運動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間的革命運動中最不嚴重的一部份，我所談過的那些計劃、章句，無論如何幼稚，但總比他嚴重千倍。所以當時的孟什維克對宜且托夫

派這樣的惡意的譏笑不是無因的，而且不僅譏笑。阿普替克明用拿打遜的話在回憶中說：『阿普替克明不是一個會說謊的人，拿打遜亦是一個誠實的人（更無用爲自己造謠）。拿打遜非常的憤恨尼且也夫，會因尼且也夫派自己的代表去嘲弄他，所以他就陷害他，在審問中「第一個」就說出尼且也夫來，換言之，就是把他所知道的關於尼且也夫的事情都完全公開的承認出來。』當時黨派鬥爭的逸聞居然由阿普替克明這樣有威信的人出來證明，這是很有趣味的。

因此當時孟什維克派和波爾雪維克派的運動已經分離得很遠了。而孟什維克派比較安全的存在着，因爲波爾雪維克派人或則失望地流浪海外，在俄國一無親近；或則死於禁錮與葬身於斷頭台上，而孟什維克則利用此專利，描述這些運動爲一種和平的經濟的宣傳。實則這是純粹的革命運動，不過他留在想像中，不曾實現罷了。

下講將述及八十年代下半期工人運動的動作。因此請讓我把『人民自由黨』亦包括在工人運動之中。在下講中，你們復可看到許多有趣的『預言』的特點。

此
页
空
白

第四講

我們如果把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上半期的革命運動整個的拿來觀察一下，簡言之實可說是建築在被騙的農民暴動的期待之上。二月十九日農民之受騙，這一點不但趙爾尼色夫斯基很明白，即亞歷山大第二自己也很了解並且曾經很清楚的談過。當討論派往各處的將軍省長的名單時，內務總長頗欲專權，不願讓權於沙皇的特派員，內務總長證明在鄉村中一切都平靜，亞力山大在議決案上寫道：『現在呢，是這樣，但到農民知道了他們的期望（他們所想的自由）沒有達到的時候，那就……：……：……』等等。亞歷山大第二很清楚的了解到他所給

農民的，不是農民所夢想的那種自由。重說一句，整個的革命運動，與其意義，可以把加拉古作夫——在刺亞歷山大後對亞歷山大所說的一句話來簡括的描述他。當加拉古作夫被捕之後，沙皇近前向他道：『你爲什麼要刺我呢？』加拉古作夫回答道：『因爲你允許了農民土地與自由而又欺騙了他』，被騙的農民之期望騷動，便是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一切革命運動的基礎，這些希望是沒有實現的。被騙的農民稍爲騷動了一下，其騷動是很有力的；在二月十九日後的第一年中曾有二十次的騷動，有時亦有很大的有槍殺的騷動，如在加曾省比時琴村那次著名的騷動，大名鼎鼎的歷史家要巴夫即因此而受流徙之罪。然一般的說來，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却不會發現，革命也沒有產生。爲什麼會這樣呢？這個問題應稍加解釋。

在七十年代中在革命黨人中無疑的已經把農民運動的迷夢打破了，這迷夢的打破就成爲兩大傾向分歧的起點，就在這一點上，這個問題值得加以說明。這兩大傾向，一則傾向於資產階級；一則傾向於無產階級。爲什麼以前專門傾向農民的人現在傾向於別種人身上呢？這就正是因爲農民不能實現他們的希望，農民不但不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而且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他們的革命性異常之少。這個結果是很複雜的，這不但受了農奴解放的傾向，而且還受

了六十年代以後，沙皇政府一切經濟政策的影響。農民改革一方面，對於農民的上層份子（富農大農）無疑地給了他們一些利益，這個利益不但在改革的本身而且還在鐵路之建設很奇怪，地主簡直不能統御這鐵道，地主的意識簡直不能征服這鐵道建設的結果。鐵路廢除了地主的特權，這特權在農奴制度存在的最後的十年中也許比農奴制的本身還重要。農奴制本身在這時候，在某種程度上還阻礙地主，但是地主有一個非常貴重的特權，就是地主在市場上佔第一個位置。農民只有把地主的糧食運到港埠及市場上（地方的或中央的）去之後，才能夠出賣自己的糧食。地主佔市場上第一個位置，因此他能得到最高的價格與最大的利益，而農民則應該永遠落後。自農奴制消滅之後，『運輸役』亦消失了，農民亦不要輸運地主的糧食到市場上去了，他亦不必等待地主先出賣糧食了，在鐵道建築之後，凡有車站的地方，就成爲市場，誰先到車站（地主還是農民）這全要看誰比較的敏捷與機警。而富農大農，在這裏比較地主更快的運糧食到這個新的市場上去；到鐵路上去，因此他便得到了最好的價格。

其結果則富農大農（特別是沿窩瓦河各省的）無疑的在改革中佔了便宜。故凡沿窩瓦河

及頓河各省去的革命者是最愚蠢不過的人。頓河亦是一個大的農莊，因為哥薩克亦歸於大農之中，到窩瓦河及頓河各省去的革命者，無非想在那裏找些革命的同情。但在那裏想找到革命的同情是很困難的。而想在當時在政治上最先進的農民羣衆中尋找革命的同情，尤其困難萬分。這個事實，我們必須把他指明出來，因為我們以後在俄國農民革命的整個時期中，時常都要碰到他。因此我在最近著的一本書上說：這是一九〇五年前俄國農民革命的大本營：讓我讀一段有趣的記載，這就是七十年代鄉村中銳敏與聰明的觀察者，昂格爾加爾達教授——的信。這就是鄉村通信，這封信一直到現在我們的研究組都沒有把他拿來做主要的參考書，這就因為我們研究開始較晚，不曾涉及十九世紀中葉的緣故。從他的信中很可研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中部的農村狀況（昂格爾加爾達是斯摩林省的地主）。昂格爾加爾達寫道：在我的信上曾屢次說過農民雖沒有土地私有承繼權的觀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對於動產的私有觀念却已經是很深的了。我會屢次說過，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在農民中非常發達，企圖剝削；嫉妬；互相猜忌，互相陷害，弱者屈服於強者之前，強者驕備，崇拜財富；——這種思想在農民中非常盛行。富農的思想統治了一切，每人都想變成富翁，剝削貧者。

如有可能的時候，每個農民都想剝削別人，不論地主也吧，農民也吧，都是一樣，要榨壓別人的血汗，剝削別人的需要。

無疑地，這裏自然有些形容過甚。當時在農民中間，當然尙沒有無產階級的影響，因為這是在七十年代的這時候，無產階級的影響尙未侵入農村之中，農村還落後得很。以後，在鄉村的貧農中間發生了別種的心理，但這是在以後而不是在七十年代。也許可以這樣說，富農於七十年代在思想上統治了鄉村，統治了一切。那麼富人的心裏到底是怎樣呢？昂格爾加爾達說：「富農是鄉村中的極端自由主義者，是地主的激烈的敵手，他們不但仇視地主，他們而且認地主爲毫無能力毫無使用之人。雖然在鄉村中有人仇視富農，但當富農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時候却到處受人尊敬的，在這一點上，富農在鄉村中的意義就非常之大。在說到土地的問題，重分土地的時候，富農常說：有某處地主的田地荒廢了，農民反被人驅逐；土地若在農民手中決不會荒廢，糧食也決不會像目下的昂貴。」

因此無疑地，在七十年代的富農，已經是鄉村最德謨克拉西的一部分，而且是政治革命的主力軍。但當時的革命者却帶着社會主義的綱領，迷信農村公社是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的

萌芽。這樣一來，在農村中，當然得不到當時先進份子的理會。在鄉村中，向富農宣傳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若向富農宣傳政治的革命，這也許不至於完全沒有效果。無論如何，富農對於這個政治革命後來是參加了的，是站在革命方面的，直到社會主義在鄉村中實行的時候，（在鄉村中設立貧農委員會）他才變而為反革命者。重說一句，這是鄉村中主要的份子，在加里甯同志不久以前所說的話中（這話你們自己也許還記得）曾經證明，這一部份農民至今還持有某幾種的意義；你們記得他所說的富農坐在鄉村中的第一把交椅上等等……………。這一部份的農民是極有勢力的，當然，他對於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者革命黨人，及民粹派的宣傳員，在當時已經是反革命的了，而且這亦是必然的。民粹派的革命在鄉村中在這一部份農民中間沒有得到援助，但是在鄉村中不全是贊成富農的，在鄉村中亦有貧農啊！請讓我再讀一段菲克納爾的回憶錄吧：試看他對於鄉村中那些非富農的農民羣衆，是怎樣描寫的。她以醫生的女助手的資格到了鄉間：

『第一我便執行我的正式的職務。二十日中有十八日我不在家，在巡行各個村鎮，這幾天我走進了飢寒悲慘的深淵之中。平常我總是留宿於農舍中（所謂客舍）。在什長或村長按

戶通報之後，那裏立刻就聚滿了病人。三四十個病人就塞滿了農舍，有老有少，大部份是女子，小孩子更多，這些人的叫喊與呻吟之聲充塞於空氣之中，污穢與衰疲，——對病人不能作安靜的診察，其疾病都是經年舊病，甚至，幾延至十年十五年之久；幾乎每人都患皮膚病，只有絕少的鄉村有浴室；有多數的鄉村，都是在俄國式的火爐澡堂洗濯。不能醫治的腸胃加答兒，胸部的暗聲在幾步外都能聽見，少年人都染着花柳病、瘤癩、與各種的潰瘍；而這些又加了那不可想像的污穢的房屋及衣服；不衛生及貧乏的食品，每每就使人呆呆想到，這是人的生活呢，還是動物的生活？……我的眼淚常常如雨珠般落在我給這些不幸人的準備的藥劑和藥水之中。我以為他們的生活與沙可利亞所描寫的四千萬印度貧窮人的生活無甚差別。『菲克納爾簡括的說：『這三個月對於我是一個困苦艱辛的經歷，我從民衆生活的物質方面得了些多很悲慘愁苦的印象。民衆的精神我不會看到，至於宣傳，我簡直沒有開口。』

要在這種鄉村的貧窮者之前作什麼宣傳是很可笑的，因為很明顯的，這些因為最初步的物質生存的條件都要力求而得。貧窮者是完全不能接受社會主義宣傳的，因為他在政治完全

落後上，一切富農也不會同意於社會主義的政策，因為他們是民主派，是純粹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萌芽。因此社會主義的革命在鄉村中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會得到任何的援助。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加以詳細的解釋，就因為我在『俄國史』中對這件事實下了一個極總括的解說。我說在改革之後，農民的生活狀況一般的改善了。這只是對富農而言；富農在實際上是勝利了（但不是因為農民解放，而是由於鐵路之建設），富農可以很順利與地主競爭。至於說到羣衆則別有原因，這原因我在斯威特洛夫大學的演講中曾經說過；然而又因為這些演講稿還沒有刊印，所以我在此地要重述一次。原因就是在羣衆都游民化了；這部份羣衆並沒有成爲無產階級而正成爲游民，不管巴枯寧如何的錯誤，游民與無產階級之間，總還是有極大的區別。在我們之間相同的只有肉體上的一點，就是他們的肚子有時都要挨餓，但不能在這個肉體的相同之點就做出社會學的結論來。不能因為他們都時常要挨餓，而說他們的心理與意志都是一樣的。無產階級的心理永遠是進攻的心理，革命戰士的心理，甚至在這最初的時期也是一樣。游民的心理則是求生的心理，在求得自己的肚子一飽之外什麼都不顧了，農民革命的消沉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當時鄉村中沒有革命的分分子，縱使有些革命的

分子，然也不是當時的革命者所期望的。因此革命黨人無論與那一部份農民周旋，他們到處總要撞釘子。

在鄉村中平靜死寂的時候，在城市中則發生了革命的運動，我已經簡略的提及過這個運動，在我的『俄羅斯史略』中也曾經詳細說到，但是無論如何我不能不再把我在『俄羅斯史略』中所用過的文件來重引一次，因為你們也許不知道這本史略，而這些文件却非常有趣的。這是在一八七〇年彼得堡的熟夫斯基紡織工廠罷工後的內務部的通告。通告上這樣說：

「熟夫斯基紡織工廠工人的罷工是工人中空前的新現象，極可令人注意，因此皇上便叮囑各省長對於工場製造所的人民，應嚴加注意，勿稍懈怠；『熟夫斯基紡織工廠的罷工，當時民粹派的書籍並不提及。但亞歷山大第二却完全注意到了，亞歷山大這個人，從上面所引用的論據中，就可知道他並不是一個天才，然而他絕不是一個笨人，他是一個多少能分析主要現象的人。這個事實是很明顯的。附帶說一聲，內務部所謂這種現象是完全新的現象，這也是不對的。在一年以前一八六九年莫斯科省長的通告上就曾經說到在西爾布霍夫的康勝工廠中的罷工，並且我們知道在一八六五年在馬路若夫工廠中也曾經有過一次大罷工，因此沙皇

才注意到這種逐漸成爲經常的，而且次數逐漸增加的現象；工廠罷工數次的增加驚動了舊沙俄的上層分子。

假如從這一方面來觀察我們的革命運動，那麼在七十年代中，唯一的最利害的堅固的革命組織，乃是在工人羣衆周圍所團結起來的，極著名的加衣可夫派也是七十年代宣傳小組的祖先，他主要的是在彼得堡的紡織工人（克魯泡特金曾經向他們作過演講的。）及五金工人中活動。這就是說，他們盤旋於工人之四周而不是生在鄉村中；在鄉村中他們簡直不能開口，但在彼得堡的工人中間他們却宣傳了，而成績亦頗不壞。莫斯科的鮑爾庭娜的小組，是七十年代最明顯而有力的小組之一，這小組也是莫斯科的紡織工人所組織而成的。鮑爾庭娜及其友人都進了莫斯科的手工廠作女工，她們同樣在工人中在無產階級中活動。在鄉村中正是風平浪靜的時候，在城市中却正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而在七十年代之下半年期，在一八七八年在彼得堡那種疾風厲雨，甚至於驚動了對此種現象毫不關心的智識份子的注意。從普列哈諾夫的書中可以知道，這種現象甚至還引起了蘇伏林的注意，（蘇氏是後來『新時代』的編輯）蘇伏林對於工人運動還捐了三個盧布。

七十年代彼得堡的工人運動頗有很大的發展。當然不用過份的誇張這種運動。『彼得堡罷工的織工會在政治上是很幼稚的，他們向皇太子（即以後的亞歷山大第三）去請願，並且這件事還是他們最明顯的含有政治性的一點，普列哈諾夫在『俄國工人革命運動中』，曾經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來描述這事件。列夫·替漢米洛夫是這個運動織組者之一，他說普列哈諾夫自覺的利用工人中之保皇的傾向；使他們與皇族衝突，藉此證明給他們看：現在怎樣呢？你們見了皇太子，有些什麼結果呢？——什麼結果都沒有。我不知道那一個是對的，但是我想亦不必過分的譴責替漢米洛夫造謠。不必說：替漢米洛夫是個著名的叛徒，先是『人民自由黨』領袖之一，以後投降沙皇政府，並以此代替了加脫考夫的位置而為『莫斯科指南』的主筆，在數年前平安地死於蘇俄，他的自傳我以為是可信的證據。這自傳不是為刊佈而寫的，他是為着他自己而寫的，這是他的親密的紀事錄。在這自傳中我們可以找到替漢米洛夫對於『土地自由派』與『人民自由派』巨子之一亞歷山大·米哈衣羅夫的深刻的批評，替漢米洛夫說：他假如在另一個環境中，他必然要成爲一個極好的內閣總理，對比羅夫斯基亦有一個雖不得到然而毫無偏見與誹謗的觀察，我以為替漢米洛夫的文字是可以引用

的；我所以在此要加以說明，因為我在別個問題上也要引用他。爲什麼必要如此呢？且聽我的解釋。

再複述一遍七十年代罷工時，彼得堡工人政治智識的水平線是不很高的。假如我們能想到一九〇五年正月九日彼得堡的工人向沙皇請願的事實，那我們便不至於嚴重的譴責一八七八年向皇太子請願的紡織工人。但無論如何這個運動總算是俄國工人第一個政治組織的基礎，哈而杜林所領導的『俄國工人北方協會』的基礎。

在一八七八年罷工的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俄國工人北方協會』共有二百多人，但不久即瓦解了（二百人中有些叛賊把他出賣了），——這個協會的創設者的歷史，比這個協會本身的歷史要有趣得多。斯蒂班·哈而杜林，無條件的是十九世紀俄國工人中的一個偉人。我在『俄羅斯史略』中曾詳細的說過，但是那裏所講的，現在已經陳舊了。斯蒂班·哈而杜林的個人生活，比我當時所知道的，更要複雜更有味。那裏我只知道，哈而杜林是從工場裏出來的真正工人（大家都知道的，他之所以能炸燬冬宮，就因為他在宮內當過木匠的緣故。）此外並無其他了。實際上，哈而杜林却是一個使無產階級運動與鄉村中的民主派相結合的人。

物。他是維脫省某富農的兒子。他父親是很富的，在他死後，他的幾個兒子每人得到一千五百盧布的遺產，這在農民看來，是個極大的數目了。因此他不是一個鄉村中的貧人，他是從『鄉村中第一等的自由主義』的行伍中出身的，哈而杜林的父親，是一個信神極篤的人，到過耶路撒冷等處，其奴隸根性極深，然他不是農奴。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們覺得更奇怪的就是哈而杜林是一個純粹的工科學生。他畢業於（或將近畢業而未畢業）維脫——鄉紳議會所創設的中等技術學校，與現在的工人補習科相等，有機械學及物理學等等——，他幾乎畢業了，因之他的智識程度，不僅超出於他所組織起來的紡織工人的中等的程度以上，而且還勝過於彼得堡的五金工人。重說一句，他是一個很有智識的人，他是鄉中政治認識極高的人，他是個很複雜，很有趣的『混合』人物，他集有各種下層民主的，某種程度上無產階級的觀念。

至於協會本身及其綱領，我在『俄羅斯史略』中曾經詳加申述，所以在此地可以不必多說，僅請諸位注意其中一點：就是，這個綱領是很少革命性的。哈而杜林所創設的『俄國工人北方協會』，最好稱他為政治會社，因為他無論如何不是一個職工會。這會社的第一個任

務：就是宣傳與組織。很明顯的，他在政治方面對於自由宣傳的條件，並無具體的要求，會社的綱領只要求集會結社出版等等的自由，而沒有要求召集國民代表會。

這裏就可以看到當時的智識份子的讓步，因為當時的智識份子極力的否認議會主義，斯蒂班因之亦受其影響。普列哈諾夫說：他自己曾經極注意的研究過西歐的憲法，然而很奇怪，我所採用過來只是保證自由宣傳的那幾條。『俄國工人北方協會』還未提到奪取政權爲當前任務的問題。在這裏哈而杜林無疑地是要適應他所組織起來的紡織工人的政治水平線，他自己是一個政治人物，他對於『人民自由黨』的行動受印象甚深，後來并以此而喪其身，但是當他要去組織那昨天還向皇太子請願的人的時候，他就不能不顧慮到他們的水平線了。哈而杜林在他的政綱中甚至還談到基督教與宣傳者，可是他是在尋找羣衆所能了解的東西。

在很久的時間中，『俄國工人北方協會』曾被人認爲是七十年代俄國工人唯一的政治組織。現在我們特別知道，他非但不是唯一的，而且不是最有趣味的組織，在北方協會成立前三年，在南俄（阿結思）羅斯托夫便有另一團體之存在，這就是『南俄工人協會』。南俄工人協會的綱領，較之『俄國工人北方協會』的綱領革命得多。在『南俄工人協會』會章的第

一條上寫着：

『我們認爲現社會的秩序，不能適合工人的光明公正的要求，認爲工人要得到自己應有的權力，只有用暴力的革命來消滅一切的特權與特典而把勞動作爲個人的幸福的基礎。我們認爲只有在全體工人都完全覺悟了自己的狀況無路可走而整個的聯合起來的時候，這個革命才能產生，我們是南俄的工人，我們聯合於協會之中。本會定名爲「南俄工人協會」，本身的目的便是如此……』』

下面就是協會本身的章程了。我請大家注意這段序言在此地既沒有談到基督教及傳道者也沒有迎合彼得堡紡織工人的簡單頭腦的他種的曲調，而簡單的敍出自己的目的，便是暴力的革命——即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在這一點上『南俄工人協會』當然是站在革命運動發展更高的階段之上。在詳細的研究之後，才知道南俄工人協會的會員，要比北方工人協會更多（他約有七百人），其存在的時間亦更長，他存在的時期雖不到數年，但也有好幾個月。這是什麼原因呢？當然，不是在領袖的個人的特性，南俄協會的首領，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智識份子，貴族的若斯拉夫斯基。自然，他在行動方法上是一個有大方針的人。他的責任

之一就是不准七十年代那些革命的宣傳員到工人中間去。他很小心地把工人階級引到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影響之外。所以他與宣傳者中間之聯繫異常惡劣，這也就是他之所以無聞的原因。無疑地，他是一個全身致力於革命的人，而且爲了革命的行動犧牲不少（他爲了創設這個協會而充軍），他雖然創造了一個大的協會，然而他在當時却是默默無聞，連普列哈諾夫對這件事情也絲毫不知道。普列哈諾夫不知道南俄協會之存在（雖然他有知道之可能）；在協會的四週圍沉靜異常，所以連一些聲息都沒有傳到列甯格勒去。但我以爲南俄協會之特點若全歸功於若斯拉夫斯基，那是毫無根據的。當然，在他的不准小資產階級到自己的工人羣衆中去這點上，是可以稱揚的，而且就這點亦可以表示他是一個很能深刻了解事物根源的人。但是更重要的却在別一方面，在協會的社會基礎上。北方協會的特點就在他是紡織工人的聯合會，是昨天才從鄉村出來，與鄉村還保持一切聯繫的人的一個協會。南方協會則不然，南方協會主要的是五金工人。在阿結思有大的鐵路工廠，有俄國輪船商業會社的大造船廠，在羅斯托夫亦有大的五金工場。這個工人運動主要的就建設在他們身上，這個南俄工人協會的基礎，是應該鄭重的指出來的；因爲在以後當我們講到九十年代來及二十世紀初的工

人運動時，我們將知道俄國的工人運動之成爲革命的運動正在五金工人開始參加運動之時。五金工業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最主要的亦即最革命的工業，而五金工人則永遠站在俄國革命運動的前面，永遠是站在先鋒的地位之上。第一次我們就在一八七五年的阿結思及羅斯托夫的工人中間看到了。協會最後終於瓦解了，南方工人協會亦同樣地被警察所消滅。其結果則如我已經說過的一樣，若斯拉夫斯基被審詢並判決充軍。但是這個很明顯的工人自由思想的精神在南方還仍然存在，這可以把普列哈諾夫所寫的狀況來證明。普列哈諾夫在工人搗毀羅斯托夫警署之後一日到了羅斯托夫。他描寫這個運動爲一個簡單的原始的爆發，工人憤怒的自然勃發，而實際上無疑地三年前在南方的無產階級革命，便是這次工人爆發的基礎。

更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南俄工人協會與俄國工人北方協會中，曾有過很活動的聯絡。除哈而杜林之外，在北方協會創設者之中還有一個薇克多爾·奧勃諾爾斯基，他亦是純粹的半智識份子的工人，曾經到過外國，見過西歐的工人運動——總之他有廣大的遠甚於七十年代俄國無產階級普通的宇宙觀。但是現在知道這個薇多克爾·奧勃諾爾斯基是若斯拉夫斯基的學生，曾經做過南俄工人協會的會員。因此普列哈諾夫便有知道南俄協會的可能。但

是他從來沒有與奧勃諾爾斯基講到這個問題呢！抑或還是他沒有遇到奧勃諾爾斯基，（無疑地，在彼得堡無產階級中作工的時候他是可以見到的）或是其他的原因妨害了他，但無論如何我們在普列哈諾夫的書上沒有見到若干南俄工人協會存在的話。這是對歷史上批評很有價值的事實，這就說明，有時連現代人的證明亦不可信的。聰明的歷史批評家就可以根據普列哈諾夫從未提及南俄工人協會的事實，來證明南俄工人協會是一個幻想的東西。怎麼普列哈諾夫沒有提到他呢？但是這個幻想的東西却有其文件與簡章留給我們，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南俄工人協會之存在是無容懷疑的。無疑地這不是什麼幻想捏造的東西，雖在北方，在列甯格勒也許不著名。

在這個工人運動的基礎上在七十年代已經稍稍的開始鍛鍊成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了。我之所以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幾個字，只是我們已經用慣了這個不完善的名詞。事實上，馬克思與昂格思對於思想這個字，是這樣解說的，就是說，『思想』是某一社會階級在其階級利益的影響之下所造成的那種——虛偽的與虛假的圖畫——純粹的主觀的圖畫。因此便有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封建的思想，但是馬克思主義却不是工人階級的

行會的利益之簡單的反映，而是一種科學的理論，客觀的科學論；因此說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個名辭當然是不正確的，我們應該說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否則我們便把那種科學的理論（而且實際上是客觀的理論）與一切十八世紀的思想家空想家，盧梭，及空想的社會主義等等相提並論了。同時我永遠要嚴厲的指出科學的社會主義與空想的社會主義間之區別。我之所以讓步，所以常用『馬克思主義』的及『無產階級的思想』這些名辭，也就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這個不完善的辭句的緣故。

我們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便是在這個工人運動的基礎上開始形成的，我之所以說這句話，又正是因為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何時開始的意見與一般人的見解及普通書籍上的言論完全不同之故。戴衣却在回憶錄上關於普列哈諾夫之傾向馬克思主義是怎樣說的呢？戴衣却說：普列哈諾夫在俄國的時候，他不知道德文，因此他不能好好的研究馬克思的著作，常以杜林與馬克思相混等等，他有極不正確的社會觀念，染有民粹派的偏見。普列哈諾夫到了外國，學了德文，他才有可能去深刻的研究一切馬克思、昂格思的著作，自此以後，他才成爲馬克思主義者。戴衣却關於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萌芽，便是這樣說明的。這些

話完全是荒誕無稽的，因為普列哈諾夫的第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是在一八七八年列甯格勒做的，當時他還不知道德文，在他直接的觀察了彼得堡的工人運動，而去做了許多相當的結論。這篇文章叫『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與社會主義在俄國的任務』，載於一八七九年出版的第四期『人民與自由』上面，然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却還要早些，在一八七八年之末，他這樣寫道：

『無論革命者怎樣無根據的否認，然城市工人的問題總算是生活問題中最佔主要地位的問題之一。在過去我們常把自己一切的希望，一切的精神都放在農村羣衆之上，這并不是毫無根據的。城市工人問題在革命者的預算上常佔次要的地位，只在有剩餘力量的時候，才會顧慮到城市的工人問題。只是鄉村中爲了某種原因不能宣傳的時候，才會到城市中來做一回宣傳，而這宣傳的目的僅僅在想從城市工人中訓練出幾個到鄉村去的宣傳員，這種態度，當然沒有可能做有系統的經常的宣傳者，特別是沒有可能去組織城市的工人。因此使我們現在得到一種非常不幸的結果。

『在城市工人中所費的力量雖少，但是社會主義的思想却很深刻的侵入了工人的隊伍之

中。現在已經很難找到沒有社會主義者工人的工廠、製造所及大的作坊了。然無論這種現象是何等的可喜，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這些受宣傳的工人，在他們的同志中的狀況時，那就失去了大部份的意義，近幾年內來在大工廠及製造所中發生了幾次大罷工，那時我們的社會主義者在什麼地方呢？他們在這個運動中有些什麼作用呢？幾乎絲毫都沒有。有時簡直一無所聞，有時他們雖企圖行動，但他們的影響却非常之微。」

普列哈諾夫繼續說：

「同時我們對於城市工人應該像對於一個整個有獨立意義的羣衆一樣，應該尋找工具來影響這些羣衆。但在城市工人中只有訓練個人的材料時，這種可能是永遠不會有的。以城市工人爲次要意義的觀點妨害了我們以鄭重的態度去對待城市的工人。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呢？城市工人在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真的沒有重大的意義嗎？我以爲這種意見是十分錯誤的……」

「我們的城市工人雖然不像西歐的工人一樣與鄉村斷絕關係，但我們的工人是民衆中最活動，最容易接受革命宣傳的人。在這點上，我們的工人與西歐的工人是一樣的。」

下面一句，就是民粹派的調子。「因之工人是農民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最可貴的聯盟者。」

這裏普列哈諾夫還有民粹派之遺留，但是他所提出的實際方法，却在我們面前預示了以後整個革命運動的歷史。最先，便是組織的方法。

「爲了爭鬥，用爭鬥的方法，在爭鬥時，把羣衆組織起來！只有用這樣的方法，才能造成空前未有的、獨立的、自信的及強國的羣衆。從前因爲沒有這種方法，所以常被幾十個警士把大批的工人羣衆驅散，嚇跑。」

他說：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在羣衆的煽動。在什麼基礎上呢？

「羣衆有切身的利益，羣衆只注意工資之增減，廠主壓迫之大小，警察之兇惡。然社會主義者都在他們的面前講述各種不同的理論，號召他們去研究學識，去受教育等等，有時還要講些石器時代或天空中的行星等等的演講。羣衆將如何對待這些人們呢？他們將以爲這是與自己不同的人，他們將以爲這是與他們不同曲調的，有時甚至還要說些怪話去譏笑宣傳者對於未來的信仰與期望。羣衆并不知道宣傳者的言論與願望，到底對於他們有什麼利益，因爲他們不懂得石器時代的演講怎樣可以用來停止監工者的兇暴行爲。」

因此，煽動是應該建築在工人階級的日常需要之上。同志們！我們若知道黨史及職工運動史概畧的時候，你們就知道九十年代的『論煽動』的小冊子有怎樣偉大的意義。這小冊子上講的就是在工人階級日常利益的基礎上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爭鬥的問題。這種關於煽動的思想當普列哈諾夫在土地與自由黨時代（人民自由黨出現之前）所寫的小冊子中就已經有了。

普列哈諾夫說：煽動是影響羣衆的方法。『用煽動來影響羣衆，其所得的效果與其所達到的目的較之我們過去所用的那種影響個人的方法，來得更大而且更快。』

他不僅預言了『煽動』的思想，他並且還預言了在沙皇政治環境之下，俄國工人運動應取的形式：

『從此產生了擴大組織的困難，參加秘密組織的人，應以絕對的忠實與能力來對付這個困難。『異常的祕密與極厲害的應付暴力的手段』是一八二四年前英國工人運動之特點，當他們知道必須用暴力來對付暴力的時候，決沒有一個稍有思想的人會罵他們妄用手段。……』

以下土地自由黨之思想又落在普列哈諾夫的身上，他把工人階級的暴力描寫成小資產階

級智識份子的恐怖形式。然無論如爭鬥的、祕密的工人政黨的思想，未來的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思想，普列哈諾夫在『土地與自由黨』時代，在一八七八年末所寫的、一八七九年年初所發表的文章上已經完全具備了。這一點對於我們很有價值，因為從此可以證明，普列哈諾夫之所傾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態度，並不是如戴衣却所說的由書本裏來的，而是由於實際生活，由於他所看見的實際爭鬥而來的。普列哈諾夫所以成爲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像戴衣却所說的是因爲他研究了馬克思的原稿，而是因看到了工人運動之真面目，而且只有這個工人運動才能推動他去研究馬克思的著作。這事實記憶在腦子裏，就在方法論上亦有很大的益處的，於此可以了解思想之產生：思想永遠是在某種實際情形基礎上產生的。

很有趣的，戴衣却沒有注意到普列哈諾夫自己在『俄國社會民主運動的開始』一文中，就已經把自己傾向馬克思主義的事件加以解釋了，他與羣衆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差不多。普列哈諾夫說：『我們每人都從俄國帶來了多年革命煽動的經驗，并多少覺悟到這種經驗與「農民騷亂」的理論大相矛盾。這種覺悟是極痛苦的，我們每人都想應用真正的革命思想。』戴衣却自己亦引用了這段——我便是從他那裏引來的（『勞動解放派』第五集二百七十二頁）但戴衣却却

依然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

我現在要轉述七十年代一個革命派別行動的方法，即不建築在工人階級的身上，而主要的是建築在資產階級身上的行動方法。

什麼東西推動當時的革命者到暗殺的路上去呢？爲什麼他們進行那種愚笨的暗殺官僚行刺沙皇而不去進行羣衆的鼓動呢？我想我上次所引替漢米洛夫的文字已經給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答覆了。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如此，在七十年代的中葉，運動已達到很高的熱度，使得革命者不能僅限於空口說白話了，他們無論如何應該開始行動。那麼幾百個人的小團體怎樣能夠開始行動呢？你們也許要說：他們可以向工人羣衆進行工作，推動他們去革命。但是在彼得堡（這是革命運動的中心）工人羣衆的水平線還是這樣低，他們還要向皇太子去請願。很明顯的，依靠這些覺悟程度低淺的工人羣衆去進行革命的鬥爭，那當然是不可能的。農民呢，農民當然比工人更難成爲革命的基礎。那末怎麼辦呢？只有自己來幹。所謂『自己』只不過是幾百人而已。依替漢米洛夫的計算，在執行委員會的四週圍聚集了五百人左右，這數目是很可靠的，因爲替漢米洛夫對於『人民自由黨』的執行委員會內一切的情形是很清楚

的，這五百人，因為客觀的條件及其他原因，除了與政府游擊戰鬥之外別無方法。他們認為，或則空談了事而毫無動作（這是他們自己所不滿意的），或則應在游擊的行動之下作些事件，這種游擊行動，最後便成了恐怖手段。當時的技術也幫助了他們。因七十年代正是暴烈物發展甚盛的第一個時期。正是硝酸鹽、炸藥、棉火藥出現的時期。從追念喜臘波夫的回憶錄中，我們對於這個『人民自由黨』的首領會發生一種極神怪的感情，他用一大塊的火藥，一小塊東西，在家中用手工業的方法準備之後，即可以產生極大的震動與可驗的破壞力，——炸藥成爲鬥爭的技術的工具，這工具使得游擊性的鬥爭確實變成了令人驚恐的東西，幾乎炸了沙皇的專車，炸皇宮，最後，炸了沙皇本人。

當時的反動份子之一，警務總監圖而腦夫很正確的說：恐怖手段對羣衆的影響比較這恐怖手段的直接結果更大。當替漢米洛夫在叛變之後與他談話時，替漢米洛夫說：實際上說來：當時政府方面何以這樣恐怖呢？他們只不過絕少數的人而已。圖而腦夫回答道：是的，人是很少，但是這少數人有這樣的行動工具，使得他們所有的結果要比他們的數量超過幾倍。這當然是很令人注目的。我以爲人民自由黨的策略，在客觀上說來，決不能以之和社會

革命黨的恐怖政策相並論，而一概無條件的加以否認。爲什麼社會革命黨在二十世紀初的恐怖政策是完全不實用的呢？這就是爲了下面這個簡單的原因，因爲在一九〇五年時我們已經有了革命的羣衆，所以進行游擊爭鬥是毫無意義的了，我們更號召羣衆，引導他們到武裝暴動的路上去，而不是在恐怖手段之上枉費氣力。但是這些條件，在七十年代是不會有的，當時沒有能夠武裝暴動的羣衆，因之，當時的革命者，只有走上恐怖手段的道上去，採用游擊性的行動，否則他們便要陷於空談，無補實際。

一九〇五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說，我們在實際上並未拋棄游擊性的行動。一九〇五年的二月的暴動是什麼東西呢？十二月的暴動也是純粹的游擊的行動，只不過是武裝的人數多一些，與人民自由黨的形式略有不同而已。試把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暴動與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暴動比較一下，我們正確的圍攻軍官學校，我們正確的進攻皇宮等等，難道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我們有些與此相類的行動麼？誰參加過的請回憶一下，或去問一問記得的人，那他們完全知道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我們的策略是純粹游擊性的策略，只不過是他的風格與人民自由黨的游擊策略稍有不同罷了。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我們不會有赤衛軍、不會有整團的兵士

站在我們方面，不會有砲隊，所以除了游擊戰之外我們別無出路。因此，人民自由黨的策略是從他們所處的環境之中產生出來的。

但是這個策略，又必然要使這派的綱領與其思想發生變化。以普列哈諾夫爲例吧，普氏宇宙觀的基礎都是事實而不是書籍。人民自由黨人便可做反面的例子。你們知道，有兩個革命的組織，在七十年代在一八七八年——一八七九年間有『土地與自由黨』的成立，以後在伏羅城大會上發生分裂，在一八七九年七月組織了『人民與自由黨』。我爲着對於這段歷史不大明瞭的人，所以在此地重提一句。在菲克納爾的筆記及替漢米洛夫的自傳未出版以前，大家都以爲『土地與自由黨』是個宣傳的組織。只有『人民自由黨』才是純粹的恐怖的組織，在菲克納爾的回憶錄中已發現了這樣的事實，即『土地與自由黨』比較上還是一個好的組織，而不像宣傳的組織，而替漢米洛夫則在自傳中直接的說：在一八七八年及一八七九年時在『土地與自由黨』中宣傳僅僅是一個表面，鄉村中的黨員，在農村中團結起來，就在那裏進行宣傳，並夢想着中央對他們的領導。替漢米洛夫說：在實際上只有傳統的習慣才會幫助這類宣傳的組織。因爲在歷史上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能夠與舊的行動方法、舊的習慣、舊的口

號，立刻斷絕關係。因此對於鄉村中的工作人員，也只能陸續的給他們些書籍，其全部精力還是集中在恐怖鬥爭之上。當鄉村工作人員到彼得堡開大會的時候，他們彼此常常吵鬧起來，罵將起來，以後他們又回去了，但彼得堡之中心，却依然如故，繼續工作。與鄉村工作人員吵鬧之後，用甘言密意的話安慰他們一番，使他們不要氣憤，把他們從彼得堡送走，叫他們幹以前的舊工作，實行恐怖的手段，或如常時所說的，破壞國家的政權。

你們在我的「俄國史」中可以看到我對下一個時期的分析（伏羅城大會）後人民與自由黨時期。「俄國史」中對於這次大會的歷史說得很簡單。在伏羅城大會之後「人民自由黨」則成爲公開的恐怖的組織，而鄉村派則組織「平民改進黨」。當時真正的革命之中心便是恐怖，因爲「平民改進黨」什麼事情都沒有幹；他們不懂沒有努力的幹，實際上是完全沒有幹。

從一八七九年夏天起，「人民自由黨」的執行委員會，有一個著名的決議，把爭鬥的全力集中在亞力山大第二個人身上。從此以後便獵逐這頭戴皇冠的野獸，一直到一八八一年三月爲止。這獵逐的歷史我不再加以複述。這是革命黨人可驚的英雄氣概的表現，在這一點上我們知道，這是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唯一的時代。但是我想講一講別方面的情形。「恐怖手

段』無疑的，必須要一些物質的工具，必須要炸藥，必須要試驗室，而這些試驗室又必須要錢，錢從那裏來的呢？後來，『人民自由黨』的歷史家如巴加却而斯基之流，便否認『人民自由黨』曾受他人的津貼，他們敘述『人民自由黨』的經費是異樣的拮据等等。這當然是完全不對的。這是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對俄國革命運動的解釋，他們總想說明這運動是個幼稚的可笑的運動，藉以證明俄國的革命運動之失敗，而只有資產階級的方法（主要的是入宮請願等方法），是唯一的實際的方法。實際上，『人民自由黨』以及以前的『土地自由黨』，都會從資產階級方面得到大批的款項，一部份是從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黨員那裏來的（如李查爾及伏衣那卻賴而斯基）一部分則從資產階級的捐助而來的。資產階級對革命運動的態度與農民完全不同。——關於這一點菲克納爾在自己的回憶錄上舉了許多例子，這許多例子他沒有綜合起來，沒有加以解釋，只是單個的把他列舉出來。我們見到有時公證人給他們以援助，有時特別地方議會的主席，及市政局的主席都給以助力等等。他們都同情於他們，幫助他們，給他們一些錢，這小小的數目，集合起來，便大有可觀了。這數目比巴加却而斯基所說的及我在『俄國史』中所敘述的還要多。經費他們是有的。物質上他們是依賴資產階級，

這物質的依賴逐漸使『人民自由黨』在實際上喪失其社會主義性。『人民自由黨』的首領喜獵波夫於是便開始勸告一般人，在恐怖與土地革命及沙皇與土地問題的文章中開始隱藏『共和國』這個名辭，『人民自由黨』說：他只領導人民到立憲會議為止，以後怎樣管理國家由人民自己去決定。菲克納爾在審判的時候說：共和政體或君主政體的問題他們沒有提出過，將來究竟是何種形式，對於他們仍屬茫然。這就是說菲克納爾在一生最痛苦的時期，在死的危險前，把自己的思想降低到解放派一樣，解放派內保全統一與不分裂起見亦沒有提出共和政體或君主政體來，如此提出問題，這並不是他個人的事情，以前喜獵波夫在軍官面前也會說過同樣的話，免得他們害怕『人民自由黨』那種純粹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此種物質依賴的『人民自由黨』那種影響之下，竟逐漸減低了這個運動的口號。喜獵波夫說：『我們目下唯一的任務就是要達到民主的憲法。我們這樣始能得到社會的同情。必須避免那些使我們脫離自由主義的社會團體的方法。』（見亞克雪洛得的回憶錄）

很顯然的，正在最苦悶的時期，在三月一日前夜（三月一日不僅是亞歷山大第二壽終正寢的日子，而且是人民自由黨執行委員會實際上去世之時，後來人民自由黨只是空有其名）

正在這個時候，「人民自由黨」才開始感覺到那種真能把俄國的革命運動從可恥的，從大腹賈的附屬（這是目前社會革命黨的口吻）地位中救出來的革命力量，這個力量就是工人階級。

第五講

前面曾經講過七十年代俄國革命運動的二個方向，這二個方向，即淵源於曩日趨向農民而迷途忽悟的那個方向。在七十年代中葉，有一派革命者，深信農民在政治上無所動作，和沒有號召農民羣衆運動之可能，及從事工人階級運動，很奇特的，自來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史的篇幅，沒有表彰過這一派。屬於這一派的，有智識分子中聲名未著的沙司拉夫斯基和大名鼎鼎的普列漢諾夫。至於工人運動的事業家——工人，不待說是屬於這一派。另外一派則從事運動資產階級，此派的領袖為希臘波夫。前次我已經講過，『人民自由黨』是第一個方

向的代表（趨向資產階級），這對於『人民自由黨』的策略和綱領，實有莫大的影響。資產階級給了一些物質的資助，然而因此幾乎取去了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的社會主義的精神。

資產階級所供給的資財，除只敷一些謀殺恐怖的組織以外，凡爲鬥爭必要的資料，資產階級沒有絲毫幫助。『人民自由黨』的軍事組織，是最類似資產階級的組織，類似小資產階級的組織（小資產階級的組織當然要反映資產階級社會的心理），這個軍事組織，經過了好些時候而無所表白於世。很奇特的，凡研究『人民自由黨』歷史的俄國智識份子，無不醉心於研究投擲炸彈和放射手鎗之事，總而言之，即注意那些儼似威廉特爾——（瑞士的刺客——譯者註）和舍洛特柯德（法蘭西的刺客——譯者註）一流人物的英雄偉業。只有飛哈尼爾的著作，只有

向影布林尼爾的近著出版以後，我們現在才略知這個手工業式而百發百中的破壞的恐怖的組織，才略知這個較近羣衆的組織。這個組織是『人民自由黨』的軍事組織，正確些說，是『人民自由黨』的軍官的組織，參加這個組織者，不下二百個軍官，——若將表同情者算入一起，則其總數有五百個軍官。這樣看來，這個組織的人數，比十二月黨要少些，十二月黨的人數已至二百人左右，並須看是否將運動的同情者計算在內，抑或是只限於參加運動的

積極份子。

然而兩者有很大的差異：十二月黨人當時的力量與『人民自由黨』人相差，可是十二月黨人有二次的軍事運動，——一次是赤爾尼果夫斯基團的真正的武裝暴動，『人民自由黨』人的軍事組織，熱心研究祕密的著作品，頗誠敬的援助『人民自由黨』的宣傳員，最後，較奮力的個人，如海軍大尉蘇漢諾夫，和中尉羅哈赤夫等等，曾給他們實行恐怖手段的戰士。但是，無論什麼軍事陰謀，無論什麼武裝暴動，『人民自由黨』人始終沒有做過。此其所以奇特哩。『十二月黨』人在其運動中期望什麼呢？『十二月黨』人在兵士中間做過宣傳，不過如滄海之一粟，爲量無多，且這個宣傳，在『十二月黨』人並不是主要的柱石。對於『十二月黨』人，尤其是北社主要的柱石，便是那種傳流的盲從的軍營的紀律。他們利用這個紀律，期望各團部轉而反抗君主專制。當比斯特爾說及運動各軍團時，他心目中是認定準備宣傳各軍團的兵士。但是要宣傳整個軍團至最終一人爲止（軍團有四萬人），工人受其宣傳，無論如何，顯然做不到的，然而他們的計算；只要各軍團的指揮官或將軍們，能參加陰謀的組織，他們便能任意調動其軍隊了。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便沒有這個死的肯服從的軍營紀律了。只有普通的當兵的義務；當時的兵士，是從工廠或田間跑出來的，必須開始有好好的宣傳，才能依賴他們。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軍事運動，於是便須依賴著團內的羣衆運動，羣衆運動溫度之高下可以決定軍事運動溫度之高下。例如一九一七年雖然沒有什麼軍官的陰謀，——正確些說，甚至還反對另有用意的軍官陰謀，即將軍克林謨夫的陰謀，——但是當時受過宣傳的高壓之下的聖彼得堡的衛戍隊居然暴發起來而推倒了君主專制。在八十年代，這個宣傳羣衆的工作，還是沒有什麼多大的效果，所以『人民自由黨』的軍官組織，完全無所作爲，甚且不願再有所作爲了。此後祕密著作的閱讀，對革命者的幫助及個人參與恐怖行動的消息，在這個軍官組織中竟杳無聲氣了。

於是『人民自由黨』的領袖，希臘波夫本人的著作，復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證據，認爲資產階級的運動，必須以羣衆爲依歸。他的著作，即是工人的綱領，是『人民自由黨』的綱領，我前次已經講過了。希臘波夫，是『人民自由黨』人深知工人運動有怎樣意義的有數人物之一。俄國的罷工，是政治的事變，這個名言，是出自希臘波夫之口。希臘波夫即按此方

面去做，而注意於都市的工人階級，比之過去的民粹派，更爲深切著名，他的綱領中，你們決然可以找到一切民粹派的色彩：相信公社中農民是主要的力量等等。但是其中亦有最奇特之點，認定工人階級有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雖不適宜於非馬克思主義者希臘波夫，然在此亦會一用）階級的作用。在他的綱領中，我們最先可以達到一種思想，這種思想以後曾經實現出來（這種思想究竟如何實現的，我們『波爾雪維克』，現在可用不着解釋），這種思想，就是獨立的革命的工人的政黨的思想：『希臘波夫的綱領說，工人們堅決的認爲，現在的秩序和一切人民的生活，必須加以改造，必須造成一些不大的，但是友誼的工人的社會（團體），說明自己必須達到的東西，並準備自己在一定的時候，必須共同努力，出而完成革命。工人團體，應當秘密，以免政府襲擊。』工人的組織，對於民粹派更爲出奇，他們準備祕密的工人組織，不僅是爲着革命的時機：『倘若政府恐懼全體的騷動，而決定向社會作什麼讓步，換言之，即施行憲法，此時工人的活動，不應因此而有所變更。他們應當表現自己的力量。應當要求大大的讓步，應當提出自己的代表到國會中去，遇必要時，並可用羣衆請願和羣衆騷動的方法，以擁護此種要求。』在這裏我們已經看到，這完全是明確的

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了。這個民粹派和人民自由黨人所手創的綱領，其在革命本身的批評，簡直是些預言：爲事業的勝利計，擁有各最大都會或保持不失，這是極端重要的。本着這個宗旨：凡暴動起來的國民，要馬上掃蕩都會的敵人，應當從工人中，或從有聲望的忠實於國民事業的人羣中選出自己的臨時政府。臨時政府須擁有武備，以防禦都會，勿爲敵人所犯。並盡量幫助其他各地的暴動。工人須目光如炬的注視臨時政府和迫着臨時政府爲國民的利益而施政。」在一九一七年，工人們經過工人代表蘇維埃曾經目光如炬的注視了臨時政府，工人們卒確信臨時政府是一無所用的，且應當拋棄這個政府，難道這不是一樣的嗎？這樣看來，這個綱領是十分有興趣的，因爲他對於組織的祕密的革命工作及羣衆的策略有先知之明，換句話說，這個綱領不但看見了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〇年的波爾雪維克及他們在國會中的轉機，甚且還預見了一九一七年被工人階級所監視的臨時政府。希臘波夫已經認識了，趨於資產階級的方向，沒有效果，他遂趨於另一個方向，即羣衆的方向，但是這個羣衆，不是他們先覺者所號召不來的農民羣衆，而是工人羣衆了。所以八十年代俄國破天荒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勞動解放社』的出世，完全不是出人意料的事實，亦不

是普列哈諾夫及其朋友們的著述事業所可解釋的。這種事實，已由俄國過去的革命運動史所養成；這種事實，已由普列哈諾夫受聖彼得堡的罷工的影響而起的思想上的變化所造成；這種事實，也是由希臘波夫的綱領中所說的『人民自由黨』人方向的變更有以成之。

自然而然的，八十年代第一個社會民主黨——『勞動解放社』的綱領，更爲堅決，其離開舊觀念亦愈遠。你們知道，『勞動解放社』的綱領是有兩個。一個是一八八四年的綱領，另一個是一八八七年的綱領（一八八八年公布的）。倘若把這個綱領加以比較，可知這些綱領是非常奇異的。在第一個綱領中，說及農民，只是一個客體的而不是主體，只是被動的，而不是自動的，這是一八八四年的綱領。這個綱領，使人民改造社的社員對於他們自己在未來所寫的綱領，頗吃驚不少。綱領的結句說：『組成俄國勞動農民最大的部份的農民，「勞動解放社」決不願有所忽視。這點特別鄭重聲明了，所以必須特別鄭重聲明之故，即因爲以前「勞動解放社」的綱領，與農民隔絕了，不將農民當作自動的能力。該綱領規定說：在現在這種社會的和政治的鬥爭情形之下，智識份子的工作，首先便應該注意於人民中更進步的份子，即產業工人。得到這部份人民的援助後，若一有宣傳和鼓動的自由之時，則社會主義

的智識份子便能擴大其影響於農民之中，而更有大的成功之望。』影響農民，當以革命爲依歸，因爲要達到宣傳和鼓動的自由，只有在革命運動勝利之際（雖然不是完全勝利）才有可能。

『勞動解放社』的第一個綱領，全是華而不實的空套文章，——只根據我引證的幾句話，便可看出。在第二個綱領中，沒有這種華而不實的空套文章了。此地居然視農民爲反動勢力，不能有所希望。第二個綱領非常嚴厲的說：『俄國的革命運動及其勝利，對於農民首先有利，但農民差不多完全袖手旁觀，漠不關心。農民在政治上無關痛癢和智識落人之後；即是專制主義最安穩的磐石。所以上等階級中有智識之士軟弱和怯懦，便是此種現象之必然的結果，雖然他們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利益與現在的制度，大相逕庭。』這就是說，資產階級之畏首畏尾，農夫俗子應尸其咎。因爲他不學無術和政治上的無關痛癢。』他們（尊貴的資產階級）以國民的名義，奔走呼號，而農夫俗子對於他們的呼聲，則常懷冷靜的態度，由是我們的智識份子，政治的見地便失掉了固定性，垂頭喪氣心灰意冷，覺得事勢至此；完全沒有希望了……』這樣一來，似乎在俄國只靠一種農民，時事是毫無希望的，——不如收拾

行李走到別一國內去吧！俄國將無革命可幹了……。」所幸俄國經濟已發生變化，而造成勝利的新機會，有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新人物了。農村公社的解體，造成俄國新的工業無產階級。這個新階級，比之落後的鄉人，其響應革命者的呼聲，更易感受，更易流動和更易進步。宗法社會的經濟條件，鑄成農村公社的理想而沙皇的君主專制在政治上從而增益之——工人階級的命運，只有發展新的更自由的生活形式，才能得着改善。惟其有這個階級，我們的國民才能在經濟的條件上，與一般的文明國民並駕齊驅，亦只有借助於這個階級，才能參與文明人類先進之域。根據上述的理由，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建設革命的工人政黨，乃自己第一的和最主要的任務。」

卒之，矢志不渝而策馬渡江了，始則口欲言而囁嚅，只謂農民不可利用，一到一八八七年普列哈諾夫乃確實聲明：依靠農夫俗子，政治上是有害的。這個聲明是非常重要的，從來孟什維克的著作，尤其是在一九〇五年我們在第一次革命時的孟什維克的著作，始終是堅持着普列哈諾夫的傳說：期待農夫俗子，沒有絲毫利益；農夫俗子天性上是反動的，無論什麼運動，一與農夫俗子相接觸，便拉向後去了。這樣，誰可為工人階級的同盟者？自然，這是

——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軟弱和變節，據普列哈諾夫的意見，以為便是因為農夫俗子的蠢笨和怯懦有以致之。若無農夫俗子，則我們的資產階級庶乎完全不同了。看呵！這個立論，實際上是根源於反對民粹派的革命論，矯枉過正而來的。這個立論，在『勞動解放社』兩個綱領中說得異常顯明。於是孟什維克所有的期望，都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身上。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孟什維克與我們波爾雪維克意見的分歧，恰恰是這一點，因為我們期望工人階級和農民。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十分重要，且值得研究的，因為這個問題，至今仍保留其所有的實際意義。我們有無什麼機會利用農民在政治上作為革命的進取的力量呢？抑或農民是羈絆我們雙足的重錘，使我們步伍遲緩，轉而向後退却呢？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這個問題是至今天猶有實際意義的。若你們考查一下不久以前一些人的爭論，那末在這個爭論中間：即能分出二種聲調。一種聲調說：應當與農夫有強固的聯合，應當與他們攜手偕行。另一種是孟什維克的聲調，說：一與農夫周旋，便忘記了工人階級的利益。應當少注意農夫而多注意無產階級。我們若深究這個爭論，則知是繼續八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十年內的爭論問題。所以我說這些問題是值得討論的，並且在一般的特點中，我希望得出一個略圖

來，一方面，是俄國第一次革命時的工人運動略圖；另一方面是同一時期的農民運動的略圖。然同時，因我此次的演講，無須說及事實方面的詳細材料，像我在舊史威特羅維亞演講時所用的材料一樣，故我甚覺愉快。當我在那裏講我的『俄史要略』時，第三卷尙未付印，現在却已出版了，並且有相當的材料，可惜這些材料有些陳舊，因為這些材料我收集了好幾年且大部份是革命前所收集的，然而總算有材料就是了。此外有昔多羅夫所特製的關於俄國罷工運動的圖表，此種圖表可爲考查工人運動的參考，不過這些圖表，應該再加上一些說明才好。

所有昔多羅夫的統計表，對於我們現在所要的問題，可爲便利的出發點。他的觀點，是認爲俄國的革命是絕對的工人的革命，他竭力找出一切的證據，說俄國的工人，不但在歐洲是最革命的工人，即在世界上也是最革命的工人。因為這種關係，他引出了許多統計表和圖表，來說明工業的集中和工人階級會聚於更大的企業中，俄國比之其他各國是有更便利的條件，甚且比較美國亦更爲便利。例如：一九一四年俄國有一千工人以上的大企業，共有一、三〇〇、〇〇〇人，——而在美國同樣的大企業共有一、二五五、〇〇〇人。同一時間內，

美國每個大企業的工人平均數爲一、九四〇人，而在俄國甚至一九〇二年已有二、四九〇人了。同一時間內俄國每個有五百工人以上的大企業中，其工人數量等於俄國無產階級總數五六·五%，在美國同樣的企業中所佔的工人數量只爲三一%，——美國其餘六九%的工人則分散於更小的企業中。當然，這是不錯的和有興趣的事實，不過這些事實須加上幾點更正。關於這些統計表的更正，有施拉普尼可夫論一九一七年的著作，該書中有個極有興趣的指摘。施拉普尼可夫的書籍，是研究英國、法國和俄國的工廠的一本著作，他指出一個奇妙的事實，他說：俄國因爲勞動便宜之故，在最大企業中常使用人力，去執行西歐用機器來執行的工作。所以當你們看見美國各個大企業工人不到一千人，而俄國每個大企業中已有二千五百人的時候，當然，這個數目，按其本身來講，并不足以證明俄國的企業在經濟上大於美國的企業。這只是指出，我們勞動力的便宜，因此就有大批不熟練的勞動代替美國用機器去做的工作。這種註解，是必要的，我們一切的批評，都應有此種註解，所謂五百工人和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亦應加上這個註解。惟其有這個原因，所以在美國有四百工人的企業，事實上，可以大過於俄國有六百工人的企業。計算企業大小的時候，不僅要看其工人的數量，還

要看其使用馬力的數量，看其工作，結果，生產品的普特數量，據這一點來說，美國的企業當然高些。所以這一點要鄭重聲明，因為不如此，則我們所得的圖畫、實際上，將如昔多羅夫所描寫的圖畫完全一樣；他所想描寫的圖畫，當然是不對的，他以爲俄國的資本主義彷彿是最進步的，因此俄國的工人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也就更有準備了。

我們絕不責備某人，若果某個馬克思主義者真能指出現有的事實（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直接考察真理），俄國的工人階級對於社會主義雖有絕大的天性的吸力。但在一九一七年時，俄國的工人階級對於社會主義却並沒有充分準備。所有曉得歷史辯證法的人，絕不會吃驚，人可爲天性深厚的社會主義者，但同時却又不曾自覺的實現這個社會主義。恰恰相反，這個矛盾是非常奇特的，且這個矛盾，我們在歷史中到處可以逢着，這個矛盾，我們可從人的天性的憬悟和人用以實現這種天性憬悟所具的手段之間去找解釋。在這個手段，必要的組織等等的意義上說來，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工人階級，實在沒有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這是毫無疑義的。反之，我們在現在，在一九二四年較之一九一七年又要有準備得多。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工人們新加入黨，第二次的徵求黨員，——這是非常顯明的現象。這已經不是盲

目的動作，而是到了相當程度的覺悟的動作了，這個動作的結局，可以造成許多善於實現社會主義的能力的人們，在過去，這些人們，天性上是波爾雪維克的革命者，是憤激的，熱烈的仇視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人，但是怎樣從天命的資本主義範圍中挽救出來並過渡到新的經濟形式去，他們却是不了解的。這個更正應加上圖表中去，尤其要加上昔多羅夫同志的解釋中去，這是十分必要的，否則，我們便要得到不正確的圖畫了。但是在其他各方面，這些圖表可給一些最有興趣的事實。舉例說，這個圖表，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運動的性質，說得非常之好。看看那些表明俄國罷工次數的圖表吧。圖表中直線最長的是——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你們看呵！這個直線，如像噴泉從地中湧現而出直上雲霄一般。描寫俄國工人運動的革命性質的圖表，決沒有比這個圖表上昇得還要厲害的。這不是進化的運動，不是逐漸上昇的運動。經濟的鬭爭，常有此種一步一步上昇的運動。你們看看昔多羅夫關於工資一欄的圖表，此地就是逐漸上昇，上昇和上昇的直線。你們一看形容政治一欄的圖表，那末便可看出這個直線，突然上昇，如噴泉沖天之勢。當然無組織的革命運動，是非常之多，圖表中已完全表示出來形容出來了。此處尚有一些十分真切的經濟的和政治運動的反映。你們看政

治的罷工較之經濟的罷工，是何等的急劇。這些圖表，指出得十分顯明，但是你們可以自己
去研究，我用不着多講了。從這些圖表看來，無疑義的，工人階級在俄國幹過革命，並掌握
過革命的領導權。

所有這些，就是我們對於運動的了解和八十年代的人們對於運動的了解，兩者不同之
點。那時的人認為好似工人階級只是孑身孤行，或則引着資產階級，鼓其勇氣，使其信仰將
來，使其期望自己的力量，由此鼓勵資產階級與君主專制相戰，——一八八八年『勞動解放
社』的第二個綱領，就是用這些話來做收束。

但是，無產階級還要引導誰人，從這些綱領中，是頗難認知的。我們波爾雪維克就不同
了，我們認為俄國的革命，所以如此者，只因追隨工人階級之後和在工人領導之下而跟着前
進的還有好幾部份勢力：即農民。這就是農民參與俄國革命的概況，現在我想稍為說一說。

一九〇五年我們的革命，是否如昔多羅夫同志所想像的一樣，是純粹無產階級的革命
呢？我以為這個革命是工農革命，現在我想儘力把我們所有關於革命的農民和農民與工人運
動相關聯的那些事實，概括的指出來。

沒有論及本題以先，我們應當回憶俄國革命的第三個原素。究竟智識份子逃往何處呢？我們的革命運動，本來是智識份子創始的。十二月黨人起義以先，步其後塵者爲比特拉歇夫派，六十年代的人物。末了有宣傳的民粹派和『人民自由黨』人，實際上到還沒有智識分子的組織。這些革命的智識份子，此時究竟逃往何處呢？智識份子究竟逃避了沒有呢？這裏有一種事實，必須鄭重聲明的，本來我們的革命的工人的組織，出世非常之晚。且當工人政黨的思想已經存在，和工人政黨的本身已經組成之時，指導的作用還仍是屬於革命的智識份子的。

俄國的革命運動，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自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至八十年止——可謂智識份子尋找羣衆的時期。智識份子初在農民中尋找羣衆，以後在工人中，甚至在資產階級中，及軍官中去找羣衆。智識份子尋找羣衆而沒有遇着羣衆。第二個時期，是由八十年代起約至一九一〇年之間爲止，此時智識份子已經找着了羣衆。智識分子雖找着了羣衆，但是還沒有與這個羣衆混合和團結，因爲這些羣衆是逐漸及無組織的激勵起來的，這些羣衆在思想上與革命的智識份子相距，有十萬八千里之遠。

現在我必須稍退一步，來說說思想是什麼？這個問題。袁治緬主義，是以研究科學爲宗旨，一般說來是對的，他研究純粹的客觀的條件，不訴諸主觀的條件，——在袁治緬主義的影響之下，關於思想的問題，於是發生了不良的傾向，這個傾向，布哈林同志已經有過更正且好好的更正了。

我們不能把思想認做鏡子，只是被動的反映一些神經發生的運動。這種觀點，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不正確的觀點。客觀並不在我們訴諸非心理學的事實，而在於我們訴諸客觀上必要的和客觀上適合某一社會階級的利益的事實。這就是決定思想的客觀。主觀之爲物，多少是偶然的和個體的，且在一般上沒有意義的。故凡是在客觀上適合於階級利益者，皆爲客觀的事實，姑勿論他主觀的和心理的因子，是『精神的』因子——，對不起，袁治緬主義者的同志們。袁治緬主義者，當然要大笑特笑，但是我引用這個術語，爲的是要加重語氣，指明精神的原子，可以完全是客觀的。

思想，這是已知的觀念、概念、綱領等等的總和，這是思想的因子，『精神的』因子，——然而這完全是客觀的事物，爲社會運動客觀上所必要。爲使人們一致的和有組織的向一

定的方面去做，必須要有一定的俗尚、習慣、趨向，藉以推動人們到這個方向去。這是純粹的客觀的工作，我們所做的宣傳和鼓動，實際上就在這裏。所不同者，只是鼓動多半是喚起人們的情緒，而宣傳主要的是在培養人們的智能，但或此或彼，鼓動宣傳，均是一種手段，用以組織我們的心理，使其適合於我們所要做的行爲。

故在全國造成正確的思想，造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情。在西歐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做過這個工作了。在俄國方面，主要的是列甯和波爾雪維克執行了這個任務。孟什維克所造成的思想是不革命的，因此不適合於俄國革命的工人階級前面的任務之客觀的要求，——這個任務，是進行革命、奪取政權、顛覆君主專制，由顛覆君主專制轉爲國民獨裁。

這是二十世紀初葉二十年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列甯及其團體（波爾雪維克多數派），另一方面是馬爾托夫及其團體（孟什維克少數派）。這兩個團體中間所發生的思想上的鬭爭，其意義，——其偉大的意義，就在這裏。第一方面，是想在思想上組織這個革命的羣衆，使羣衆能執行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則竭力渙散羣衆，這當然不是願意如此的，而且是沒有

想到的。這就是後者之所以大受資產階級的歡迎，資產階級不怕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和奪取政權的緣故。本來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和奪取政權，是資產階級的魔鬼，不過孟什維克破壞了這個魔鬼，所以孟什維克得到資產階級偉大的同情，反之波爾雪維克越發展，這個魔鬼愈厲害；所以波爾雪維克，成爲資產階級仇視的對象了。

因此智識份子的勢力，便好像機器一樣，完成了革命的思想，建立了實現革命目的應有的組織，——智識份子的勢力在這個時期是雄厚的；智識份子的勢力直到現在還是很大的，雖然現在趨於低落；現在智識份子的勢力的意義比以前少些，比第一次革命時期少些，智識份子在這個時期內的意義，我們可用一個口號表現出來：即『智識份子找着了羣衆』——當時智識份子的作用非常偉大。因當時的羣衆在客觀環境的影響之下雖具有革命的天性，但帶有革命的自覺性者却非常之少，這是我們用不着加以絲毫粉飾的。

我已經說過了，據我看來，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工人階級並沒有準備好，——主觀上沒有本領，沒有爲達到這個目的所應具的素養，而在一九〇五年，工人階級對於革命尙且沒有準備好。

以前在我的著作中，我不敢大胆的說出這些話來，因恐引起大大的誹謗之故，但是看了沒有什麼誹謗以後，我始敢放高言論說：一九〇五年俄國的工人們不是覺悟的革命的羣衆，他們是無組織的革命。然而這種無組織的革命性，可以跑到四方八面去，甚至如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工人們會在亞歷山大第二的紀功碑前，表彰他的盛德。這種無組織的革命性，會追隨牧師雅各賓之後，而且實際上已經跟他跑了。所以無組織的革命性，顯然是翻雲覆雨和極不可靠的。一九〇五年夏天，伊萬諾夫——窩斯尼先的工人們忽聽到『打倒君主專制』的呼聲，他們大驚失色飛奔而走，並大叫道：要不得，要不得。這是過於新奇，過於怪異，過於刺激他們的聽覺了。我再引一個一九〇五年十月我個人所經過的例子罷。我記得當時有個最好的工人露天大會的演說家史單甯斯拉夫窩爾斯基，他現在跑到右方去了，離開我們很遠，幾乎要跑到白黨那裏去，但是當時他是莫斯科委員會的委員，同時又是最善於演說的人物之一，他憂從中來的對我說：

『向工人說及他們受資本家的剝削，說及工人命運的困苦等等，——他們肯聽一聽，他們的感動和情緒也能增進，但是一說到君主專制，說到政治，露天大會便開始融解，而工人

們也離散了，他們說：這我們是要不得的，這是我們沒有用處的等等。」

看呵！一九〇五年十月莫斯科工人的覺悟情形，還是這樣子。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的工人，居然附和牧師雅各賓的響導，列隊往冬宮請願，據此一端便可想見他們的覺悟程度了。你們都知道智識份子曾經爲此而工作，所以革命的智識份子的作用，在這個時期是非常偉大的。雖然當時工人政黨的問題已經產生，工人政黨已經組成，但在第一次革命的過程中，思想上指導的作用，無疑義的是屬於智識份子。否則是不行的。

據我看來，一九一二年四月林那事變，是一個轉變的時期。自此以後，可謂開我們工人運動上革命的覺悟的新紀元，此時已經不是外來的智識份子了。這一點在資產階級看來是不可解的矛盾，在我們看來這却是辯證法。在第一次革命中工人階級應當敗北，始成爲自覺的革命，這也是不可解的矛盾，正因爲如此，正因爲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工人運動的失敗，所以在工人隊伍中，（始則在少數工人中）才能產生覺悟的分子，——在這些工人分子的肩上擔負着波爾雪維克的政黨：自一九一二年始，此等覺悟的分子，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在一九一四年幾乎要實行革命（當時的環境與一九〇五年相似）。卒之，完成了一九一七年

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羣衆的作用，覺悟的革命羣衆的作用，是非常顯著的，然智識份子却已經落伍不少了。當時的波爾雪維克並不在各地活動，他們或被流逐充軍，或僑居外國，而所有的智識份子——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毫無疑義的，已經落在工人運動的水平綫下了。工人們要求共和國，而智份識子却只要求君主立憲而已。

這個比較是非常奇異的，智識份子，孟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佔中央委員的多數，不能得着政權，而在中央委員會佔少數的社會革命黨人，反而得着政權了。但是社會革命黨人得了政權而不能施行自己主要的關於土地的口號。智識份子如喔喔的小雞一般只是追隨工人運動之後，而始終趕不上這個運動。這例子是一件很有趣味的奇聞。

工人階級，不僅像一九〇五年一樣，客觀上成爲革命領導者，且主觀上亦已成爲更覺悟的革命力量，較之當時露頭角的半革命的智識份子要強得多。

第三個時期，是羣衆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運動的時期，這個時期繼續到現在爲止。可以說，此時無產階級由普通的革命的思想過渡到明確的社會主義的思想了，——這個第三個時期我在此可不敘述，你們將與另一位講師去研究。

現在我說：第二個時期。你們都知道這種思想的混合決不能使我們把第一次的俄國革命看做是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其理由以後再說。這種思想上的混合，有一個文件在此；即當時革命的智識份子，利用西歐工人運動的經驗，造成了當時運動的思想，故無論如何，這種思想總算是智識份子造成的，而不是別人。一九〇五年以前，列甯主張在委員會內工人應有八個，智識份子兩個，而事實恰與此相反，在委員會中智識份子八人，而工人二個，這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列甯同志是千真萬確的，當他主張用反比例之時，但是這個反比例是個假說，是他的願望，亞克雪洛德稱這個時期的黨，為男學生和女學生的黨，這不是沒有幾分根據的。亞克雪洛德從這一點上所得出來的孟什維克的結論，是不對的，但事實的本身却是正確的。實際上男學生和女學生在這個時期（特別是在這個時期之前），一九〇五年以前在我們的各委員會內常佔大多數。從上而下的去觀察當時的運動，可找出許多非無產階級的分子來。這些非無產階級的分子便是農民。

講到這裏，首先必須提出一種事實來，俄國這樣偉大的羣衆無產階級本身的產生，無產階級羣衆運動的可能，無產階級增長的迅速，都是我們農村經濟某種狀態的結果。

雖然，可以任意把工人與農民對立起來，可是，工人是從當時農民經濟諸條件影響之下的農夫中間生長起來的。我引證一些數目字以爲註解；我舉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七年這十年間的數字爲例。一八八七年五金工人約有一〇三、〇〇〇人，一八九七年——約爲一五三、〇〇〇人。而紡織工人的數目更爲奇特：一八八七年——有三〇九、〇〇〇人，一八九七年——有六四二、〇〇〇人。要注意一點，我們的紡織領域內，——這是我們無產階級的農民成分較多的。

試問：推動無產階級向前發展的是什麼？倘若我們只注意俄國當時大量生產的發展，只注意外國資本之輸入俄國等等，那末我們只得到一半的答覆。當然，沒有大量的資本，是不會有資本主義，這是不言而喻的。俄國的企業家和資本主義在十年之過程中，能夠在工廠和作坊中增加二倍的工人數量，使我們的無產階級繁殖起來，可是繁殖無產階級的，并不止於這一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蔓延於俄國的鄉村，普魯士的及其他各鄉村間的農業恐慌也繁殖了我們的無產階級。這一點我不必詳細去講，你們記着，自一八八〇年起在世界市場上穀物的價格大大低落了。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這五年間的價格，小麥值一四四哥比，黑麥七八哥比。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小麥——八四哥比，黑麥——六五哥比。因為穀物價格向下低落的影響，於是發生了農民經濟的破產，關於農民破產的問題，也不必多費時間去研究，爲的明瞭起見，我只援引一些數目字就夠了。這些數目字，大家多少是知道的，但是也不妨記着牠們。

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三年這六年間，中部九省耕種的家畜，——馬——差不多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四百萬中減至九十萬，這是當時軍事調查所得來的明證。

阿羅夫斯省有下列的數目字：一八八一年有馬——二二一、〇〇〇匹，一八九三年——一八八、〇〇〇匹，一八九九年——一七七、〇〇〇匹等等。

這樣一來，農民經濟的衰落有江河日下之勢了，由此我們不僅知道在工廠中無產階級之繁殖，且知道一八九一年何以有飢饉和飢民等等之發生，因爲還有其他的數目字可以看出，農民經濟，耕種的家畜愈少，則其收穫亦愈少。種地一畝有馬由一·二至一·四頭的，則其收穫爲二·七。種地一畝有馬由一·五至二·五頭的，則其收穫爲二·九等等，若種地一畝

有馬三匹以上的，則其收穫爲三·四匹。可知收穫的增加與耕畜數量的增加有密切的關係，這是完全自然的，家畜不僅是技術的力量，且能供給肥料。所以家畜愈少，則土地上所施的肥料愈少，而收穫亦愈少了。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穀物價格的低落，在這個原素的影響之下，俄國農民經濟開始破產了。那時穀物價格已經低落了，而應納的租稅還是和以前一樣，於是農民所有的剩餘生產品，應當拿來付給租稅的，遂一天一天的增加。於是農民甚至還須將其必需的生產品去交付租稅。農民破產了，農民變爲無土地的或半無土地的工人，他們必須到貴族的經濟中或到工廠中去找工作做。

這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俄國鄉村中所發生的過程；不知道這個過程，便不能明瞭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國無產階級化所以迅速，俄國若無此種急劇的無產階級化，則決沒有那種構成俄國革命的先鋒隊的無產階級運動，因爲智識份子所有力量主要的都注意到工人階級之上去了，不錯，只有在那裏，革命的智識份子才能聽到回聲。這樣看來，這個無產階級運動的根源：經濟上、客觀上，是依靠於農民羣衆之上的。我們若忘記這個局面，我們若忘

記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這個農民的無產階級化，農民的傾家蕩產，那末我們就不會懂得，無產階級是從那裏來的，九十年代的罷工運動是從那裏來的等等。倘無上述的事實，則罷工運動恐不會出現，因為我們農民的無產階級化，比之工廠和作坊中無產階級的發展，來得快些。這是毫無疑義的事實。

在十九世紀末葉，我們約有二百五十萬失業的無產階級者，換句話說，這是找不到工作的無產階級化了的農民，你們知道，這必然使在工廠中已有位置的工人，在工資和勞動條件上受莫大的影響，那種可怕的勞動條件，非常困苦和長度的工作時間及低廉的工資，必然要推動飢寒的工人去做罷工的運動。因此九十年代的罷工運動，與在鄉村中所發生的事件實有不可分離的聯繫。

這個聯繫可分為二方面。倘若農民的無產階級化推動了舊時獨立的主人一天一天增多的跑到城市中去，那末工業的恐慌，便逐驅工人回復到故鄉去——這些舊時的農民，已經帶了很豐富的罷工鬪爭的經驗；受了城市的同志的宣傳，而歸回鄉村了。我們講演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我將讀一讀某省長關於鄉村騷擾的呈文，那末便可有條有理的看見，所有的騷擾的運

動，都是由都市中跑回去的農民，即『季候工人』來做領導。他們居留於鄉村，集合所有無產階級化了的農民，『鄉村貧農』成爲新的農民運動主要的羣衆。

普列哈諾夫的話是很對的：『在工人隊伍中成熟了的革命思想，等於國民羣衆中成熟的革命思想。俄國的工人和俄國的農民，是骨肉相依，形影相隨的。』根據這一點，普列哈諾夫便預言道：『在工人羣衆中已經發生的革命運動，吸引着許多最貧窮的農民到自己的河道中來』。

比這個更正確的，就是列甯的名言。所有的農民一致的整個的起來反抗地主。列甯說：『農民要替地主工作受奴隸的束縛，農民喪失了社會的和公民的權利，農民要受特權地主的武裝的鞭笞，生活卑下不堪，使農民成爲真正的野蠻人，——所有這些，歸根結底仍不外是農奴制度的殘餘。凡在這農奴制度統治的場合和關係之下，農奴制度是所有農民共同的仇敵，故反抗農奴制度，反抗農奴地主及代表他們利益的農奴國家，農民是一個階級，是農奴社會的階級，是等級社會的階級，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

然而在工人以外，不但有最貧的農民，還有其他的農民，即殷富的農民，——『鄉村中

破天荒的自由主義者』。這個農民暫時沒有充分的希望。

俄國鄉村小資產階級的發生，是跟着鄉村中無產階級的發展而發展的。這個鄉村小資產階級，甚至在農業恐慌的時期，尙能利用租稅去發展，不過農業恐慌減弱了一些發展的速度。講到這裏，必須推出這個事實來，當時小麥價格的低落，若瀑布之下流一樣，而黑麥價格的低落，則好像蒸汽在空中下降呈『之』字的狀態。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〇年這五年間——普特黑麥（一六·三啓羅克蘭姆）等於九一哥比，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這五年間，——九八哥比，——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〇年這五年間，——六七哥比等等，同一時期內，小麥的價值則無時不向下低落，而黑麥的價格只動搖不定而已，穀物價格的低落至九十年代而終止固定了。自八十年代開始，穀物價格低落，第一是有利於殷實的農民。

在這個時候產生農民的銀行，這個銀行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從這個時候起，鄉村小資產階級佔有各部份的土地，一部份是地主的，一部份是租借農民的分地，於是一村人的土地，都集中於鄉村小資產階級的手裏了。這是一種情形。嗣後甚至在農業恐慌的過程中這個時期，農民資產階級儲金還增長着，按儲金處的統計，農民資產階級的儲蓄發展到一八九一

已經登峯造極了，這是很奇特的事實，我不用去引證了。此外在我的著作中，我借用列甯同志文章中的事實，你們可以去看，這個事實是說明農民資產階級的儲金增加，在每個儲金分部的儲金票中增加了農民的儲蓄票和儲蓄基金的數量，——這個事實也是非常奇特的。

我們還可以再補充一個事實，這是個人的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增加的事實，尤其是南方荒原。這個事實更爲明顯。試舉數目字如下：

一八七七年，南方荒原區域，農民的分地有五百九十萬俄畝（六四四五，九八六）。個人的農民私有土地——六十萬畝（六五五，五二四）。共公的農民私有土地——三萬畝（三二七七六）。而合營的私有土地則等於零。在一九〇五年，約過了二十八年就不同了。農民的分地由五百九十萬俄畝（六四四五九八六）增加到七百萬畝（七六四七七八〇）。個人的農民私有土地由六十萬畝（六五五五二四）增加到一百九十萬畝（二〇七五八二六）即增加一倍。共公的私有土地，也增加了，但是爲數無幾，總共不到五十萬畝。合營的土地，在一八七七年是等於零，現在已經有八十萬畝（八七四〇三二）了。（共公的土地，即爲公社所買的土地；合營的土地，即爲富農們投資去買的土地。）

倘若把農民的分地和小資產階級的土地相比，則第一個時期所得的比例式，只爲一〇：一，在第二個時期的比例式爲一〇〇：三八·五。在第一個時期個人的農民土地只等於全數一〇%，而在第二個時期即等於四〇%。可知個人的農民的土地領有，增加起來了。

現在請你們把我所引用過的恩格卡爾特對於富農的批評仔細回憶一下。富農是鄉村中破天荒的自由主義者，他在政治上是更覺悟的（當然不是無產階級的意思）。史節潘哈爾士林是從這個隊伍中出身的。他出身於瓦特省之富家。你們都知道，在這個正在發展的農民資產階級之間產生了一個，是非常偶然的間隙（不錯，這個問題的距離並不很遠）即農民資產階級與地主之間的關係特別緊張起來了，這個正在發展的農民資產階級，在反抗君主專制之際無疑的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這兩者間的緊張，足使農民資產階級完全跑到革命方面來，使之成爲反地主的份子，在與君主專制鬭爭之際，成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者。九十年代下半年市場上的穀物價格的變動便達了這種地步。自九十年代中葉起，穀物的價格開始提高，農民經濟的利益和地主經濟的利益兩方面相對的矛盾，（這種矛盾在六十年代曾經發現過）至九十年代末也就非常之厲害。這兩個力量的關係——農民和地主，在穀物市場上之日趨劇烈，

必然要使他們的頭角互相衝撞，而不可避免。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工人革命，就在這個基礎上，這個根據地上，擴大起來的。這個革命事變的進程，我在此恕不詳說，——你們可以參看我的書籍，在下次的講演中，我要把這個時期中俄國各階級的關係略加分析。

第六講

工農運動的發展，多少已經預定了最近的一般的爆裂。但統治階級可用種種政策遷延這個爆裂至無限定的年歲。

今日之英國即其一例。英國階級關係之劇烈，——這不是工人和農民中間的關係，亦不是資產階級和地主中間的關係，而是工人和資產階級中間的關係，因為我們所謂農民，所謂地主，在這些字眼的本義上講，英國差不多是沒有了，——英國工人和資產階級中間關係之劇烈，約在一九一二年已抵極點，其劇烈的程度，猶如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俄國的局面一

樣。可是，現在已經一九二四年了，而英國的工人革命，還未爆發（註），且熟悉英國的人們，不能預先斷定，英國的工人革命，在最近幾年內就會發生。英國的工人革命，或者能夠延擱許多的歲月。只有新的戰爭，能夠加速英國的工人革命，新的戰爭越覺迫近，我們越可希望英國快要走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可是無論何人，決不能斬釘截鐵的斷定這一點。英國的資產階級用了種種政策以防止革命，如無微不至的狡兔營窟的政策，無微不至的推宕遷延的政策，無微不至的多少精細的欺騙工人的政策，而最後的最精細的和最巧妙的欺騙工人的政策，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工人內閣。職是之故，那必然爆發的時期在英國一般的前途中也許要遷延很久。且爆發的原因，決不以爆發的階級為斷。

為明瞭我們的革命何以在一九〇五年發生，那必須研究旁的方面，必須考察與革命對立的那個階級的抵抗力，換句話說，必須考察在革命道路上的障礙與社會階級的抵抗力及抵抗手腕。現在我就來講這一點。

但是要明瞭此數年間俄國資產階級和俄國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心緒和境遇，我們不僅要知道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的分析，我們還要稍為觀察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俄國所

經過的歷史事件，這個事件是直接爆發的推動力和火花；所謂推動力，即我們認為時間較近的爆發物，受撞擊與推動而起爆發之謂。所謂火花，即我們把舊俄羅斯當做一包陳舊的火藥看待。從這兩方面看來，日俄戰爭，便是俄國革命的火花與推動者。一九二一年我在『俄史要略』一書中關於日俄戰爭寫了一大章。我們現在所著的歷史，一轉瞬間便已陳舊。試看我的著作，即其明證。我這篇文章雖然是根據——十分新穎的文書保存處的材料，但這篇文章之陳舊那是毫無疑義的了。所有那些陳舊的公式，如謂尼古拉愚蠢貪婪偶然引起戰爭，或尼古拉自己絕不願意戰爭此類的話，我描寫得頗為確鑿。自這個著作脫稿以後，我獲得了許多文書和證據，一為克魯泡特金的日記，二為威廉第二所編纂的歷史圖表，該圖表，是威廉第二的傳略的補遺。三為尼古拉和威廉的通信，因為維德的傳畧，所有這些文書使我有別立的論之可能。毫無疑義的，尼古拉不是偶然而戰的，尼古拉欲奪取高麗的財富而起了戰爭，他是願意戰爭，他想在戰爭中獲得利益，——這是他的目的。先看克魯泡特金的日記。我且把他的日記讀給你們聽聽。要注意一點，這個日記是克氏與人談話後憑腦海裏所記憶的而寫出來的。一九〇三年二月十六日他和維德在跑馬場上馳馬（維德好馳馬，所以他與克魯泡特金

一塊兒在跑馬場上練習）當時他們倆談了一段話，克魯泡特金對維德說：『我們陛下的頭腦中，有雄圖大略：併吞滿洲，擴充俄國版圖直抵高麗，又有威加西藏之想，復有取波斯，奪得韃靼巴斯福爾之志願。』

一九〇三年尼古拉的雄圖大略，就是如此；克魯泡特金的話，還有別種材料，可爲鐵證。該項材料，我已經談過：即維德的傳畧。關於這些雄圖大畧，維德說得十分詳細——以後我們又在文書保藏處找到補充維德之文的文書，該文書中說，尼古拉在一八九六年，即登大寶後一年便有奪取巴斯福爾的企圖。當時尼古拉；秣馬厲兵，準備出征；至於什麼原因破壞了這個出征，和障礙了這個出征，我們至今還不知道。然當時戰爭之爆發可說是迫在眉睫，軍隊集中了，軍艦集中了，決定了一定的電報的暗碼，以便派送軍隊下船和派送軍隊到君士坦丁海峽去，——總而言之，當時出征的海軍與陸戰隊，都已完全布置好了。這是一八九六年之事。顯然有什麼障礙存乎其間。這一點維德認爲是神意使然。我們共產主義者當然不能接受這個說明。諒必『神意』流露出什麼具體的容貌吧。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這點，不過出征的本身——是毫無疑義的事實，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一八九六年，并沒有什麼白梳不拉索

夫，並不是爲着什麼鴨綠江，也並不是爲着什麼高麗，而尼古拉已經預備開戰了。關於日俄戰爭，——也是一樣的。現在從威廉的圖表中我們可以知道，還在一九〇一年九月尼古拉與威廉相會於但澤，尼古拉已經對威廉說了，俄羅斯預備和日本開仗。這是在一九〇一年九月，即在戰爭開始前三年（差不多三年）這不是偶然無意所說的話，恰恰過了一年，在一九〇二年九月，威廉的日記中又載有尼古拉的話。尼古拉又對威廉說，俄羅斯預備和日本開仗，預定開仗的年月——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三年二人又復相會（他們大約每年都相會了），尼古拉對威廉說：「一九〇四年還沒有戰爭，因爲俄羅斯還沒有準備好。尼古拉深信，戰爭時期的宣布，可由彼一手包辦，當他不利宣戰以前，日本人將拱手靜待。然而日本人却不是這樣愚蠢的。日本人宣戰，在尼古拉期望之先，在尼古拉沒有好好的準備之先，倘若我們把一九〇四年宣戰時期的俄國海軍戰鬥力和一九〇五年五月沈淪於對馬島的小艦隊集合起來，那末，俄國海軍的力量，較之日本的海軍力量大概要多兩倍。

這樣一來，倘若尼古拉能及時準備，或者他有許多機會可以制服日本人，因爲要想反抗加倍的力量，恐怕無論什麼將軍如東鄉，也無能爲力罷。至於俄國的陸軍，更不用說了。

在戰爭之初，俄國已有訓練的兵士，約為四百五十萬人，而日本有訓練的兵士，只為六十四萬人，俄國的兵力當然更強於日本的兵力。故所有的機會都操在尼古拉的手裏，尼古拉不但想奪取高麗的礦產等等——這不過是尼古拉個人的勝利品，是尼古拉個人荷包中的『酬謝物』，——他并且還想破滅日本，日本與高麗破滅之後俄羅斯便可稱霸遠東了。

本書第一版，我還論過尼古拉對遠東的政策，一是沙皇政府最主要的政策，——尼古拉對遠東的政策據我當時看來，除了帝國主義野心之外，便沒有其他的原因。往後我又跟着批評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俄國帝國主義。自從許多著作——出世以後，他們極確鑿的說明了在這個時期中，談不到甚麼『俄國的帝國主義』，不能在理論上曲解『帝國主義』這個字眼。此外，列寧同志的著作并指出，甚至在一九一四年說到『俄國的帝國主義』，也只能十分有條件的——即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前夜，俄羅斯還是外國財政資本活動的舞台，而本國的財政資本，比較甚少。

上述各點，在政治方面，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俄國政府甚至在一九一四年——在一九〇五年，更不待言——其為國際帝國主義的工具，較之俄羅斯帝國主義政策之獨立的原素，要

深得多。同樣的，從威廉與尼古拉的通信，從克魯泡特金的日記中，使作者的眼界煥然一新。

第一，所有尼古拉『帝國主義』的趨向，不論其趨於何處，趨於巴斯福爾也好，趨於西藏也好，抑或趨於滿洲也好，總與一共通點有關：即趨於反抗英國。由是便明白了，第一所有他的趨向的軸心便是『海峽』，換言之，即爲巴斯福爾和韃靼，爲爭奪這些地方與英國作了差不多一世紀的鬥爭：若以『帝國主義』去了解這個鬥爭，無異把這個術語應用到耶卡得林第二的政策上去了，——這完全是荒謬之論。第二，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與英國的鬥爭中尼古拉不是單槍匹馬，不僅客觀上不是單槍匹馬，且主觀上亦不是單槍匹馬，在尼古拉與威廉第二的通信中，便可證實。與俄羅斯帝國歷代相戰的英國，此時已爲德國帝國主義的眼中釘，所以反抗英國，也成爲德國帝國主義政策的主要部份，德國在近幾年內比以前十年更要拚命的和加速的包圍自己的敵手。俄國對遠東政策一般的情形，我只有給你們專門的書籍（註），你們自己去研究；此地用不着多批評，因我所講的功課其直接的目的，是在研究革命運動史的概要。

沙皇主義的對外政策，決定了沙皇俄羅斯統治階級中間的內部關係——特別是資產階級對沙皇主義的關係。在對外政策中商業資產階級與沙皇主義頗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經濟發展的辯證法，工業資產階級中應當變為自由主義的、反對農奴制度的，便要反對沙皇主義，爲什麼他却鎮靜和謙恭了呢？此地要注意一點，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商業資本主義發展之必然的結果。商業資本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的國家實行鬥爭的時候，應當發展工業，否則——他便宣告死刑了。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若不能發展自己本國的工業，他必然要變爲工業國家的殖民地：例如——印度就是，日本就是相反的例子，日本不願把自己變爲殖民地，從半殖民地的環境中超拔出來，這就是因爲日本的工業的發展較之俄國還要迅速之故。

直接推動商業資本主義國家去發展自己『祖國』的工業，有二原因。第一種原因，就是必須保持商業上的平衡：所有的商人應使出賣多於購買——否則，勢必破產。所有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企圖怎樣能減少外國輸入本國的商品，怎樣能增大本國輸出外國的商品：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理論——重商主義的大聖，即具有這個趨向。故俄國紡織工業的發展，

——正確些說，君主專制政府眷念紡織工業的發展主要的就是這個原因。十九世紀以前，俄國所用的紡織品——尤其上等的紡織品，是從外國輸入的，主要的是從英國輸入的，而從普魯士輸入的則較少。

『大陸封鎖』，——一九〇七年後俄羅斯亦參與大陸封鎖。——俄國遂與英國斷絕了交通，使俄國本國的紡紗和織布的工廠有發展之可能。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俄國紙幣一個盧布的價格低落到二十五個哥比，逼到沙皇政府竭力『保護』這些紡紗和織布工廠的發展：亞歷山大第一逝世前不久，已經施行過這個路綫，尼古拉第一則繼續這個路綫非常積極，不獨用高的關稅去『保護』俄國的工業，且為俄國工業去搜索和征服新的市場。尼古拉第一的例子，顯然證明，商業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絕對不會輕視工業上的利益，而且剛剛相反。

第二種原因，是與各個技術極發展的國家爭市場和爭通商道路，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要和這些技術極發展的國家相戰，亦必須擁有與這些國家一樣的技术；而技術的發展，又必須發展偉大的營造工業。彼得第一建造海軍艦隊（內河的通商艦隊在莫斯科 俄羅斯時代已經非常之多了），是俄國歷史中的古例。當尼古拉第一即位時，俄國的帆船，已經寥寥無幾，

(在尼古拉俄羅斯時代，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帆船又有極大的發展，英國人亦極敬佩)而且需要建造汽船了，主要的還是需要建築鐵路。前代的『棉花』保護貿易主義，至此已加上五金的保護貿易主義了。十九世紀末俄國的關稅統計，有二種保護貿易主義，試舉其數目字如下：

以一普特鐵的關稅為例(以哥比為單位，以一八九八年為例)。美國一普特的鐵，付關稅由四十二哥比至四十九哥比；德國——由十九哥比至二十三哥比；俄國——落後的俄國，——由七十五哥比至九十八哥比，換句話說，俄國的關稅，比美國多二倍，比德國幾乎多五倍。鋼的關稅，也是這樣。

美國一普特的棉紗，付入口稅由二盧布十哥比至六盧布三十一哥比；德國——由九十一哥比至三盧布六十四哥比；俄國——由七盧布二十哥比至十六盧布五十哥比。這種關稅，俄國多於美國四倍了。

美國每普特的棉布，付入口稅由盧布六十三哥比至十八盧布六十哥比；德國——由四盧布五十五哥比至十七盧布四十四哥比；俄國——由二十一盧布至八十七盧布。

每普特機器的入口稅（我沒有美國的數目字），德國由二十三哥比至三十八哥比，俄國——二盧布十哥比。

俄國的保護貿易主義與德國相比，好似虎與貓相比，俄國的保護貿易主義與美國相比，好似虎與野貓相比，或則比之同類的動物而形體更小的亦可。

總而言之，俄國關稅之高，——尤其一八八九年，比之任何強盛的帝國主義的國家，都要高些，這樣高的關稅，真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

然俄國關稅之高，就其本身而言，絕不能證明這是一八八九年俄國的帝國主義的朕兆，此時帝國主義的肇基在俄國是一點也找不到的。

現在還有二個補充的說明。第一，這個商業資本『保護』工業資本的過程，絕對不能用玄學來觀察——把他看做是某種積極的東西對於某種不動的和遲滯的物體之單方面的影響。在歷史中，是活力相戰的，且他們是互相影響的。工業資本主義利用商業資本所開關的一切口徑，以便貫穿商業資本主義的系統，商業資本主義則維護之欲保留他的神聖，最低限度，也要保留商業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這種過程，是全世界的過程，是波浪形的過程，——是

有進有退的，而不是直綫形的向前運動。在十九世紀末葉，約從八十年代開始，顯然是『工業的漲潮』……工業資本主義的利益對於商業資本主義的壓制大為增加。可以說，在九十年代，俄國暫時鞏固了以威特為領袖的工業資本的統治權。維德時代，最顯明的事實，就是俄國金幣本位的採用。這完全是工業資本戰勝了商業資本。商業資本深謀遠慮的保持不兌換的紙幣，因為這些紙幣是他們寶貴的獨有物：這些紙幣在國內的購買力，較之他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要高。因此所有各商業資本的代表——不論他是輸出者，抑或是地主——其出賣穀物所得來的一個盧布，實際上，每多於一個盧布，因為俄國內部，尤其是在鄉村中，是高於國際的價格。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的財政歷史，有最奇異的現象。這個最奇異的現象，即我們的財政總長維石尼克拉斯基（維恩的前輩）實行減低俄國盧布在國際匯兌中的價格運動，而當時的財政委員會的代表阿伯士亦極力參與這個運動。沙皇政府減低本國盧布的價格，——那是非常奇異的現象。然而沙皇政府何以要減低盧布的價格呢？因為有一個呈報維石尼克拉斯基的公文說，俄國盧布的價格在國際匯兌中之過度的提高，俄國的地主要受莫大的損失；在公文上，不是說『地主』，而是說『穀物的生產者』，但是在本文的意義上是沒

有區別的。試想，實際上盧布已經漲價了，——漲到八十哥比，以前只爲六十哥比，——這恐怕所有俄國內部的關係都要大起變化。俄國地主，所得的盧布數量就要減少，而俄國的地主和輸出者就會大叫道：『這種不法行爲，是不允許的，這是等於劫掠。無論如何要把盧布的價格減低，不然我們要受損失，且能發生恐慌。』他們拿恐慌去威嚇，所以沙皇政府，就減低盧布的價格，使恐慌不至發生。有一部份財政委員會的代表已經參加了，但其他部分的代表諒必也在內。自此以後不到十年維持採用固定的金本位，由這個時候起，盧布的價格已經不能動搖了，亦不能戲弄了。這顯然證明此時已經與八十年代相反，已經是便利了，俄國的盧布價格可以高些。俄國的工業家有什麼要求呢？俄國的工家不能不買國外的機器，不能不買國外的棉花。不錯，在這個時候，土耳其斯坦的棉花如怒潮一般的發展了，但是在十九世紀末葉，這個棉花業只能供給俄國紡紗工廠三分之一的棉花，——其餘三分之二棉花，還要到外國去買。因此俄國盧布價格在國外滙兌之高下，對於紡紗的工業家絕不是沒有關係的，因爲倘若這個價格太低，那末工業家必須付給更多的盧布數量，所以俄國的工業家哀求制定俄國的金本位之必要，鑄造不會動搖的金幣之必要，實行變爲金幣的流通。九十年代的

中葉維德所採用的金幣流通——這是工業資本戰勝商業資本的明顯的徵兆。

可是工業資本的勝利并不是長久的。因為商業資本，是俄國羅曼諾夫國家主要的供養人。然而羅曼諾夫的國家制度究竟以何種資財為生存呢？為什麼首先要保持這些不兌換的信用票的價格呢？這些不兌換的信用票，是用於國外的貨幣本位，因我們輸出穀物到國外的緣故，所以俄國的荷包一天一天的增大。我們輸出國外市場的穀物生產數量的太小，我們可以調查的。自八十年代穀物價格低落以後，俄國輸出國外市場的穀物，須一天一天的增加。八十年代中葉俄國輸出國外的物穀佔全生產百分之七十七，而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俄國全部生產的穀物，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五，要輸出國外市場去了。為什麼要如此呢？為的是要保證商業上的出超的緣故；為使俄國入口少些，出口多些，而出入口的相差，便是俄國人荷包裏的利潤。這個出超，是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基金。俄國由於這個商業上的出超才能積聚金幣。俄國積聚了無數的金幣。俄國金幣的儲蓄至一九一四年已到了最高限度了。試以俄國和法國的金幣儲蓄作一比較：

俄國金幣的儲蓄	一九〇〇年	七五五	一九一〇年	一、三〇五
法國金幣的儲蓄		九三六		一、二八二
俄國金幣的儲蓄	一九一二年	一、四三〇	一九一三年	一、六三一
法國金幣的儲蓄		一、三八三		一、四〇六

這樣看來，在全地球上沒有那一個國家的金幣儲蓄有俄國這樣多的，俄國只有依靠這個金幣儲蓄，才能運用帝國主義的積極政策。世界上只有像英國這樣的國家，手裏擁有世界的運輸，世界的交通道路，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前夜全世界的商船四千二百萬噸中，有一千九百萬噸在英國手裏，英國差不多佔了一半，毫無疑義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雖然沒有集中大量的金幣儲蓄在自己手裏，亦能供給戰爭的浪費。所有其他的國家——俄羅斯，法蘭西，就在此等國家之列——盡力積聚金幣的現銀，在其金庫中，越多越好，以供給戰爭的用費。越至九十年代初，商業上平均的出超約為一萬萬至一萬五千萬，而在九十九年，即維德全盛時代，——我們的出超只為七百二十萬。十九世紀的末葉我們的出超幾乎等於零了。對於工業方面，這是沒有什麼困難的。牠可以跳過這個關頭。牠需要什麼呢？牠要工業的原料，牠要

機器。這些完全是充分的，此外牠還要廉價的食物，因為食物的價格便宜，工資也就低下，所以實際上，牠（工業）甚且十分不願穀物的出口。然而商業資本是要穀物出口增加的，因為穀物之輸出外國，不啻將外國的黃金河水流注於俄國境內。在一八八九年這個黃金河水差不多已經乾涸了。在道上忽然發現了暗礁，維德的政策恰似在這個暗礁上面與之相抵觸。世界市場上的行市，已經變化了，其重心亦自然的，轉移到商業資本方面去，因為工業資本之壓迫商業資本，只在穀物價格低下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這一點我在前次的講演中說得很多。穀物價格之低下，迫得商業資本變為工業資本的奴隸。商業資本猶如雛雞一樣一步一步的追隨工業資本之後，而工業資本，則有如鵬鳥一般振翼而飛，傲然自得，大有旁若無人之概，因為食物便宜，勞動力也就便宜，工資亦隨之而低下，換句話說，就是工業的旺盛。可是，上面我已經說過了，在九十年代的下半期，穀物價格開始上升了；試以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七年這四年內的價格為一·〇〇，則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四年這六年內價格便是一二二，而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二年的價格則為一六五；隨着穀物價的增加，因而增加了我們的貿易格：一九〇〇年為一一六、三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〇一年——一九

六、九〇〇、〇〇〇，一九〇二年——二二六、三〇〇、〇〇〇，一九〇三年——三四七、一〇〇、〇〇〇，一九〇四年——三七四、〇〇〇、〇〇〇，一九〇五年——四五八、六〇〇、〇〇〇。我們的貿易格增進一步，即我們將來的帝國主義的物質基礎也就增進一步。商業資本在經濟上的意義亦大為增進，他是穀物市場上的英雄，他吸收了許多的金幣到俄國來。經濟局面的變化，使商業資本易於戰勝工業資本，此種步驟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一九〇三年八月維特退位，結果改組內閣，這完全是由於經濟局面的變化，——由於俄國資本家內部相對比重底變化而必然發生的現象。重心復由工業資本轉移到商業資本。在遠東政策的利益，對外政策的利益，都表現得極明顯，此等政策，無非趨於有利於俄國商業資本之一途。此地必須記看西比利亞和西比利亞鐵路的意義，（西比利亞與殖民地無異）很奇特的，恰恰在穀物價格更低的時期，俄國政府和俄國的資本主義開始垂涎西比利亞殖民地了，因為當時俄國無論知何是需要多運原料到市場上去出賣，因此便要多找些新的出產便宜原料的區域以得到這些原料：惟其如此，維石尼克拉斯基就有一句名言：『自己少吃些，多留些出口』，——他是建設西比利亞鐵路的發起人。西比利亞鐵路，給工業資本主義發

展一個偉大的推動，因為建設鐵道必須有五金工業的生產，所以西比利亞鐵路之建設，造成了俄國五金工業偉大發展的條件。可是西比利亞鐵路本身就是商業資本主義的事業了。在第一個時期，商業資本主義得到了最少限度的利益。商業資本主義，在這方面，沒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因農業的原料價格增大，促成新的穀物價格的行市，——由是俄國的商業資本，也生色了，遂一天一天的在這方面積極的活動起來了。試以年代上作一比較，可看出非常奇異的事實。自一八九四年起至一八九七年止是為穀物價格的轉變時期，試舉燕麥的價格：一八九四年，每普特值四十一哥比，一八九五年——四十四哥比，一八九六年——四十五哥比，一八九七年——六十一哥比（突然向上飛躍）。小麥的價格：一八九四年每普特值五十一哥比，一八九五年——五十哥比，一八九六年——七十二哥比（飛躍稍早一些），一八九七年——九十三哥比。恰恰這個時期（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七年）與中國訂立一八九六年的莫斯科條約，發展俄國鐵路直達南滿洲不凍的海灣。恰恰在一八九六年五月，尼古拉第二即王位之時，即與李鴻章訂約，大施賄賂，約費了五十萬盧布；遂訂立了這個著名的條約，開闢了建設新鐵路的前途，一時俄國的工業家非常滿意，同時俄國的商業資本，

亦抱同樣的感想，因為這個條約，開闢了西比利亞的原料，出口到不凍的海面，一看這似乎顯然矛盾的。既然有西比利亞鐵路，則運輸原料沿鐵路直綫進往西歐比之在輪船上繞行全亞洲和全歐洲而至西歐似乎更為簡便了。但要注意一點，當時輪船的運費，要便宜得多，較之鐵路的運費要少二十五倍。所以鐵路運輸一普特貨物至一千俄里的價格，若用輪船則可以運輸二十五普特，你們可以想縱使輪船運輸的原料其經過的長途，較之鐵路多五倍，也還有莫大的利益可圖。世界市場行市轉變的時期，正與俄國趨向遠東不凍海灣的時期恰相符合，那是極可注意的一點。

日俄戰爭之發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俄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為的是要侵佔滿洲，高麗和其他許多遠東不凍海灣，開闢此等版圖，以為俄國出口之需，質言之，為俄國出口資本和俄國商業資本找尋非常便利的道路，在商業的意義上來講，唯一的道路，即由西比利亞東部出葉尼塞河以東的通商要道。因為由鐵路出口，價值太貴了。此外還要在遠東找得好的能把所有貨物都由此運輸出去的海灣來。

故日俄戰爭在行動形式上雖是冒險的、驕傲的，估量不正確供給很缺乏的軍事行動，但

他却是個有規律的現象，蛛絲馬跡，歷歷可考：俄國經濟發展的辯證法，促成了遠東的戰爭，促成了與日本的戰爭，這是萬不可幸免的，因為日本是我們的敵手，日本橫立於俄國剝削西比利亞的道路之上。

這是對外政策方面的方針。對外政策中的指導者，又為商業資本。一九〇三年八月，因為遠東問題的關係，維特不能不辭職而去。由是政柄遂操於普列維之手，普列維恰恰是純粹商業資本的代表，而不是舊王室貴族的代表，但是商業資本，乃粗鄙的、劫掠的、貪婪的勢力的資本，君主專制以這個資本的勢力構成主要的特質，因為商業資本——我說得多很了——是須要農奴制度，俾能達到自己經濟的目的。因此，普列維和地方議會的貴族，甚至與石波夫的莫斯科的穩健的管理地方議會的貴族，其關係之惡劣，是不可言喻的。

地方議會中仇視普列維。普列維則極力對抗地方議會派。所以認普列維為封建貴族利益的代表者，是不應該的。很奇特的，按其本人的出身，他是沒有族系和血統的人，是西俄羅斯某小地主繼承子。在這一點來說，維特所推薦的內務部長——昔璧金較之他當然要偉大得多了。昔璧金實際上是俄國貴族的親生，但他是維特的走狗，是服從維特的人，是維特所提

拔出來人物，使之阿諛其敵手和對抗者。普列維顯然不是貴族出身的人。有些人甚至稱他是猶太人種，但他對猶太却非常殘酷。普列維是明顯的反猶太人者。他的姿勢是非常奇特的。你們也許看過了里平『國家行政會議』底圖片，唯妙唯肖的描寫普列維穿上軍服，肅然不動的站着，鬚眉整飾，儼然軍人的姿勢，——倘非邑區的，那末便是警察分署的，全俄警察分署的模範姿勢。這個警察分署的，全俄國的秩序，制定某種規則，稍為拋棄昨天的主人，——工業資產階級，到反對的營壘中去。

看看竺巴托夫派主要的政治意義。竺巴托夫運動只是俄國工人運動的小史。當然，這是悲傷至極的俄國工人運動的小史，因為一九〇二年竺巴托夫組織中的工人，多於我們黨的組織中的工人，這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甚至一九〇五年初甲邦所吸引的工人，其數量雖較少，然比之我們黨中所以的工人，却還多五倍。至於甲邦所處之地，莫斯科，更不用說了。當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號樹立亞歷山大第二的紀念碑時，在我們黨的組織中的工人為數無幾，甲邦能驅使五萬工人去紀念亞歷山大第二；這樣的『人山人海』甲邦自己吃了一驚并趾高氣揚的說道，要指導這樣的『人山人海』非有特別天才不可，然而這種天才，又不

是人人都有。這個『人山人海』最先應使俄國的企業家平心靜氣。俄國的企業家，不常是一竅不通和靡爛的東西，也不是不知工人問題爲何物。一九〇三年，當反抗竺巴托夫運動的時候，由幾個大企業家發起，財政總長準備了關於自由結社的問題——當然在俄國特有條件之下的，絕不是以西歐爲標準的罷工自由；當時邀請了這些企業家用亞細亞的方法去解決工人問題，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在警察保護之下的活動，可是直接起來反對資本家的經濟利益，企業家當然是悲痛的。從此企業家確然變爲自由主義者了，他們確然把自己的金錢送與甚至站在極左一邊的人們了。同時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莫斯科工人在亞歷山大第二的紀念碑前發表宣言尊崇盛德，一九〇三年二月夏天，在國外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解放』第一期出版了，實際上講起來，『解放』報是急進主義的機關，由資產階級的金錢而成立的。很奇特的，資產階級聘定非常之左的人，去充任這個機關的編輯者。現在我們知道斯托盧威，是福蘭格爾內閣和俄國保皇黨國外的指揮者，當『火星』報成立的第一年，這個人曾贊助該報，且有人與之商議使彼擔任『曙光』報的經常辦事員，與斯氏商議此事的人，不是別人而是普列哈諾夫。普列哈諾夫這種舉動是我們很難索解的。當我們估計『解放』報的意

義，及俄國資產階級的機關報的時候，這個事實，是應當記着的。資產階級竭力拿到最左不過的人做他的招牌。當然，要籠絡普列哈諾夫本人，俄國資產階級，沒有這樣大膽的企圖，可是事實上，普列哈諾夫與之商議并使之參與普列哈諾夫的機關報，這已經是被資產階級所籠絡了。

所有這些是證明，我們的資產階級受當時革命運動的影響，已經盡量的左傾了，已經盡量的欲謀害政府了。不錯，財政上直接的幫助『解放』雜誌的地方議會的左派是笨的。可是這個左派是與所有的羣衆有同向左方前進的蠢。這些地方議會的左派，在十年當中，沒有越過會議代表一步，而『解放協會』也是地方議會的左派於一九〇二年所新組成的——一九〇三年正式成立——一開始便以國會政府爲政綱，即主張實行正當的兩院制和普選制。解放協會的指導者，最終一定要想出種種的方法去迷惑俄國最尊貴的公民并限制這個普選制，那是不言而喻的。然當時的『解放協會』在原則上却沒有一個人反對普選制，且沒有一人曾經要求施行選舉的財產資格。此外，這個組織按其內部的發動機，而無疑的是資產階級的組織，雖然他們曾經極謹慎的向那些左傾的人們掩飾隱避。吸收這些左派的人們到他們的團體中去

那是十分要緊的。爲什麼要吸收這些左傾的人們呢？這不過是拿來做招牌。使這個團體的面比其實質更要左傾。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俄國的資產階級已經開始促進革命的發展，這個熱誠只從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以後，始告結束。我們時常認爲立憲民主黨，是向右行動的政黨，這一點在一九〇六年一月以後看來，完全是對的。因爲立憲民主黨自此以後已經完全成爲保皇黨了。但在前一時期的立憲民主黨，却是革命的右派，并未提到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的問題。他們對左派說：你們是共和黨，請你們去建設共和政體吧；我們毫不反對共和政體。但在一九〇六年一月立憲民主黨却在其綱領上固定的寫道，俄羅斯應爲君主立憲政體。這是什麼原因推動他們如此呢？十二月的巷戰及其失敗。十二月巷戰以前我們的資產階級對於羣衆運動的上升和發展，曾經做過許多的投機事業，這個事實在維特的傳略中，歷歷可考。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即十月罷工以後，黑仙去謁見維特（黑仙此刻在國外辦理立憲民主黨的雜誌——『船舵』）。維特與黑仙談說，欲吸引立憲民主黨到自己一方面來，并誓爲立憲民主黨人謀一切前途——『但只要擁護我』。當時維特是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也要顧面子也要掛招牌。維特說，『只有一個條件，你們要與革命者斷絕關係，不要放炸彈，不要開

手槍，不要號召工農暴動，等等。並請你們嚴厲的說：我們與彼等毫無共同之點，無論如何決不追隨彼等之後。斬釘截鐵的與他們分家等等。」黑仙很狡猾的看看維特并質問他道：「那時你們解散不解散你們的軍隊、警察、等等呢？」維特答道，無論如何，這是做不到的。黑仙又對維特說：「那你們要我們解散自己的軍隊，究竟是如何用心呢？」這樣一來，立憲民主黨人竟把革命者看成了自己的軍隊：所以立憲民主黨剛剛成立，便同情於十月的罷工，并盡力對一切的罷工運動表示好感。當時米流可夫對於「左派的朋友」雖曾屢次頻送秋波大施其弔勝子的手腕，可是一點效果亦沒有。（他說，我和右派，絕對是限界分明，與他們毫無關係）。你們試記一記那幾幅描寫米流可夫的著名的滑稽畫吧。第一圖，描寫米流可夫遇見「左派的朋友」——則甘言密語，滿面春風。第二圖，描寫他遇見「左派的同盟者」——已不復有如是的音容笑貌了。第三圖，描寫他遇見「左派的隣人」——則完全沒有聲色了。最後一圖描寫他遇見「左派的蠢子」則咬牙切齒怨氣逼人。這幾幅天才的滑稽畫，——即描寫俄國資產階級對於這個時期的俄國革命的一切態度。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無疑義的，資產階級促進了革命的發展，在相當的程度上幫助了革命，甚且在十月，即在十月罷工

的時候聖彼得堡的企業家還是很經常的支付工人在罷工期內的工資。工廠的管理處還給代表以路費，讓他們去參加蘇維埃的會議。

在這個時期中，工業資產階級的態度就是這樣：你們可以推想，工業資產階級，在客觀上是何等的有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特別是在商業資本軍事的基礎上，對於革命運動，是有何等的幫助。

在結論中，我必須稍為說一說，俄國資產階級的政策，究竟是不是蠢笨的政策？俄國的資產階級是否知道將來的結果是如何呢？關於這個問題一九一七年三月已經答覆過了。革命勝利了無疑義的這是真正的工人革命的勝利。甚至死人羅湘可亦不否認，一九一七年三月聖彼得堡的主人翁是工人。這不僅羅湘可懂得——尼古拉第二也很懂得：他在其日記中寫著，國會委員會欲將革命的運動加以限制，可是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委員會（尼古拉稱工人的代表蘇維埃，為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委員會）和國會委員會戰，而工人委員會，力量較強。——所以國會份子，束手無策，顯然，工人是為主人翁了。但是誰人掌握政權呢？立憲民主黨的資產階級的米留可夫總長在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及其他同樣的份子的臂助之下取得了政權。

如此看來，工業資本的政策，絕不是如此蠢笨如此癡呆有如初看時一樣。棋局布置好了。不錯，第一局遭受失敗了。怎麼辦呢？資產階級另找出路，——牠很快的向右邊跑，而左派的朋友則變成左派的蠢子。以後逐漸證明，俄國資產階級的計算無疑義的，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

現在再來補充第二個說明，俄國資產階級在商業資本主義國家內，自一八六一年「農民解放」以後本來就應該從他的環境中做出邏輯上的結論，爲什麼做得這樣的晚呢？爲什麼俄國的資產階級，只在普列維執政的時候，才想到依靠羣衆的可能，才想到國會的君主政體呢？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維特時期」的工業資本凌駕商業資本之上，便是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這個時期，資產階級和沙皇政府的關係，是非常親切的。

第一，你們應記着，剛才我所說過的這個海關政策，絕不是由什麼俄國政府立法機關神速的創造力所創立的。煤炭的稅率，是對於南俄礦工業家大會的仲裁之一個直接的答覆。鐵的稅率定每普特爲十五哥比，這也是對於五金工業家大會的聲請，正確的答覆。一八八三年他們提出請願，至一八八四年已經完全滿足他們的請求了。下一次的大會想增加稅則每普特爲

廿五哥比，而在一八八七年已經得到二十五哥比了。一八九六年在尼世義——諾夫果羅的大會討論附加稅的時候，『窩尼加爾』報道，俄羅斯的『商賈無所不可』，——又該地方（是國際定期的商埠）的報紙，載有財政部長的非常奇異的聲明書，說道：

『財政部認為必須熟悉工商階級的代表對於那些最有興趣的問題，究竟有何見解，財政部向來是抱這種態度。我在財政部服務四十餘年，使我有充分的理由和證據，能夠肯定的說，財政部始終是為工業和資本謀利益的。』

這位貴人所說的話從四十年代整個的時期中看來，也許是不正確的。因為在一八七八年施行保護貿易主義以前，俄國的商賈并未感受財政部特別的恩惠，可是在一八九六年看來他的聲明却完全是對的。我舉出另一個事實來看，財政部召集會議決定了經常的勞動時間——十一小時半的勞動時間，財政部的代表痛恨企業家過分要求了。他說，『去年的會議請三十人參加，說道：不夠！本年的會議請二百人參加，又說——還是不夠。究竟要請你們多少人到會，你們才算滿意呢？』這個財政部代表歎息的意義，已經非常顯明的表示出，財政總長的確是聽從工業階級了。九十年代俄國的企業家沒有絲毫根據得為特別顯明的急進主義者，

因為當時攬政權者，實際上已是俄國資本主義利益的代表——維特。關於這一點，待批評維特的時候，我再來發揮。

至於俄國資產階級的另一派——俄國的地主派，他們比之俄國工業上的企業家，更為自由，因為他所能享受政府的恩惠比後者少些。不錯，政府時時施惠於貴族，但是他的比重却相差很遠，你們在我的四卷史中可以找到貴族怨恨政府輕視他們的事實，——甚至左的左派，鄉村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在會議上也只能有發言權的代表。貴族只能得到商賈已經得到了的權利。政府招待商賈并聽從商賈了。貴族說：『我們呢？請聽聽我們的話罷，我們總算是尊貴的，我們是有特權的。聽從商人，而不聽從我們。這是好現象嗎？』在九十年代貴族沒有得到多大的利益。

但是在相當的程度上，這個說明，好似『偶然的事』——然而這個事實，絕不是具有空間性和時間性的。這個事實是世界的，我們當第一次委員的宣言曾經重述恩格斯的話，資產階級越近東歐，則越發卑賤。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東歐的資產階級之越發卑賤，究竟不是他的神祕不可思議的本質呢？當然，不是的，——這個資產階級的卑賤有其物質上的基

礎。在大工業最發展的國家，即在實際上沒有大工業國家的競爭者的時候，那裏的工業資產階級，時常有更堅決的行動。英國完全不知有拿破崙主義，——而法國的拿破崙主義則已經經過了兩個時期（『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拿破崙主義，即是工業資產階級服從軍事專政。德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在果金梭林諾夫王朝半君主專制的統治之下經過了數十年之久，俄國的工業資產階級所忍受的甚至還是純粹的羅曼諾夫王朝君主專制的統治。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開始發展自己的大工業越晚，則必受技術上更優越的和武裝更銳利的敵手所威脅。於是他的封建元首——或他的資產階級的迪克推多，拿破崙——便越發『保護』『祖國工業』，地方的工業資產階級則越發被人收買，而其完全消滅封建統治的熱情也就越發減少。

第七講

工人羣衆運動的失利，促成工業資本自由主義的反抗態度之消極，這一點在資產階級看來，是不可解的矛盾，在我們看來，却是辯證法。羣衆運動失利的結果，——工農暴動失利的結果，工業資本應當投降商業資本。何以故呢？在此，我們必須完全公開的承認，其所以然者，即由於米流可夫所指的『左派的蠢子』，其所以然者：是由於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較十分覺悟，由於我們已經有了工人階級政黨的端倪。

這個工人階級的政黨，不使無產階級的羣衆，不使被吸入革命運動中去的羣衆，成爲資

產階級手中的武器，同時無疑義的，她又破壞了分裂了資產階級的反抗運動（即工業資本及其有關係的份子的運動）故當人們咒罵波爾什維克，說波爾什維克分裂了這個革命的。在上述這種事實的意義上說來，他們是有幾分對的。不錯，實際上我們是分裂了他們的革命，我們組成了工人階級的政黨，具有一定的階級的方針，我們反抗資產階級的方向和反抗君主專制的方向，是雙管齊下的。資產階級既以羣衆運動爲兒戲，我們當然要破壞資產階級那種把戲。在前次的講演中，我已經對你們說過了，一九一七年發生了不動的情形，主要的是因爲在這千鈞一髮之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波爾什維克未曾出台，在舞台上沒有波爾什維克。換句話言，當時有波爾什維克在，但爲數無幾，他們在政治上不能有多大的作用。當一九一七年舊歷四月初旬列甯回國之時，大事已定，米流可夫的政府已經坐在馬鞍上了，我們應該把牠根本剷除，結果，我們終竟達到了目的，這是你們所熟知的。然而這已是性質相反的行動，三月間我們未能阻止牠坐在馬鞍上。這是我們最可憾的一回事。重複一句，一九〇五年因波爾什維克能運用覺悟的政策，故資產階級未能博得勝利，且實際上資產階級還上了革命的當，沒有達到她們所要求的目的，沒有達到普魯士式或奧大利式『妥當的』資產階級

的君主專制。所以然者，是由於我們有了工人階級的政黨，我們有了工人階級覺悟的上層分子，不許工人階級變為資產階級的武器，蹈一八四八年德意志和法蘭西的故轍。這就是一九〇五年我們的革命與一八四八年西歐的革命相異之點，當時西歐還沒有這樣的工人政黨，那裏的工人羣衆其覺悟程度比我們的工人少些，其結果如何，你們研究西方史時已經知道了。

現在問一問：我們的革命是否像我所說的由於純粹的工業資本失利諸條件而終結了呢？立憲民主黨人由覬覦政權一變為反對派以後，他們在相當的程度中改變了歷史的真面目，我們受了他們的傳染，也隨聲附和，不明真象。此時立憲民主黨的報紙，含沙射影的中傷得勝的以史托里平為代表的和以十月黨人反右派為代表的商業資本，不僅在俄國境內的報紙中是如此，即在國外的報紙中也竭力鼓吹說，俄國施行虛偽立憲主義，俄國所有的設施是欺騙的，史托里平是立心不良的草莽奸雄，他只依靠武力和偵探以支持其他位，所有他的憲法的退讓，無非是個誘惑，藉以欺騙國外資產階級以便向他們借外債而已。立憲民主黨的報紙，描寫第一次革命總結的大意，約略是如此。我們重複了他的話，因為我們的五官並沒有感覺到任何的憲法。

自第一次國會解散以後，尤其是自第二次國會解散以後，我們的黨處於秘密環境之中。入黨的人，政府償以一定的代價。這個代價，是放逐和褫奪一切公權，若努力參加黨的工作者，則處以苦役。你們知道，軍事機關的工作者，邊偶的工作者，萊多維亞的同志波蘭的同志等等，都處以苦役。在這幾年中工人的政黨沒有絲毫的自由。工人的印刷只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才能公開，才算合法；因為當是工人的運動重新活動起來，勢力浩大，政府莫可如何。因此才允許『真理報』、『星光報』等等之出版；雖然每天沒收這些報紙和大約每月封閉一次，然而此時工人們總算是利用了公開的印刷了。但這是稍晚一點的事實，而在一九〇九年，此等的公開印刷還是沒有的。甚至職工會還處於半公開的環境。時常解散職工會，職工會每次引導罷工勝利以後，職工會的指導者即被放逐。換言之，甚至最平常的保護工人經濟的利益的職工會都被認為不法的行動，同樣的處在秘密的情況中。然而這個秘密的環境對於革命情緒的高漲，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思想的進步，却有莫大的影響。一九〇五年我們工人羣衆中所有的經濟主義，自沙皇政府對於職工會實行了史托里平的政策以後，已經完全煙消雲散了。那時工人看清楚了自己面前的顯明的例子，并深信要得到一些方

面的利益及保持這個利益，倘若不先推倒沙皇，則不能與主人作戰，那時他們無不趨於革命之途，結果就有一九一七年說的二月革命。可是，對於我們沒有什麼憲法可言，這是神經的真理。甚至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可憐的孟什維克居然夢想，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存在的條件，要和德國俾斯麥時代所頒佈的社會主義法律一樣，孟什維克那種夢想終竟成了黃金時代的幻想，因為我們的法律，絕不能與俾斯麥時代的法律相比，俾斯麥的法律，只不過由漢堡放逐到阿爾敦，或則由阿爾敦放逐到漢堡，我們的法律則不然，誰要是加入了社會民主黨，誰就要被放逐到西比利亞去并褫奪一切的公權，如果多少積極的做了些煽動工作，那麼就要處以苦役。對於工人政黨的關係，對於工人運動的關係，我們俄國不但沒有任何的虛偽的主憲主義，即一般的主憲主義，也是沒有的，我們俄國簡直沒有任何的保障，我們說，俄國有虛偽的主憲主義，史托里平迷惑民衆等等。我們這種說話，的確是摭拾了立憲民主黨人的牙慧的。

然而立憲民主黨人，却曾經好好的利用過這些『虛偽的主憲主義』故在代表工業資本主義利益的政黨，立憲民主黨人看來，憲法當然已經實現了。第一，他們的政黨的本身，雖然

沒有得到史托里平法律上的承認，——立憲民主黨人曾經幾次要求法律承認，但未能達目的，——可是這個政黨在實際上是已經承認了。立憲民主黨的委員會完全公開的存在，當時加入社會民主黨的人還要處以放逐之刑。加入立憲民主黨的，只審判過一次，這次的審判，完全無關痛癢的，結果只處以罰金，並沒有監禁。這只是獨一無二的情形，只是獨一無二彰明較著的例外情形。立憲民主黨的印刷物，比之俾斯麥時代普魯士資產階級的言論機關，更為自由。一九〇五至一九一〇年立憲民主黨的言論機關，這樣的責備政府，責備史托里平及其閣員，無論任何普魯士的言論機關報恐怕也沒有這樣大膽罷。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普魯士的出版物的聲調比之我們的資產階級的出版物的聲調，隨地都要自重些。這樣一來，立憲民主黨人所需要的，無一不備了，——立憲民主黨人和政府已經暗中結成良緣了。立憲民主黨人關於革命運動史的書籍，可以自由出版。他們的書籍，根據沙皇的刑律的眼光看來，甚至是有害的，亦可以自由出版，波爾什維克的書籍則不然，波爾什維克的書籍，比之立憲民主黨的書籍在表面上的聲調，雖然罵得更為慎重，然而也還是要被禁止。一九〇六年史托里平為着第一次國會的事情，稍為抑制了他們一下，因此便發生了一些誤會，自此以後，立憲民

主黨人便完全生存於自由之鄉并呼吸着自由空氣了，故對於資產階級的關係和對於資產階級的運動，毫無疑義的實現了憲法。這對於資產階級運動的關係，第一必須特別鄭重聲明的。第一次革命的結果并不是完全的失敗，第一次革命的結果是雙方妥協。在主觀的民權方面得有相當的成效，即主憲民主黨在憲法方面得了一些保障。

倘若稍爲深刻詳細的去分析史托里平的政策，不只顧其外表，不限於他對工業資產階級和她立憲民主黨所實施的純粹的憲法上的讓步，而仔細的看看史托里平的社會政策，那末我們便可看到更大的讓步。史托里平的政策，在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實質方面，實可說是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中間真正的調和，真正的妥協。這個調和與妥協，恰與當時著名的「六十年代的大改革」先後輝映。六十年代的情況和力量的相互關係，儼然重現於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二年這個時期的過程中。當此立憲民主黨的言論機關對史托里平的政策，有條件的造謠說謊的時候，我們對於史托里平的社會政策忽略了他的最主要的一點。他的最重大的社會政策，即爲他的土地法。一九〇六年三月四號這天公佈關於改良土地的命令，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號公布關於退出鄉村公社的命令，而一九一〇年六月十四日總結從前所公布的命令而頒行完全

的法律。現在應該大公無私的來說，這是六十年代以後沙皇官吏的行動最莊嚴燦爛的時期，在這個關係上，史托里平是尼古拉、米流金及其同僚的直接繼承者，然而這絕對不是我們應向君主專制讓步。當然，這亦不是從此我們應當推尊草菅民命的史托里平，同樣的，我們絕對沒有推重尼古拉、米流金及其同僚。米流金自己雖然沒有殺人之舉，但是他曾在波蘭援引草菅民命的謨拉維夫，并致信謨拉維夫慰藉其殺人之多，致精神疲倦，不勝同情。

史托里平的土地政策，絕不像立憲民主黨人所說的一樣，這是一個可憐的欺惑羣衆的政策，是引誘富農到政府方面去的可憐的欺騙羣衆的政策。（彷彿史托里平的政策沒有成效，沒有把富農誘惑過來。）他是十分中肯的政策，爲俄國工業資本主義打開了兩扇大門，——此次行動之明確堅決，爲沙皇自農民解放以從來所未有。史托里平實行消滅鄉村公社，——這是他的政策本質。他的政策做到什麼程度以後，我們可以舉一點數目字給你們看。現在先把史托里平的立法內容，簡括的說一說。

一九〇六年三月四日所頒布的土地改良法（最先的，第一次國會以前所公布的），不給那些不在鄉村公社的領有土地，而是個人的領有土地的農民以莫大的權利。在這個法令上，

規定國家土地的出售，并予農民購買土地而成立農莊的優先權——此時農莊經濟已經產生了。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的法令又再進一步。這個法令允許任何鄉村公社農民的少數，有權破壞鄉村公社。倘若某公社有農人家二五〇以上，而公社的家長共五〇，若有五分之一的家長請求退出公社，即政府便准許他們退出。這種行為由地方土地改良委員會辦理之，委員會中大多數是地主和官吏（農民佔少數，到一九一〇年這個農民的少數，或由政府委任，或在省農事會議上由地主選舉，換言之，一九一〇年以前，農民的階級利益，沒有一個人去代表，自一九一〇年以後，農民有一個代表參加選舉了。）這個土地改良委員會應當據這個五分之一的家長的請求，實行消滅公社的土地領有。在特別情形之下，倘若沒有什麼障礙，即土地改良委員會可以允許不足五分之一的家長請求退出公社，且無論何時得允許個別的農民有退出公社，和要求分離他的分地而為獨立的田地之權利。這是對於我們鄉村公社真正的打擊；這是對工業資本真正的讓步，因為這個公社是農奴制度主要的餘孽，是羈絆農民在田間的主要工具，換句話說，這是保證商業資本自由剝削農民的主要工具。所有這個過程，——商業資本束縛農民和剝削農民，我在第一次的講演中已經說過了，現在無須回復去講，公社

是商業資本主要的目的，商業資本主要的利益。但現在呢，情形可就不同了。

情形的變，在革命以前已經開始了。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已經廢除了株連法，即廢除了公社統治主要的軸心。此後的行動，實際上不外是一九〇三年所廢除的株連法之邏輯上的發展而已。但是我們應十分明瞭的，在歷史上，邏輯究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工具，從一切的歷史事件中，或則完全不能得出邏輯的結論，或則閱時甚久才能得出邏輯的結論。資產階級的憲法，是從六十年代資產階級改革以後，所得出來的邏輯的結論。可是，在一九〇五年以前，邏門諾夫並沒有得出這個結論，即在一九〇五年時，也只得出了一些十分不明確的結論。反之，由廢除株連法所得出來的邏輯的結論，却是非常之快，非常之明確。

農民的羣衆，也是這樣，——這一點我已經在『俄史要略』中說過了，——這樣農民的羣衆運動，初時弄得地主們很狼狽不堪，於是乃提出一個草案，擬將地主一半的土地送給農民，這是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間專制君主正驚得魂飛魄散之時，故維德所提出的草案，頗博得尼古拉的惠顧。但在一九〇六年初，狼狽的時間一過以後，尼古拉對於維德及其內閣枯特爾所擬定的土地改革的草案，便十分冷淡了。故羣衆運動對於史托里平的立法，有

莫大的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不過羣衆運動沒得勝利，只是工業資本的勝利罷了。工業資本客觀上究竟需要什麼呢？當然需要憲法，憲法是賞心悅目的東西，對於剝削者好像錦上添花一樣，委實生色不少。但是剝削者對於人民的自由，尤其是對於真正的人民的自由，又怎樣呢？假使這個自由有如英德兩國的門徑一樣，那末工業界的企業當然也是需要的，也要經過個門徑，但在企業家的內臟和軀體內却沒有自由的要求。企業家只要法律上的自由，換句話說，是要工人和無產者從土地中和生產器具中解放出來。這是企業家第一個需要。工業的企業家第二個需要，便是國內的市場，倘若他不能得到國外市場的時候，那末他就要國內的市場。日俄戰爭已經表示出找尋國外市場，暫時已經毫無希望，我們的企業家徒然依靠其手裏擁有的鬥爭，已經不能取得國外市場了。因此，必須擴張國內市場。上述兩件東西，就是我們的工業資本家真正所需要的，這不是憲法的虛文，而是資本家的經濟命脈：一方面，——是無產者，另一方面，——是國內市場。要有無產者，便必須要有更多的破產農民，要有國內市場，便必須要有殷富的農民，他們有較好的飲食，有較好的衣服，一般的生活更近人類，更享幸福，更爲妥當，只有如此，他們才能多多的消費工業的生產品。史托里平的土

地政策，恰恰是走着這兩條路綫的。他們的政策在保證我們的工業資本，第一，有『自由的』和便宜的工人，第二，有國內市場。

現在且來引證一些數目字。最先要說明的，就是這些改革有些什麼直接的結果，關於她的失敗方面，我在你們的大綱中已經講過。大綱中說過：『史托里平改革的失敗』（那裏似乎說，失敗的原因）。若認為百分之百才能算是勝利，那麼史托里平的政策便沒有此種成績，這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他的政策，多少總有一些勝利。請看數目字。一九一五年以後請求退出公社的戶口，計有二、七五六、〇〇〇，即等於俄國公社的戶口全數百分之三十。他的中間，有二〇〇、〇〇八、〇〇〇戶口，實際上是已經退出公社了即等於全數百分之二十。二。他們所得到的私有土地計一千四百萬畝，即等於全部公社領有土地的總數百分之十，但準備分給他們的土地又計一千八百萬畝。總共由公社分出去的土地有三千二百萬畝，等於俄國公社土地全數百分之三十——約為三分之一。這樣看來，若謂史托里平未能徹底破壞公社，這是對的，但是他已經破壞了三分之一的公社，這是不可否認的。往後史托里平不能有特別偉大的成績了，從請求退出公社的戶口數目可以看出。此地有十分奇異的統計表，請你

們聽一聽。

在一九〇七年，那時還有革命的妄想，奪到地主土地的希望，并未完全消失。故請求退出公社的，只有二一二、〇〇〇。一九〇八年——則有八四〇、〇〇〇，一九〇九年——有六四九、〇〇〇，一九一〇年——有三四二、〇〇〇，一九一一年——有二四二、〇〇〇，一九一二年——有一五二、〇〇〇，以後便一年一年的減少了。你們看罷，一九〇八年突然發生異變，大有天翻地覆之慨，請求退出公社的數量增加了四倍。用革命手段去改革土地的希望，已經完全消滅，大部份的農民羣衆都在史托里平的道路上摩肩接踵的想退出公社了。

爲估量這個過程的結果，還是用數目字來說明，較爲好些，試作一比較，在史托里平立法前有多少自立的農戶，史托里平立法後又有多少，換言之，即在一九〇五年個人的土地領有的數量究有多少，俄國自立的農戶的總數，（西部和南部各省較多），共有二百八十萬。一九〇五年以後史托里平的立法，又增加了農戶約爲二百萬，——即是約增加一倍，總共已經有四百八十萬了。但是一看農戶分化的數目字，則有十分奇異的數目，這與我上面所引證的關於農民退出公社的數目字恰恰相反。農民出賣分地：一九〇七年只爲二六、〇〇〇畝，

一九〇八年——一五七、〇〇〇畝，一九〇九年——三七三、〇〇〇畝，一九一〇年——五四、〇〇〇畝，一九一一年——五三三、〇〇〇畝，一九一二年——六五〇、〇〇〇畝，等等。你們看：農民羣衆之失掉土地，彷彿是融雪一樣。一九一五年初，退出公社的農民有百分之三十已經出賣了他的分地，其所出賣的分地約有百分之二十，共有土地面積二百八十八萬畝。

俄國的無產階級因爲史托里平的改革，增加了很多很多。你們倘若記得，十九世紀末葉，我們的純粹的無產階級只爲五百萬（列寧算作一千萬，半無產階級亦在內，那些有分地但無工資不能生存的人們亦算在內——純粹的無產階級却只五百萬，）那麼現在又增加了約二百五十萬，即增加百分之五十了。這一點應當記着的，因爲從此我們可以知道，何以當時穀物價格高漲，（關於這一點，等一會我再說）我們的工業還能如春花怒發的繁盛起來，自一九〇九年起，我們的工業較之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低廉的穀物價格爲基礎的工業要隆盛得多。所以然者，即因爲這個時候，史托里平的土地改良，十分聰明的開闢了門徑。當然穀物價高貴些，工資也要提高一些，但因當時有二百五十萬的勞動力流入市場上去，故其結

果，企業家於勞動力方面有莫大的競爭，對於工資便能獲得有利於自己的水平綫。這個事實必須記着的，因此可以了解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工人運動何以開始劇烈的緣故。新興的無產階級應當忍受這個殘酷的剝削，由鄉村出來的新勞動力裝在舊無產階級的身上，這當然，要加烈城市中的情勢，使工人羣衆的經濟地位大起劇變，使工人羣衆一天一天的採取積極的運動的形式。

自史托里平的立法以後，俄國鄉村一般的無產階級化，究竟到了什麼程度，這一點有下列的家畜數目字可爲證明。一九〇五年每一百居民共有馬廿五頭，一九一三年——有馬二十三頭，大角家畜一九〇五年——三十九，一九一三年——三十五；山羊和綿羊一九〇五年——五十七，一九一三年——五十一；豬一九〇五年——十一，一九一三年——十。這是史托里平立法所走過的一條路綫，這是史托里平使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聯歡的路綫。——這是經過鄉村無產階級化的步驟，給我們的工業以便宜勞動力的路綫。現在再說一說史托里平的另一條路綫——擴大大國內市場。此地我們有許多非常明晰的數目字。

先舉一些每個人消費糖的數目字：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八·七磅（三·四啓羅

克蘭姆)，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一四磅（五·九啓羅克蘭姆），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一九磅（七·七啓羅克蘭姆）。即多於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六年二倍之數。此等數目字，我故意引來形容鄉村的無產階級化。在這些數字裏面，你們也許要發生一種妄想以為農民羣衆的物質條件有點改善。這絕對不是的。不過有人食糖比以前多二三倍，這是毫無疑義的，瓦鐵的生產數目字，也是一樣：一九〇三年——一十四百五十萬普特（二二七、五〇〇噸），一九〇五年甚且減少了，只生產一千三百三十萬普特（二一九、五〇〇噸），一九〇八年——一千八百六十萬普特（三〇四、六〇〇噸），一九一一年——二千〇七十萬普特（三三九、〇〇〇噸），一九一二年——二千二百四十萬普特（三六六、九〇〇噸），一九一三年——二千五百三十萬普特（四一四、四〇〇噸），——瓦鐵的生產數一年一年的增加了。當然，不是破產的和出賣分地的農民能夠使用瓦鐵，（他們的屋頂也許破難不堪了），然而富農們則一天一天的多用鐵器、多用瓦鐵了。這種情形，還是在八十年代就已經有了，普列哈諾夫在他的著作中，早就描寫過某個富農的屋頂覆以鐵片又穩固又漂亮的事實，隨後用鐵片的當然是逐漸的增多。

最後，說一說，史托里平的第三條路綫——儲金銀行。一八九九年在儲金銀行內農民的儲金共有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〇三年（穀物價格高漲的時期）農民的儲金已經有了二〇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等於當時全部儲金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一二年農民的儲金共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比一九〇三年要多二倍以上，農民的儲金等於全部的儲金三〇·四%。

這是史托里平擴大國內市場，以與工業資本聯盟的另一條路綫。現在不多引數目字了，你們從新興的富農食糧及瓦鐵的分量中，當然可以推測得到，就是富農購買綿紗比較要多些，購買皮鞋比較多些，而其佔有農業機器，尤其是在南俄，也比較要多些。換言之，即富農會竭盡自己的脂膏去繁殖俄國的工業，培養俄國的工業。俄國的工業培養到什麼程度，俄國的工業興旺到什麼田地——我在下次的講演中，再行解釋。

我得到了好幾個十分有興趣的問題，我認為必須要答覆的，況且這些問題在我們的功課中，也是最重要的，我們對於這些問題，很少參考書，或則沒有完整的參攷書，所以這些問題，表面上是令人誤會的，可是很有興趣，這是要指出來的——這個問題就是：一九〇五年

的革命，我們的工人階級是否爲五個哥比（這是一字不漏的照抄出來的），抑或有什麼政治性質在內呢？

我應該說，據我的統計表，一九〇五年有一半的工人是在純粹的經濟的口號之下去罷工的——據昔多羅夫同志的統計表，經濟的罷工，只有三分之一，據此種事實而論，也完全不說，此等工人只爲五個哥比而奮鬥。此地必須分別兩個原素：一方面，是革命運動的性質，另一方面是革命的覺悟。

在我講演中，我盡力的指出了一九〇五年，我們工人階級革命的覺悟的確是落後的。工人階級上，上層分子革命的覺悟，工人階級先鋒隊，——波爾什維克黨革命的覺悟，這是毫無疑義的事實。然而這不是說，我們的落後的羣衆，沒有革命的情緒，不過這個情緒，還沒有達到明確的思想的形式罷了。我們工人階級革命思想的進步，始於第一次革命失利之後，這是不可解決的矛盾，正確些說，是辯證法，這我已經說過了。當工人們深信，他們向來所擬定的運動形式，經濟運動而無政治運動的形式，是沒有什麼作用的時候，於是他們便覺悟到政治運動。但這可不是說，工人們沒有革命的情緒。我問你們一個例子：一九一八年我們

的工人曾經要求平均分配教授的褲子，這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情緒呢？當時我應當出席莫斯科蘇維埃和區的會議對工人們解釋，平均分配教授的褲子，是社會主義最惡劣的形式，他們便質問我道：倘若一位教授居住五間房子并有五條褲子，我們則穿着襤褸不堪的褲子（當時製造廠大起恐慌）并且五人共住一間地下的房子，那末這是怎樣的社會主義呢？當然，這不是社會主義，他們完全是對的。他們具有社會主義的天性，同時對於社會主義沒有覺悟的態度，不知道不應當分配教授的褲子，而是要在另一方面更急進的和更有系統去幹。

所以從來我沒有斷定過，一九〇五年的工人只爲五個哥比而奮鬥的；但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把自己的革命看做與廠主鬥爭無異，在這個關係上說，他們是與農民相差不遠，因爲農民看作自己的革命是與地主鬥爭無異，——這一點是完全正確的。

然而，我們決不能把這個運動看做是『五個哥比』的運動，否則，我們便不能了解一九〇五年我們的工人運動和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九〇年英國工人運動二者間的差別了。英國的工人運動，實際上是爲五個哥比而奮鬥的，因爲他們自覺的避免革命運動；在整個的工會主義時期的過程中，即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這四十年的過程中，英國的工人并不是革命

者。他們自覺的放棄了革命鬥爭的形式。這確實是爲五個哥比而奮鬥的，而我們的工人沒有避免革命鬥爭的形式。按其天性，按其情緒，我們的工人已經是革命者了，不過還沒有認識其革命運動的終局，并幻想着這個運動是以戰勝廠主爲限罷了，那時怎樣再進一步去打倒沙皇；這是他們還沒有認識的。

這樣就可以了解我所說過的一九〇五年工人運動中的經濟主義了。

現在答覆與此有關係的一個問題：如何去了解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這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呢？我認爲這是對於『資產階級的』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革命之一種玄學的解释，這種玄學的解释，考茨基還是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便已經把他打破了。

一九〇五年普列哈諾夫質問考茨基道：按革命的性質來看，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呢，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呢？——考茨基答道，這是舊的腔調，而不是馬克主義的說法。列寧又註疏考茨基的話：『俄國的革命，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爲資產階級，不屬於現在俄國革命運動的動力。而俄國的革命，亦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因爲這個革命絕不能實

行無產階級單獨的統治或專政。『此地還要補充一點，孟什維克所了解的資產階級革命，換言之，即工業資本的勝利，可以說，我們沒有充分的力量去完成這個革命的事業。』

我已經說了，史托里平立法的政策是什麼東西，其意義何在。他的是破壞鄉村公社，倘若翻成法國革命的語言，那末，這便是——『取消特權』。障礙法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者，是特權，所以必須掃除這個障礙，同樣的，障礙我們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者，則為鄉村公社。誰來掃除我們的鄉村公社呢？是反動的史托里平的政府——就是沙皇的政府。

這樣一來，對於發展工業資本主義，我們就無須用強暴的爆發了，雖然不否認，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的羣衆運動，在相當的程度上，曾經加速過個發展的過程。一九〇三年廢除了株連法，一九〇六年事實上已經實行消滅鄉村公社了，沙皇政府既已動手消滅公社，於是便不需要革命，而只用改革就可以完事了。在消滅公社的關係上說，一九〇五年的工農運動是有『催促者』的作用，好像農民騷擾，是與克雷姆戰爭時期的『催促者』相差無幾，當然前者的運動是比較更有力的。你們十分知道，十九世紀的君主專制，很能聽從工業資本主義的要求，況且，君主專制的本身，完全不是封建的白頭老翁的餘孽，而是商業資本主義的

構造，換句話說，即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期的構造。

現在不須答覆另一個問題了，——這是關於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的問題。問題說道：工業資本較之商業資本，既為更高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商業資本何以能戰勝工業資本呢，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個問題又是純粹的玄學。斷不能以為這樣：咚，咚，咚，——商業資本來了，咚，咚，咚，——工業資本來了。咚，咚，咚，——社會主義來了。這樣的，像小孩子一樣的想法，是不行的。我說出『小孩子』這句話，實在對不起，但我不是說你們，而是說那些有此思想的政論家。這樣的思想是不行的。人類歷史的過程是萬流的總匯。最終的結果，當然，是更高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取得勝利，這一點，在史托里平立法的例子中，你們剛剛看見了。形式上是商業資本勝利。工業資本從中取利的羣衆運動，已完全被壓制下去了，然而革命終竟有利於誰呢？革命有利於工業資本，萬流匯利的結果，工業資本佔了優勝的地位。這是經過了十分複雜的迂迴曲折的道路，一般的歷史的過程都是如此。倘若歷史沒有這樣的迂迴曲折，那末完全沒有研究歷史的價值了：看看社會學就夠了。我們何必要研究歷史呢？我們研究歷史因為實際上所有的原因是複雜的、是錯綜雜合的，有的向前奔馳，有的向後退

却：因為我們在生活中，在實用策略中必須實事求是，我們應當在歷史的例子中去研究，使自己能夠適應這個複雜的變幻無方的和迂迴曲折的歷史過程。我們應當準備，我們所走的道路，完全不是直捷了當，而是萬分曲折，忽而凹地，忽而溝壑等等；我們若不注視自己足跡所歷之地，換句話說，若不研究人生歷史的實際，那麼我們只有在溝壑中失足和顛墜，焦頭爛額，粉身碎骨罷了。

現在答覆最後一個問題，本來這個問題是屬於我們的功課，可是我沒有把他加在我的講演計劃之內，——這個問題就是：立憲民主黨究竟是什麼？在私人的談話中我已經告訴過同志了，此地有從警察局文件保管處得來的極奇特的文件，當我們公佈這些文件的時候，立憲民主黨人便非憤怒的說道：看看呵，波爾什維克又和那些播弄是非的人們完全同流合污了。立憲民主黨雖是合法政黨，然而警察局却還是注視她的；警察收集了關於主憲民主黨人的文件，這些文件是十分奇特的：這就是論及立憲民主黨的金錢問題，例如，在莫斯科，金錢上幫助立憲民主黨的，主要的是商業專門學校的創辦人維石涅可夫，莫斯科的大富翁臘布盛史基此等人物。臘布盛史基是最慷慨疏財的幫助立憲民主黨人，所以在第四屆國會改選時，立

憲民主黨人選臘氏爲國會的候補議員。因爲臘氏是個慷慨疏財的人，此外，他又有自己的報紙。臘氏有這兩種資格，對於立憲民主黨人，自然是特別重要的人物。根據非正式的消息，我知道以前是這樣的。在此事之前，我還不知道，在一九〇七年莫斯科立憲民主黨的『新報』曾得過猶太的大資產階級的新迪嘉之資助，這個猶太的資產階級，第一是懸念民族的利益，嗣後她看了『新報』對於擁護猶太人的利益不甚出力，則求之於我們波爾什維克的政論家現在已經逝世的龍茨（他著有『俄國警察式的社會主義』一書，署名古利果爾夫斯基，并請龍茨爲該報的編輯。當時龍茨非常氣憤的說：豈有此理，你們的報紙，是立憲民主黨的，我呢，——是一波爾什維克。猶太的資產階級說：這沒有什麼關係。且我們認爲，你們對於民族問題的關係更爲明確。這樣看來，立憲民主黨的報紙，實際上是得了猶太資產階級新迪嘉的薪俸，你們看這個新迪嘉對於立憲民主黨的綱領，却頗懷冷淡的態度。根據沙皇警察的文件，立憲民主黨人從芬蘭資產階級的政黨那裏，得了許多的補助金，——得了三十萬芬蘭馬克，即等於三十萬佛郎，或十二萬金盧布，芬蘭資產階級的政黨要求，立憲民主黨在俄國的言論機關和國會中擁護芬蘭的利益。這又是一個例子。還有一個事實，即立憲民主黨的『聲

報』是由最大銀行之一、最有權力之一、伯克的資財所創辦的（伯克的姓氏我記不清楚，他是『聲報』的創辦人，以後他自殺，而『聲報』曾經登載了十分悲傷的伯克哀思錄等等），——另一個事實，便是警察局的探訪員，呈報立憲民主黨曾受窩爾詩、卡姆斯基銀行和阿索夫、頓斯基銀行財政上的幫助，我們如果把這事實都湊合起來，那麼我們便可得到一幅十分完備和明確的畫圖。由此也可以明白大戰時立憲民主黨所持的態度。這一點，我暫且不提前來講。

史托里平的政策，是與商業資本利益實行聯歡的政策，商業資本在個時候仍居統治的地位，因為穀物的價格繼續向上高漲之故。若以一八九九年的穀物價格爲一〇〇，則一九〇一年爲一〇三，一九一三年——一三〇。因為穀物價格高漲的關係，所以俄國穀物的出口，不特增大其分量，且增大其價值了。試舉俄國穀物出口之多寡與一九〇〇年作一比較，若以一九〇〇年穀物出口的普通量和盧布均爲一〇〇，則一九〇九年出口的普通量爲一八二，而從這些普特所得的盧布量則爲二四九。從此便可看出穀物價之高漲。在一九一〇年的普特量則爲一九六，而盧布量則爲二四五。一九一一年的普特量亦爲一九六，而盧布量則爲二四一。

因此我們的貿易格（這有什麼意義，我以後對你們解釋）便達到了最高限度的數目了。一九一〇年我們的出超，換言之，即出口多於入口，共爲五萬八千一百萬盧布。因此之故，商業資本便大占優勢，對於工業資本的關係，便只能談到讓步，只能談到調和了。

倘若史托里平的改革，是直接的和自覺的以讓步來滿足工業資本爲目的，那末，在自覺的方面，結果，史托里平的政策究竟對誰有利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有奇特的統計。『強有力的農民』除用退出公社的方法來掠奪同鄉共井的人，和購買無產階級化了的農民的分地以外，還佔了地主許多的土地。這個佔領地主土地的行動，非常積極。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這幾年中間，地主的土地出賣了一四、四〇〇、〇〇〇畝，即與農民退出公社時所得的土地相等。此等土地中，經過農民銀行的（即落到農民手裏去的土地），有六、四〇〇、〇〇〇畝。貴族所出賣的土地，在窩羅尼詩省和坦波夫省有百分之三十，在新比爾省有百分之三十五，在生馬爾省有百分之三十，在沙拉多夫省有百分之四十。換句話說，即地主的土地，差不多有一半已經轉移到農民的手裏去了。

這是史托里平政策的第一個結果，這個結果，當然不在史托里平的意料之中，這個結

果，產生了甘其食，美其服，居高堂大廈的農民。富農收買了地主的土地；且十分努力收買地主的土地。農民土地面積的增大，即由於貴族領地的縮小。倘若我們舉出一九〇六六年因購買私有土地，而向農民銀行請求借貸的數目字來看，則全數的借貸中，富農佔有一八·七%。合營公司佔有六三·九%。合營公司，——這是富農的公司，此時富農還是異常薄弱不能用個人的力量去購買地主的土地，但是他們組合以後，就佔有這些土地了；其餘一七·四%的借貸是屬於鄉村公社，即企圖增加舊式農民的分地，舊式公社農民的分地。這是一九〇六年的事實。倘若舉出一九一二年的借貸來看，那末個別的農家已經佔有八一·五%了，換言之，一九一二年地主土地五分之四已經賣與個別的農民了，合營公司的借貸只為一七·八%，而鄉村公社的借貸則為〇·七%。鄉村公社已經墮落不堪了，此時差不多已經沒有地主的土地了。富農的合營公司，差不多也用不着了，因為此時農已經興盛起來能夠使用個人的力量去購買土地了。農民從地主手中買來的土地，有四分之三是歸個別的農民所領有。你們看看，此時農民的土地所有是如何，是如何偉大的個人主義化了，而在經濟意義上那些最進步的分子，其土地所有之擴張是已經達到什麼程度了。

你們記着，我在幾次的講演中說過，富農——是鄉村中破天荒的自由主義者，且爲鄉村中民主革命的柱石。當時居住於俄羅斯的普利阿不拉仁斯基同志（此時我在國外）與我談話時，他斷定道，在這數年間鄉村中革命的情緒，無疑義的，上昇起來了。這是他個人的見地。他的見地已被警察局偵探證實了，一九一一年探訪員說，在不久的將來，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同樣的，此時各個有名的社會運動家也這樣說過。

這是史托里平的政策始終沒有豫料到的結果：鄉村中的個人主義化有莫大的發展，怒憤填胸的仇視地主的分子，亦有莫大的發展，同時這個分子日益強固日益擴充，且用合法的手段一天一天的吞併了地主的土地，然而你們可以推想，人們化費自己的積蓄去購買地主的土地，然而你們可以推想，人們化費自己的金錢去購買地主的土地，較之二錢不費的得到這些土地當然要滿意得多，——這是自然而然的。

末了，還有一個最後的客觀的結果，也值得我們的研究。此地我們又有頗奇特的統計表。倘若我們以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這五年間俄國耕地的面積爲一〇〇，那末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這四年間爲一一〇。耕地的面積已經增加一〇%了。倘若我們以一九〇一年

至一九〇五年的收穫爲一〇〇，那末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收穫爲一二三·六三。耕地的面積只增加一〇%，而收穫的數量，差不多已經增多三二五%（二三·六）。

這樣一來，公社的破壞和富農分子的形成這種客觀的經濟的結果，乃是進步的結果。收穫率和深耕法擴大起來了，由是農業機器的使用也就隨之而增加。一九〇九年農業機器入口，只值一九、一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在一九一三年已經有——二三、七〇〇、〇〇〇盧布了；複雜的農業機器的入口，一九〇九年——一四、七〇〇、〇〇〇，而在一九一三年却有——一三、〇〇〇、〇〇〇。此地你們須明白，複雜的農業機器，即使蒸汽的機器，大部份是用的大領地之上，而簡單的機器則多用於農民的田莊，從這個主要的事實着眼，你們又可看到富農的發展了。富農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的革命頗有根深蒂固的反動性，但他們在一九一七年都曾經與鄉村中一切其餘的分子而共同反抗地主。一九一七年十月還有最後一次的統一戰綫的進攻；只自一九一八年夏天起才開始反革命的富農運動。一九一八年十月二日日列甯在全俄貧農委員會代表大會上說過：『自十月革命以後，我們革命發展第一個階段，第一個時代，主要的，就是戰勝全體農民共同的敵人，即戰勝地主。在這個反抗地主的

鬥爭中，不能不激起所有的農民來參加，而且事實上也已經把所有的農民都激奮起來了。這個鬥爭聯合了不剝削他人勞動的貧農。這個鬥爭也聯合了較為安康的農民和一部份甚至最豪富的非有僱傭勞動不行的農民。」

第八講

我在前一講曾經說過：俄國第一次革命的結果從政治的立場上，從狹義的政治的立場上來說，乃是商業資本及商業資本所造成的專制政府之偉大的勝利，但是實際上却又是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的妥協。所謂妥協，便是從社會經濟立場上說的。爲得到政治上的勝利，商業資本委實耗費不少；他失去了舊的工業資本前的強有力的剝削工具——農村公社。農村公沒有被史托里平的法律所破壞，這是史托里平失敗之處；簡單說來，就因爲他的時間太少，因爲無論如何，這個過程決不能在短短的幾年中就迅速的完成的。但是就這短短的幾年中，

已經做了很多有利益於工業資本的設施了。我們在二十世紀之初所遇見的，把階級爭鬥移轉到鄉村（這在我們當時的黨綱上有極大的作用）這點，現在反動政權的力量確實已經轉移到鄉村中去了。這反動的政權是擊敗革命黨人的政權。這是矛盾——不，我們不稱之為矛盾，而稱之為歷史過程的辯證法，在這階級爭鬥注入鄉村之後，其結果一方面則有鄉村人民之急劇的迅速地無產階級化，給工業資本以廉價的勞動，在另一方面則造成了富裕的鄉村資產階級，替工業資本造成了國內的市場。

現在我們且把這過程下個總結，并以極少的數目字去分析這個結果。

自然，首先便應該看工業原料之發展，次之，則工業生產品之發展。工業原料之發展，可於下列數字中見之：在一九〇八年煤之探掘為十六萬萬普特（二千六百萬噸）而經過五年之後，在一九一三年則近於二十二萬萬五千萬普特（三千六百八十萬噸）。這是產煤業之發展，即俄國工廠中的汽爐所消費的燃料之增加。當然，工廠的生產亦與此同樣的增加了。如以鍊鐵為例，則有如下之數目字，在一九〇〇年為一萬七千七百五十萬普特（二百八十九萬噸）。在一九〇三年（恐慌最激烈的時候）一萬五千〇二十萬普特（二百四十萬噸）。一九

○八年一萬七千○十萬普特（二百七十萬噸）。在這裏的數目字與二十世紀初不相上下，在一九〇九年的下半年市場行情大為變動；有許多的表現，其中之一是我個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所感覺到的，正在一九〇九年時，我移居巴黎，我所得的文稿的酬金，亦匯到巴黎去了。我計算了我應該從銀行中得到多少錢，但是他多給我了。要銀行中多給錢給別人，這是決不會有的事情，我想大概是我算錯了，重算一次，結果還是不錯，到底爲什麼呢？銀行是決不會津貼我的。原來是俄國的盧布匯價高漲——在國際交易所中他超過了本價。盧布原價爲二百六十六生丁，當時則漲至二百六十八——二百六十九生丁。這是俄國貨幣史上盧布在國際交易所中超過本價的空前的一次。普通匯價總是低於原價的。這段逸話顯然是表示一九〇九年下半年市場行情的變動，從這年起，鐵之生產開始增加了，一九一〇年產鐵一萬八千六百五十萬普特（二百〇五萬四千噸），一九一一年二萬一千九百四十萬普特（三百五十八萬噸），一九一三年二萬八千二百四十萬普特（四百六十一萬噸），這是大戰前的最後一年，以後鐵的生產更爲增加，這就是因爲要製造戰爭所需要的兵器和大砲等等的原故，俄國當時表面上雖有鐵的飢荒，由外國運入生鐵（以後在講演大戰時期的經濟中你們便可知道），但是戰前鐵產

之增加，那是毫無疑義的表示着我們工業的基礎已有極大的發展，因為五金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之基礎。這個生產的基礎異常迅速的發展。市場上的消費品自然亦隨之而發展，試以一九〇〇年之數目爲例，則棉花之消費爲一千八百萬普特，一九〇八年一千九百八十萬普特，一九〇九年二十三萬萬普特，一九一〇年二千三百五十萬普特等等。這次可算開了俄國棉花消費史上的新紀元，俄國工廠建立以來從未消費過這樣大量的棉花，這是百年史上最新穎的一頁。

因此我們便可武斷的說：一九〇九年以後諸年是俄國工業有力的高漲的時期，是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發達繁茂的時期，這種繁茂是在第一次革命與史托里平政策的矛盾的（或辯證法的）結果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當然，我說史托里平政策，並不是想歸之史托里平個人，只不過是爲簡略而已，實際上，這是商業資本迎合工業資本的要求的政策。這是繁盛的基礎，現在我且把商業資本爲什麼能夠這樣揮霍，這樣寬宏大量的施恩於其幼弟的原因講一講，至於這個現象的其他方面我暫且按下不提。

前講我說到階級爭鬥移到鄉村中，在那裏造成了富農——國內市場，及貧農——爲工廠

所需要的無產階級；商業資本就必然的造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因為革命的力量發展了，更確切說，造成了兩種革命力量：一方面產生了德謨克拉西的（非社會主義）富農——富農是鄉村中的第一等的自由主義者（你們大概還沒有忘了昂格爾加爾達的分析吧），在另一方面則造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無產階級，這裏商業資本對於幼弟之一切施捨，都是捨給忘恩負義之徒了，下面的數目字，表示這個忘恩負義之徒蠶食的狀況，你們記得，十九世紀末俄國工業之發展主要的是依靠外資輸入，在維特時代投入工業資本中的資本大部份是在俄國，把俄國之租稅在巴黎的市場上賣給法國。因此得到了十五萬萬以上的盧布，這些資本則完全投入於工業之中。你們可見，在這種條件之下，俄國的資產階級就要依賴這個直接供給他們以資本的國庫了，因為每個落在俄國資產階級手中的盧布必先經過國庫，這個中間的連鎖（國庫），於是就成為限制俄國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障礙。為免去雜亂起見，在前講中我對於這點，并未提及，然而必須在此指出，當然，這雖不是主要的，然亦是使得九十年代俄國資產階級效忠於沙皇及祖國的要點之一。資產階級必須經過國庫或由國庫幫助，才能得

到生產上所以必需的東西。這一點是有極大的作用的。

但如以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時期，即一九〇九年以後工業高漲的時期的數目字來看，則情況迥然不同。試以那些曾經立案的俄國股份公司和外國的股份公司的資本來看：在一九〇八年立案者，俄國的股份公司計一百〇八個，其資本共一萬〇三百四十萬盧布，外國公司共十二個，資本九百萬盧布。在一九〇九年俄國公司一百十六個，資本共九千五百萬，外國公司十五個計資本一十二百九十萬，一九一〇年俄國公司一百八十一個，計資本一萬九十九萬，外國公司十七個，計資本三千三百萬；一九一一年俄國公司二百二十二個，計資本二萬四千萬，外國公司四十個，計資本八千萬；一九一二年俄國公司三百二十二個，計資本三萬七千一百萬，外國公司二十個，計資本三千萬元；一九一三年俄國公司三百四十三個，計資本五萬〇一百萬，外國公司二十九個，計資本四千四百萬。如果把上面二個數字相比較一下，則可見外資在俄國工業中其作用之逐漸減少，而本國資本之作用日增，同時，此種增長却并非由國庫所致。而是資本之自然積累。這種積累之過程，我們從其他的數目字中從糧食出口的數目字中可以看出。我們糧食出口之增加有如下之比例。如以一九〇〇年糧食出口普特之數

日作爲一百，則一九〇九年爲一百八十二，一九一〇年爲一百九十六，一九一一年同上。如以上出口糧食之價格而論，一九〇九年爲一百，一九〇九年爲二百四十九，一九一〇年二百四十五，一九一一年爲二百四十一，總之出口品的價格要比其容量多一倍半左右。這就是昂貴的糧食價格所起的作用。這一點我以前曾經屢次說過。這種對外貿易的出超，亦即是充實俄國資本家錢囊之金河（出超在一九〇九年達到一個極大的空前的數目字，五萬八千一百萬金盧布）因之現在俄國資本之繁殖，並不倚賴外資之輸入（如從前一般）而在「本地」之積累，其結果則使俄國資本主義更勇敢更利害，在一九一二年甚至組成了自己的反對黨，即所謂進步黨，其首領爲斯杜盧威（在思想上）與加腦伐洛夫；加腦伐洛夫是一個大工業家，後爲臨時政府中的工商總長。這個黨在政綱上右於立憲民主黨，而在策略上則左於立憲民主黨；他對政府說話的音調比立憲民主黨更爲堅決。立憲民主黨是俄國資本主義的思想。但不是直接代表工業的，這點我上面已經說過了。我們的工業家至今還是直接地團結於十月黨之中，十月黨首領顧起可夫，因之在這十月黨內的左派（進步黨）；較之立憲民主黨便要強硬得多，這一點是很可令人注意的。

當在鄉村中產生了仇視商業資本與專制政府的份子的時候，在地方市中在大資產階級中也發展了反對政府的心理，與此相幷而行，在當時有許多的有經驗的馬克思主義者中，甚至還產生了一種這樣的妄想以為俄國走進了普魯士式發展的路上，他們說，資產階級的憲法在俄國多少可以經常地發達起來，羣衆的工人運動自然是要發生的，但是沒有新的恐慌，沒有大的革命高漲。你們也許知道，魯沙可夫就是在這種見解上面脫離了本黨的。他說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而離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尙遠；因之現在我們應該按照孟什維克的樣子改造本黨的組織，取消黨的秘密組織等等。其詳細情形，你們可於黨史中知道。

這就是我所說的史托里平政策（或者更確切些說：在俄國第一次工人革命之後的商業資本主義政策）之政治的經濟的結果。國內似乎是很穩固的。假如外交政策亦與國內情形一樣的順利：我並不將加以推斷。因為推斷是歷史上最無聊的事。事實是這樣，就是外交政策方面遠不如內政之順利，而在本期之末，在俄國經濟範疇中，正從外國方面逐漸堆滿了烏雲。

國內市場之發展，在史托里平設施的影響之下，其速度依然是不能滿足俄國工業資本主義之飛快的發展的需要。當然，生產絲綢比較製造那些能購買穿着這些絹綢的人，要容易的

多。第二個過程顯然的落後於第一個過程。很可注意的，就是製造品的市場在這時期之末開始停滯了，一九一三年時許多專門工業的及其他的經濟的雜誌，開始預示這個停滯，這個停滯的結果使俄國的工廠主企圖開拓海外市場。企圖那一種海外市場呢？這是不難猜想到的，他們決不會想把俄國的絹綢輸運到英德去。試以俄國內亞洲邊境方面所運出去的紡織品來看，則有以下的數字：在一九〇九年爲二千一百五十萬金盧布，經四年之後，在一九一三年爲四千〇八十萬金盧布——在四年之間俄國由亞洲邊境運輸到波斯與土耳其兩國去的工業品增加了幾乎兩倍，這增加是非常之偉大的，特別是俄國的工廠幾乎佔領了波斯的市場，這數目字，你們可以在『外交政策』一書，即以前在『教育雜誌』上登載過的『俄國帝國主義之今昔觀』一文中找得。在那裏你們可以看到，波斯的工業品的入口，俄國要佔第一位，超過英國，其他各國則更不容說了，甚至英國的紡織品在波斯市場，還不及俄國的紡織品。因此，波斯的市場，便很堅固地被俄國的工業品所佔領了。但同時，因爲俄國的富農發展得不十分快的緣故，俄國的工業品在波斯的市場的上仍是銷售不完，故俄國的工廠家還應該把自己的眼光向西方注意，因此便開始把自己的工業品運輸到土耳其去。

俄國的資本主義一般的積累是建築在食糧出口之上，我並且曾以數目字來表明其日漸發展的情況。但是現在我應該加以修正。糧食出口之發展只到一九一一年爲止，自本年起，他便大爲降低了。在一九一一年糧食出口的數目爲七萬三千五百萬金盧布，在一九一二年則爲五萬四千七百萬金盧布，數目已經降低了。而一九一三年則比較多了一些，爲五萬八千九百萬金盧布，但是比較一九一一年的數目總還是低落了許多。很可注意，不但盧布的數目減少了（這是糧食價格低廉的原因，你們知道，糧食價格在這時候已經逐漸低落了。）連出口的普特的數量亦減少了。在一九一一年俄國輸出麥類共八萬二千一百萬普特，而一九一二年則爲五萬四千八百萬普特。這是爲的什麼呢？俄國出口的降低，對於俄國對外貿易的平衡頗有極大的影響，這種現象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你們記得，在一九〇九年之出超爲五萬八千一百萬金盧布，一九一二年只有三萬九千一百萬金盧布，而在一九一三年只有二萬萬了——低落二倍有餘，這是一個異常緊要的預兆。流到俄國資本家錢囊中去的金河開始淤塞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是：在一九一一年九月間爲爭奪的里波里之故開始意土的戰爭。爲使君士坦丁堡不受意大利的襲擊起見，土耳其便把海峽封鎖。土耳其自封鎖韃靼與巴斯福爾兩

海峽之後。我們從黑海方面的出口便完全停頓，其結果則得有上面所說的數目字，在意土戰爭以後，接着就有俄國所挑引起的巴爾幹戰爭。俄國却並沒有估計到自己挑引的結果。海峽的封鎖，數年來遷延不決，使俄國的資本主義受了很大的打擊。其影響如何，你們可從官場的文件中看到。這就是俄國銀行在這些事變的影響之下，三四個月的短期期票，其利息增加·七五%，卒致資本陷於恐慌之中。因為利息的增加乃恐慌的表誌。

在我說過的外交政策上的許多事件之中，還有最後一點要補充。

在這幾年中俄國的米出超，及一切從國外得來的各種利益，其基礎仍是昂貴糧食價格。自然，俄國的工廠主記得這種價格是永遠不會變動的。因為許多人都不懂辯證法，不知道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變動的。實際上，歷史的過程永遠是辯證法的，這裏就有如下的情狀。如以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的三年平均而計，則大麥之價格每普特為一百十八哥比，而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三年中的平均價格，則為一百十哥比。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的三年中燕麥的平均價格每普特為九十九哥比，而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的三年之中之平均價格則僅為八十五哥比。麥類的價格很明顯的降低了。如果我們的工業品在東方的競爭者

是英國，那麼我們麥類的競爭者便是德國了。德國從十九世紀末俾斯麥時代起，也已開始採用了關稅保護政策，不過他們的保護政策對於工業品的保護（德國對工業品的入口稅不十分重）沒有對於農村經濟的保護那麼嚴厲罷了，德國麥類的進口稅每噸在八十年時代爲十馬克，一八八五年已爲三十馬克，一八八七年五十馬克，一九〇二年燕麥的進口稅爲五十馬克，大麥爲五十五馬克。在工業進口稅的保護之下發展了俄國的工業；麥類進口稅的保護之下發展了德國的農業；講到一九一三年時普魯士每俄畝的生產力——不管土地的要劣——竟達到二千七百啓羅格蘭姆（近於十二普特半），同年俄國每俄畝的生產力，則只有九百畝啓羅格蘭姆，即少兩倍多。德國的農業在此種偉大的生產力之下，他就能很順利的與俄國競爭，俄國麥類的輸入德國逐漸減少，特別是燕麥，在一九〇〇及一九〇四年間，德國每年輸入八十二萬八千噸俄國燕麥。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八年間每年輸入只有五十五萬五千噸了，而在一〇一二年，輸入德國的麥類只有二千六百八十噸了，這就是說比二十世紀初減少了四倍。並且還有十一萬四千噸德國燕麥輸入俄國，這是空前未聞的大衝突，在燕麥方面，德國農業已經在俄國的國內市場上與俄國競爭了。俄國消費的省份主要的是西北各省如不斯可

夫省、新城省等等。運入廉價的德國燕麥比較運入本國的高價的燕麥便宜得多。這是真正的衝突。這使俄國在歐洲戰前其數目還決定要征收穀內的進口稅。這一點在我們看來是很重要的，因為他正在某種一定的方向上，加緊了當時所有的外交上的矛盾。你們可見這情況是異常複雜的。俄國的工業努力向東方去——波斯與土耳其。整個的俄國資本主義在波士二國，都對德有直接的利益關係。故在爭取東方市場的經濟爭鬥上便形成了俄德的衝突，而不是俄土或俄英的戰爭，反之，却是俄德戰爭。這便是一九一四年大戰前的經濟情狀。

現在不再多用數目字了，讓我來說一說，當時之外交界情況。

我現在來講那些直接引起一九一四年衝突的條件，及俄國參加世界大戰的諸原因，這個戰爭又直接的引起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爆發，羅曼諾夫皇朝的崩潰，最後則有十月革命之完成。凡是稍為明白事體而不十分愚蠢的人，便不懷疑，俄國之所以參加一九一四年大戰的原因，主要的就是要根本解決海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俄國商業資本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握取了巴斯福爾與韃靼之後，俄國的商業資本就能成爲東歐糧食販賣中之專利者，因為韃靼成爲俄國的海關之後，則該方面惟一的競爭者，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便要成爲俄國商業資本

的附屬品了。

俄國在開始戰爭時，土耳其是中立的，甚至還有拉攏土耳其爲俄國聯盟者之企圖，但是因爲有上述的事實存在，故雖在事變之初，此中底蘊，也是沒有一人不知道的。但無論怎樣土耳其暫時并未參加戰爭。然而對於每一個頭腦清晰的旁觀者，就十分明白清楚的知道：俄國之所以要戰爭者，只是爲了海峽。大戰之末年（一九一七年），關於這點已經完全公開的說了；在這一方面，米留可夫爲韃靼海峽而特別聞名於世。在革命之後，我們也找到許多文件證明在事變開始時就已經是這樣了。

我上面所指出之現象——在海峽封鎖之後，俄國麥類輸入之降低，俄國出超之低落——在政府中引起了很大的不安；試看尼古拉與英公使 裴加安的談話便可知道。尼古拉說，海峽之封鎖使俄國的商務陷於異常困苦的情況之中，假使和平方法無效之時，那麼即以武力開闢亦所不惜。這是一九一四年春天所說的話。

因此，當時俄國所受的經濟困難，與韃靼問題，及一九一四年大戰的關係，我們可十分明白了。現在要把這種關係稍加具體的說明。

日俄之戰，在外表上雖是商業資本主義與俄國沙皇政府殖民地政策之嚴重失敗，然在別方面亦有一個優良之結果，人在吵打之後往往變了好友，『不打不成相好』，俄英在亞洲亦是一樣。在幾乎一世紀之中至少亦有七十五年中，英俄是不可調和的仇視者，是不可調和的敵人。英俄衝突充滿了整個的十九世紀，直至一九〇四——〇五年，日俄戰爭亦是英俄衝突之一部份，亦是英俄資本在中國之衝突。但日俄戰爭却終結了這個衝突。英國之所以惶惶不安者，就在俄國有極大之陸軍；而英國則沒有這樣偉大的陸軍可用以保護殖民地，第一個便是印度。從此就產生了英國在亞洲對俄國疑忌小心的態度，形成了許多的衝突。這種衝突，至今還很深刻的印在那些在紅軍中供職的舊沙俄軍官的記憶中，但是富於實際性的英國人，在一九〇五年之後，在這點上他却很安心了。因為他知道俄國在陸路上其偉大不像從前所想像的那樣可怕。日本的軍隊很容易的戰勝了，而日本的軍隊，從一九〇二年起，從英日協定成立之日起，正是保護英國在亞洲的領土的力量。在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協定的基礎上，日本軍隊在一切的亞洲的衝突中應該幫助英國。日本可不必干涉亞洲的衝突。這就說明，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日本軍隊之沒有出現於亞洲舞台上之原因。但是英國之所以懼怕俄國，正是爲

着亞洲的事情。現在英國的印度既有日本的軍隊來保護，那英國自然可以高枕無憂了。

因為，在一九〇五年前咬牙切齒仇視俄國的英國，在一九〇五年之後，這咬牙切齒就變為和愛的微笑了。這正與米留可夫相反，米留可夫只從微笑變為切齒。英國現在則不然了，英國現在很善視俄國，在一九〇七年以後，英俄關於亞洲的問題還訂了許多的協定，在這協定之中，兩國就劃定了勢力範圍，而且這個協定對於俄國并不是毫無益處的。英國資產階級在這裏很聰明的了解，激動敵人是用不到了，應該以小小的東西來賄賂他。這賄賂俄國的小的東西，就是在波斯北部經濟勢力範圍之退讓。

因此，俄國得了一個發展與運輸貨物到波斯去的可能。這是英俄協定之直接的結果，英俄之衝突是消失了，所以在遠東一切的事件亦停頓了；遠東問題已經放在次要的地位了，俄國外交界之注意力及海軍勢力都移到近東去了。在一九〇七年之末，英國公使曾與當時俄國的外交總長，（後為駐法公使）與為世界大戰的罪人之一的依滋伏而斯基有過一次談判。若以個人而論，則世界大戰的罪犯，在法國為樸廕開雷，在英國為葛雷，在俄國則為依滋伏而斯基。當依滋伏而斯基還沒有為駐法大使之前，還在俄國外交總長任上的時候，在一九〇

七年之末，已與英國駐俄公使有一度之談判。英公使在這次談話中，曾暗示他說，如果現在俄國佔領近東時，在英國方面決沒有什麼反抗之行動。

英國這種態度，應稍加解釋；英國對於近東事件是異常注意的，因為從英國到印度去的最短的捷徑要經過這近東一帶，經過地中海的東部，所以，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英國已完全購買了蘇彝士運河的股票，在資產階級的法律關係上，成爲世界脈絡之主人翁。雖然這運河在資產階級的法學的觀點上看來似乎是中立的，但是因爲股票全在英國人口袋裏，實際上他當然是屬於英國的了。故英國用盡了一切的方法來保護這個捷徑，不致被人侵害。因爲，在英國和俄國衝突的時期內，英國對俄國侵佔海口的企圖是非常注意的，因爲這個侵佔非常接近這條捷徑。假如俄國在韃靼海峽有了海軍之後，他便可隨時出來打斷這條航路，使英國感到極大的困難，但在對馬島之役以後，俄國的海軍可說沒有了，從英國看來黑海中的偉大勢力，實際上是非常渺小的，英國的艦隊決不會懼怕那巡遊於西伐斯多泊爾、奧得薩與新俄羅斯間的五六個陳舊不堪的鐵甲艦。這方面對於英國可以說毫無危險。

同時，在十九世紀末，對於英國發生了別個極有力的競爭者，德國帝國主義出現於世界

舞台。在一八九八年德皇威廉極奢華的巡行到耶魯薩冷，沿路各城（君士坦丁、大馬斯克）到處駐蹕，並發表政治的演講，這些演講把他的政治技術完全表露出來了。一言以蔽之，引起了極大的紛擾。明白的證明德國準備侵略此地。特別顯明的就是威廉在大馬斯克的演說，在那裏他說對回教之敬愛，他說，回教的人民沒有比德國還更好的朋友。此處應該說明的，即英國人是回教人的好友，這已經成為英國人的特權之一，英國之所以盡力要交好回教人，即因回教乃英國在印度惟一的柱石，現在德皇威廉居然說；德國比英國是回教人更好的朋友，這自然要引起莫大的喧擾。

從這個時候起，下一年一八九九年，德國在土耳其得到建築鐵路（從君士坦丁堡到報達及波斯灣的租借權。這是在一八九九年。在一九〇二年，這個租借權訂了約。同時德國之著作家如羅爾巴及利文洛夫等，開始寫了許多不可思議的東西。羅爾巴出了一本小冊子，上面很詳細說明某國利用報達路來佔領蘇彝士運河及埃及是何等容易的事情。我不知道，這種東西，怎樣會在出版界中出現。全世界的任何一個批評家都會對著者說，對不住，你如果要自思想那麼天高地遠無所不可，但是請你不要寫出來吧；你看，英國人立即就會讀到了。但

羅爾巴大膽寫了，德國人大膽地印了，正與威廉在大馬斯克及其他各處的演說一樣的大膽。英國人當然要大為震恐，英國不准任何列強侵略蘇彝士運河及紅海兩岸的演說，亦散滿英國國會中了。英國很直捷公開的說：這是迫得英國脫離愛和平的態度之惟一原因，而當時英國外交總長格藍斯頓公爵，對於德國在波斯灣出現的問題，第一個聲稱將以大砲為最後的手段。英國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實在被這些計劃草案打擊了不少。

故當時在一方面，有自對馬島之役以後，連一個軍艦都沒有的俄國，而另一方面則有佔有報達鐵路並謀以此路而進行侵略蘇彝士、埃及，及斷絕英印交通的軍事計劃之德國，因此『避重就輕』之舉，對於英國是非常顯明的了，俄國雖是怎樣不好，但現在他已經是無力無害的東西，故讓俄國到海峽邊去還不十分要緊；否則爪牙銳利的德國，（同時他在表面上的銳利較實際上更甚）若一旦侵入海峽中去，那就利害多了，這是絕對不能的事情。因此很明顯，在一九〇五年英國在法德為摩洛哥問題大起糾紛的時候，曾給法國以極大的助力，并因此在馬賽沿岸得了一個同盟者。而兩年之後，英國駐俄公使給了依滋伏而斯基一個暗示說，你們如有意於海峽，那就請吧，我們并不表示反對。

一九〇八年二月，在彼得堡召集了一個會議以史托里平爲主席。討論的問題是與土耳其實行新戰爭的計劃，主戰者一方面是依滋伏而斯基，別方面則爲俄國總參謀部，俄國總參謀部以爲戰總是不可避免的，土耳其聚集了無限的力量，明天就會來進攻我們，因此我們應得先加防備，而依滋伏而斯基則從外交着眼那裏是懷着惡意——要注意警醒才好呢，實際上，軍人之意見亦不一致，當總參謀部長巴利村說到上面所述及的那段話的時候，陸軍次長普列王諾夫說明什麼東西來戰爭呢？沒有機關槍、沒有子彈、沒有軍隊、沒有軍鞋等等，這是在革命之後的一九〇八年，在軍人中竟有這樣的分裂，史托里平在這裏頗有極大的作用，他是維特之後的專制政府中最聰明的人，史托里平極憤怒的在這個會議上說，目下一切關於戰爭的思想是不健全的政府的病狂，直接的說，依滋伏而斯基與其同伴們，簡直是發痴。他說：俄國剛從革命的潮浪中拯救出來，養精蓄銳還要很多的歲月，你們現在又想把他捲入新的戰爭之中。我在一日決不能允許有這種的狂暴的行動（史托里平當然沒有這樣的說過，但是他演講的意思是這樣。）而當時史托里平是一個極有勢力之人。只要讀一讀尼古拉給他的信就夠了。這些信中尼古拉對史托里平的諂媚令人驚心動目：『最敬愛的彼得·阿爾加得亦維

奇：明天任何時間內是否可以來一次，若於你不方便時，那我可定另一個時間」等，沙皇寫信給自己的總長竟這樣的謙遜。

上層勢力的相互關係既是如此，史托里平既已拍案宣補，決不允許戰爭，說戰爭是不健全的政府的病狂，那當然就會明白當時戰爭所以沒有發生的緣故。我在一篇論文中說過史托里平之死，也許與他在近幾年中嚴禁戰爭的主張（即近東問題亦不准戰爭的）多少有點關係，但無論如何，一九〇八年在政府中無疑地發生過一次大的變動，因為依滋伏而斯基由外交總長調為駐法公使，而史托里平之婿做了外交總長——在史托里平的眼光中看來，這乃是一個充份的保證，不至有任何的愚蠢的計劃提出來了。

因此在一九〇八年俄國帝國主義之根本問題，近東問題就已經放在當前了。

在史托里平不久之後，對土耳其其新戰爭之準備又積極的進行了，計劃是這樣：引起巴爾幹之衝突，利用巴爾幹諸國錯雜的衝突，陷土耳其其於極困難的境域之中（在武力上土耳其是當時極有力的強國）而以保護『同血同教的兄弟』的口實來加干涉。因為這樣是最容易適合俄國羣衆之社會心理。

這個問題比我所說的更要複雜的多。因爲在這個任務上要把巴爾幹兩個主要的國家聯合起來（或者更正確些說三個國家）其相互的關係比貓與狗的關係更惡劣。保加利亞仇視希臘人比土耳其人更甚，塞爾維亞仇視保加利亞到此種程度，凡在皮爾克拉答所通過的提案，在沙菲一定加以否認，巴爾幹的基督教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我們要使他脫離異教徒，并把他們在一個任務上聯合起來是很不容易的事，這裏我們有很奇怪的關係，所有的談判不是由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的政府直接談判的，而是在俄國駐塞公使尼克路獨夫及駐保公使加爾答維克間進行的。他們雖同是俄國外交部的俄國官僚，然而他們的關係常是很緊張的（純粹是爲了客觀的原因），只因爲一個是在皮爾克拉答，一個住在沙菲的原因，而且有一次幾乎使他們去決鬥。甚至於這些緩衝國亦被『斯拉夫兄弟』間的衝突所薰染。但俄國總參謀部有一位大佐（名字我記不得了）在這一點上確是一個很有天才的人物，他劃定了保塞兩國的疆界，使雙方在幾次爭論之後大爲滿意。俄總參謀部的大佐解決了。這個保全和平的任務。這任務對於俄總參謀部的大佐是不適合的，但無論如何他是成功了。這個分界是按照土耳其的領土而實行的。

在這時候大家都說：俄國時時關心保持歐洲的和平。你們當然會估計到這種情況：完全的和平，誰都不願戰爭，而同時俄國總參謀部的大佐坐在沙菲，面前放着一張土耳其的地圖，他在這圖上分割疆界，這歸塞爾維亞，這歸保加利亞，不破壞和平怎樣做呢？——這一點，大佐是不管的，因為他的作用純粹是技術上的作用。後來訂立了保塞協定。

俄國總參謀部大佐分割土耳其的計劃是很明白的了。法國普恩開雷看了這條約，驚呼道：『這是戰爭的武器！』這保塞『和平』條約，（當然對於土耳其疆域是絲毫沒有提到的，因為這是條約的祕密之部）是新戰爭的準備，這戰爭在一九一二年秋天，就真開始了。

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羣望所歸的土耳其，總以為他的武力一定能夠很易擊敗敵人，不料土耳其在戰爭開始時就被人擊得粉碎。保王菲遮南定製了希臘式的皇冠，以便進駐君士坦丁堡之用。這裏就發生了空前的混亂。當時在彼得堡甚至禁奏保加利亞的國歌：『馬利之怒濤』。俄國與保加利亞間的關係（保國是俄國在巴爾幹的斯拉夫兄弟）其緊張一至於此。保加利亞是俄國以前要救護的國之一，現在則無須援救了。

其結果則必須將取非常手段。羅馬尼亞被人唆使起來反對保加利亞，因之保加利亞很快的平靜了，其他的舉措也不能再事進行，因為棋局已經全盤的混亂。

這樣一來，在東方引起獨立的戰爭的企圖於是便沒有成功，但是這種思想還依然存在，俄國總想利用一切的口實藉以激起東方的問題，如於一九一三年末在重新恢復的土耳其軍中發現了以德利門·風·生地爾斯為顧問問題時，居然在彼得堡召集了多次的會議，在這會議上總想利用這一點來恢復俄土的衝突；討伐君士坦丁堡這問題在當時已經是很實際的了，并已確實的決定那師軍隊派出去，在什麼地方上船，多少時間等等，除了這個提案之外還有一個補充提案，這補充提案是當時我們的海軍官佐所做的，其目的在宣戰之前毀滅土耳其一切的軍隊，土耳其是有遠見的人民，他亦準備了而且得到了兩隻大的鐵甲艦。當時俄國在黑海中還沒有一只鐵甲艦，我們的鐵甲艦正在製造之中，而土耳其却已經有了兩隻了。俄國乃開始急急的起來購買外國造船廠中所造好了的鐵甲艦，買到四隻，但是怎樣到黑海中去呢？按一八四一年的和約，海峽不准軍艦通行，所以這鐵甲艦是走不進黑海的，他們應該集中在地中海以便搗亂土耳其之後方。但是他不能直接幫助黑海艦隊，假如要他能夠助黑海艦隊，則

必須佔領海峽，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以後英法在一九一五年的經驗就證明了這點。這裏在俄國海軍人員的腦袋中就產生了一個大計劃——利用最新的技術，在西伐斯得堡建設一個俄國水上飛機站，同時俄國在君士坦丁堡的海軍偵探應該小心的注意土耳其的兩個軍艦的行動，因為，整個的馬拉馬爾海及海峽便分成許多的方塊，（大約有一百方塊，）每塊有一號嗎，而君士坦丁堡俄公使館在不克地爾的無線電站應該不斷的報告西伐斯得堡把土耳其鐵甲艦所在地的號數，報告到西伐斯得堡去。譬如五號，土耳其軍隊就在五號一塊內，十七號則在十七號內，二十三號則在二十三號內等等。

普通在斷絕外交關係與宣戰之間至少亦有數小時之久，因為公使館要收拾行李與起身等等，在這時候，軍事運動是沒有的。

同時在這外交斷絕之時，不克地爾的無線電站，就可以無線電通知西伐斯得堡以土耳其軍艦所在地之號碼。俄國的水上飛機可以帶了一定的數量的炸彈從西伐斯得堡飛出去，投擲在這兩個軍艦上。這樣，戰爭還沒開始，土耳其還不能有什麼準備，就可把他的鐵甲艦炸毀了。但是可沒有實現，因為在我們這樣技術落後的狀況下，這個計劃是否能順利的執行是成

問題的。大概飛艦所飛去的地方不是他所應去的，炸彈則擲到不是他所應擲的地方去了。這計劃除了羞恥之外，什麼都沒有。然而這計劃的本身從外交的觀點上看去，却是很有趣的。試看我們以前怎樣的怒罵日本人之無恥，日本人之進攻旅順海口，陰狠的進攻等等，後來我們自己亦學會了，我們並不是馱子呢？我們完全依照日本人進攻旅順口的方法，甚至還更利害的，去消滅土耳其的軍艦，這個計劃的特點，即他表示出了俄皇政府爲着海峽問題，籌謀得何等深遠周到。實際上，俄國後來並沒有舉行單獨的東方戰爭，因爲他同時陷入世界大戰的漩渦之中了。

英國政府在一九〇八年曾遣自己的公使暗示俄皇侵畧海峽英國決不干涉。然英國政府對於俄國奪取君士坦丁堡的苦心却好好的利用了。

英國政策的變更其主要的原因我們已經看到了。請讓我再詳細的說明，爲什麼英國這樣善意許俄國去侵畧海峽。在韃靼到地中海去的口子上有四個小島，替納多斯、依伯羅斯、立姆拿斯與薩膜弗拉克斯等這些名字，你們當然不會知道，而白黨却很熟悉，因爲他們坐在那島上的英國的衛戍營中。這些島在英國人手裏，在舊的砲術之下，這些海島在韃靼海峽口十

五俄里以外他們是毫無危險的，因為舊的大砲最遠只能射四俄里，但自射十五俄里以上的新大砲出現以後情勢就完全不同了。這些島上的英國砲台很容易封鎖韃靼海峽之出路。俄艦將無能爲力。俄國在黑海之外又得了幾道溝渠，但是他在這些溝渠中航行是可以的。然而沒有英國人之允准他就不能出這溝渠一步，因此英國深謀遠慮的佔了這些島嶼，因為從戰略上觀察，則問題不在韃靼海峽而在這些島嶼上，因為如果誰佔了這些島嶼，誰有現代的技術，誰有大砲，那韃靼海峽便在他的手中了。因之英國能夠這樣靜靜的對俄國說：巴斯福爾、韃靼海峽給你吧，但是那些島嶼則又當作別論。

英國對於俄國侵略海峽的軍事行動似乎是很安靜的，同時他又想使俄國加入他的聯盟，使她也能出力去包圍德國。德國是英國自在十九世紀末起所日夜懸念不安的。我現在沒有可能向你們解釋英國企圖包圍德國及企圖英德戰爭的原因，在我論外交政策的論文中，你們可以看到我對於這些原因之解釋。

無論如何在這個環境之下，英俄同盟在俄國方面，是逐漸成爲不可避免的了。一九一四年五月已經在進行英俄海軍協約的談判。而俄國則分外的積極，格外的熱心。積極的想參加

這個海軍同。在一九一四年五月，俄國海軍總長已提出集中英國商業於波羅的海以便轉運俄軍到保米郎尼亞去的問題。保米郎尼亞是普魯士之一省，在柏林的北沿波羅的海岸。俄國公使皮金杜路夫的確曾經勸告他們不要說保米郎尼亞，因為英國人是頑強的民族不愛急噪的。俄國的海軍人員亦不會多說關於在保米郎尼亞上岸的事。但是非常有趣的，在一九一四年五月，誰都料想不到德國會進攻俄國的時候，俄政府却預計到怎樣取得輪船來抵抗德人。同時同年，法國駐俄大使報告自己的政府，他與一個俄國內閣要人談話（名字沒有說），所談的正是瓜分奧國。在這次談話中，那位內閣要人，所表現的希望，並不是年近八十歲的奧皇佛郎士·約瑟夫快要死亡的危險，而是將來的奧國究竟怎樣處置問題。我們知道每個皇帝都要死的，皇帝死了，皇儲可以繼位；奧皇亦有皇儲，那有什麼問題呢？為什麼內閣中的要人對於奧國將來的問題這樣苦心焦慮呢？那是很自然的，奧皇死了之後奧國的一部份（即加利村及巴加文兩處）就應該歸屬俄國了。這個內閣要人舉了許多理由，歷史的、經濟的，甚至宗教的理由：那裏是正教派，俄國人亦是正教派；他們所通行的語言是俄國所禁止的烏克蘭語，這一些理由，無非是要把這兩省歸併於俄。這亦是在一九一四年五月。當時德國駐英公

使利哈諾夫斯基稍有所聞，便質問當時英國的外交總長葛雷道，你們與俄國關於海峽的問題訂了些什麼條約，他便瞪着眼兒很真摯的說；任何關於海峽的條約，自拿破崙戰爭之後幾乎完全不會有過——真的，談判並不是關於海峽而是關於波羅的海與西米郎尼亞的問題……同時則致電彼得堡：『這顯然是算處空談過甚之故』。自塞爾維亞的審判的黑幕揭破以後，暗殺菲遮南事件的曲折於更加複雜。菲遮南是法郎士約瑟夫的皇子，菲遮南被刺後，因為這個，奧大利於是有充分的理由給塞爾維亞一個最後的通牒，塞爾維亞回答道願意聽從，但不能如奧大利亞所要求的一樣，戰爭便是從此開始了。

佛郎士·菲遮南的死在好戰者看來是一個非常之機會，因此在那些『宗教傳說』派的人看來（他們以為戰爭是由德奧互相約定而開始的）這個問題是很難解決的了。他們只得說：威廉爲要作戰起見，特別殺了自己的好友（菲遮南確是威廉的好友）。這是極少真確性的，不久之前，當時塞爾維亞的偵探長地的得利雅奇大佐對於這件事情的解釋，確是於一線光明。在一九一四年五月，這月比一九一四年七月（即宣戰之月）更要多時，在皮爾加達得到由俄總參謀部送到塞爾維亞總參謀部的一個密報，說威廉與菲遮南在加拿華樹德會面之後，

決定在最近時間內進攻塞爾維亞。提議者爲菲遮南，他之到波斯尼亞表面上雖爲閱兵，實際則是準備進攻塞爾維亞，閱兵本身亦即是集中軍隊於塞爾維亞邊境之掩飾。得到此項消息之後塞爾維亞總參謀部慌急起來了。怎麼辦呢？因之就產生了暗殺佛郎士·菲遮南的計劃，用以破壞他的攻擊，以便取得一些時間求援於俄國。在塞爾維亞熱烈的青年民族主義者之中自然不難找到一個人，派至沙拉奇伏去刺菲遮南，以後的事變就入正軌了。菲遮南與威廉是否準備進攻塞爾維亞呢，這是不很明瞭，但無論如何俄國總參謀手中所需要的，就是一個能夠挑起戰爭的事實，如塞爾維亞人在奧大利境內殺死奧大利的皇子這類的打擊，奧大利是不會承受的。而且在全世界任何強國亦決不能忍受的。當然，奧大利要給塞爾維亞以哀的美頓書了。

暗殺佛郎士·菲遮南，是俄國總參謀部所教唆的，這是很明顯的。因此對於誰先開戰的問題的答覆也是很簡單的了。很明顯的，在奧大利的最後通牒之前兩天，法國駐俄公使巴阿立樂與黑山國公主們已經有一次很有趣味的談話，這公主之一就是後來俄國總司令「大」尼古拉·尼古拉衣維奇之妻名安娜斯丁雪·尼古拉娜，這時法國大總統普恩開雷剛到彼得格勒，

這『黑山婦』說：『你們知道麼？我們正處在一個歷史的神聖的時代呢，明天在檢閱時所奏的只有法國的行軍曲，羅倫行軍曲與復仇行軍曲（即與德國爭阿爾色斯，羅倫）我今天得到父親的密電，他告訴我到月底必有戰爭了。』

這在奧大利最後通牒之前兩日，誰都不知道，奧大利通牒內容是什麼，而著名的黑山國的俠爵尼古拉（他使用技巧的手段同時得到俄奧雙方的津貼）已經知道了月底將有戰事。

請讓我以這小小的逸話來結束這引起戰爭的外交衝突罷。你們知道，假如要找直接的罪人，可以不用在柏林甚至倫敦找，應該在彼得格勒找。尼古拉第二便是斷送千百萬人命於世界大戰中的首魁。

你們也許要問：這僅是政治方面，狹義的政治方面罷了，這些政策有沒有『經濟的基礎』呢？俄國爲什麼要參加一九一四年的戰爭，這是很明白的。俄國爲什麼要和日本一樣，不站在德國方面，而站在德國的敵人英法方面呢？這是否僅僅是英法外交手腕所造成的呢？抑或是另有什麼其他的客觀條件推動他到那方面去的呢？

在上面所說過的列寧著的『俄國銀行與外資』一書中曾有一些回答，『紅色文庫』所搜

輯與準備發表的許多文件亦可做個補充。首先要注意：俄國帝國主義，這句話用之於一九〇五年以前是不正確的，不對的，而在一九〇七年與一九一四年間已經是真實的東西了，無論如何，是可以說的了。俄國的銀行資本之偉大的發展，及銀行資本對俄國工業的統治，這便是帝國主義的表現。在一九〇九年一月一日銀行所有的基金共二萬二千一百萬盧布，而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則為八萬三千六百萬盧布，五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六。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二年間俄國之銀行基金增加了百分之三五〇。德國則僅二百六十，俄國銀行資本發展速於德國。同時在銀行手裏集中了百分之八六的工業。』

銀行管理俄國的資本。——以存款的形式而來的，在銀行中集中了一切由俄國麥類交換得來之大批金錢。

自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四年存款從九萬七千六百萬增至二十五萬三千五百萬盧布，增加了百分之六〇。但是銀行本身却不在俄國人手裏。大部分的股票（百分之四〇至百分之六〇）在外國人手裏，使外國銀行成爲俄國的指揮者，而俄國之工業亦在指揮之下。我們應該知道，在每次企業的股東大會上股東決不會全體到會的，普通到了百分之二五至三〇，有時候

還少些，因此只要百分之四〇或百分之二五的股票，就可以指揮該企業了。俄國銀行真是傀儡一樣。在柏林與巴黎抽線的時候，他便舞蹈起來了。俄國的銀行一擺動，俄國的工業也跟着他舞蹈起來了。『紅色文庫』有一件準備發表的文件（這是法庭的文件，因為這是『秘密』寫下來的，但是他與別的祕密文件不同，他非但不怕法庭與警察而且他們還怕牠）證明在一九一四年前頓河流域煤礦被法國人所管理。列甯說：

『俄國在戰前共有四十六家獨立商業銀行，兩個大的財團，總的管理在外國財政資本手裏。其他一切「小的」銀行比重是很少的，除了莫斯科幾個及彼得格勒一個銀行之外，這些銀行的力量可說等於零。』

再補充一點，這外國財政資本是從兩方來的：俄國的銀行一派接近巴黎，別一派則接近柏林，兩派不斷的爲勢力而爭鬥，而在這個爭鬥中顯然是法國得了勝利，且數量很少的英國資本（以前完全沒有）現在亦與法國聯合起來了。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中，俄新銀行的股票百分之八一·五，消售於德國，法國只有百分之一五·五，英國的財政資本在這幾年中完全沒有。又在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二年間，俄國新銀行股票在德國消售只有百分之三八·

八，而法國則有百分之五六·八，英國共百分之四·四，這是英國資本在俄國的第一次。在戰前，倫敦巴黎已把柏林從俄國財政資本的圍籠中趕了出去，故束縛俄國的外資正是協約國的資本，這種束縛到一九一七年克倫斯基時代為最甚。這還在五年前就已經表顯出來了。外國在少數股票的助力之下完全統治俄國的市場——而且能夠迫着自己的『奴隸』去做一切，資本主義的俄國要從戰爭中挽救出來早已不可能了，只有經過社會主義的革命，俄國才能從戰爭中逃了出來。

第九講

我對於立憲民主黨曾加以分析，說他是俄國資產階級極左派。你們還記得，這個極左派本身大多數是由著名的知識份子、大學教授、名醫、技師等等組織而成。他是與俄國當時大的（銀行的）資本有密切的關連。至於右於立憲民主黨的資產階級的政黨，第一便是那莫斯科紡織工廠主的進步黨。次之則爲十月黨。該黨一方面代表高利借貸資本，另一方面則代表重工業。至更右的政黨，那無容去說他了。

很明顯，戰爭牽動着俄國資本主義整個的（工業與商業的）切身利益，所以各黨派對於

戰爭都有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就成爲資產階級的社會輿論。只有立憲民主黨，動搖了一分鐘，這也許他們想到以前曾希望左派幫助的原因。這真正只有一秒鐘。當右派攻擊立憲民主黨及恐嚇他要封閉『言論』報的時候，立憲民主黨亦同音合拍地奏唱起來了。一切資產階級的出版物都是同調的、友善的、同一方向的工作者。我永遠不能忘掉我流亡巴黎時，俄國寄來的報紙所給我的感想。在我一生中其厭惡無甚於此者。這種感想覺得是一種天天加甚的道德上的厭惡的感覺。而在我的國際主義之下，有時我甚至希望德國趕快打勝，讓他來清除俄國資產階級報紙上的一切醜態。這是真正的卑鄙齷齪，因爲這裏我們會發現有與巴黎警察廳有關係的份子參加在內。著名的勃魯脫——皮洛夫是『俄羅斯輿論』的通訊員，是報紙上愛國主義的主要的傳播者之一。我們在巴黎警察廳案中找得到了勃魯爾給巴黎警察廳的一封信，要求爲巴黎警察廳効勞——這請求沒有接受，巴黎警察廳決定不收買勃魯脫，大約因爲他不怎樣努力。這人出賣未成，這就是掌握當時俄國社會輿論的人物！這裏自然形式上廉直的人米留可夫，但是他在政治上則不甚正直。他們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與他人同音合唱。他們也許稍好一些，但亦叫着『萬歲』，唱着『天佑沙皇』。他們欺瞞廣大的讀資產階級的報紙

的羣衆，使羣衆蠢信着資產階級報紙上說的是真話。這樣人至今還是很多，很多人還想，資產階級的報紙能夠（不僅想，而且能夠）說真話，後來在戰時我在比較俄國報紙還要好一點的外國報紙上找得許多謊誕無稽的統計（如德軍之人數等等），簡直就是信口造謠。但我們可憐的資產階級，可憐的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竟會完全信任這報紙上所寫的東西。

試看俄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在此種社會輿論的影響之下，究竟幹了些什麼樣的把戲，我要讀一段很長的摘錄，這是很有興味的，這是從當時俄國報紙上摘來的：『莫斯科十月九日（一九一四年）上午十二時，在莫斯科大學新校舍，於加勃魯可夫教授講演之後，曾有學生露天大會通過學生對於號召學生從軍令必要表示態的度決議。兩時左右在莫斯科大學新校舍一號教室，大學教授在自己的講演中說明他對歐洲與俄國目前所發生的事變的觀點，同時并談到國務院號召學生從軍的命令。當時有一學生——『K……』（不知道爲什麼資產階級報紙把真姓名隱藏了，這樣好的愛國之舉，然而還只有『K』兩字。）『……站了起來并且演說道，學生們都是很狂熱的歡迎號召他們保護祖國的命令，學生們將勇敢赴敵。』到會學生遵

照演講者提議，高唱『永久不忘』之歌，全體上操場操排隊出發，口唱『天佑沙皇』與『上帝救世』歌，學生手中高舉着沙皇與皇后的像片，口唱國歌，在熱鬧的街市中遊行之後到市政府去，莫斯科市長阿得利亞諾夫將軍站在露台之上，與國歌完了之後，一個學生向市長致詞說：『市長大人，讀了政府號召高等學校學生從軍的命令之後，各大學學生謹一致以愛國之熱忱請大人將我輩效忠祖國及準備從軍之誠心，轉告於吾主萬歲之前。學生們願與我軍同時長驅擊破強敵，並望我們與德人作戰時，不在華沙附近，而在柏林城下。』莫斯科市長阿得利亞諾夫將軍回答道：『我今日即以爾等效忠祖國之熱心及希望入軍之熱忱轉達皇上，我們共同的希望，我軍及爾等均為佔領柏林之英雄。』阿得利亞諾夫之演說為狂熱的呼聲所掩『萬歲！萬歲！到柏林去！上柏林去！』

這次示威遊行不是唯一的一次，莫斯科大學學生示威之後，有交通專門學校學生之示威，以後則有商業專門學校（即現在之馬克思學校）之示威，最奇特便是學生羣衆在紅場（就是現在我們開慶祝大會的地方）歡迎薩爾維亞貴族哈衣爾的時候，『學生們在貴族米哈依爾的前面祝頌英雄的薩爾維亞，貴族米哈依爾感謝之注意與厚愛。』當時報紙上雖沒有這寫

着；但他們彼此祝福，那確實是有的。這樣一來莫斯科便充滿了令人憎惡的青年示威運動，這許多青年并且還真實的以爲他們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因爲他們受了當時資產階級報紙上的謠言的迷惑，當時工人的報紙還沒有。

非常顯明的，一般資產階級的老輩在初時，較之那些青年，那些讀報讀到俄軍前進，俄術遠勝於德國等等消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當然要穩重得多。小資產階級羣衆永遠要比那些老成持重的人來得狂暴。當時那些老成慎重的人穩健的輕度竟被人罵爲賣國賊，如廠主願便是一個好例，願便是一個雙料的愛國主義者；他是俄國的工廠主，又是法國人，而俄法兩國，戰爭中都是站在一方面的。大資產階級在初期還穩健得多，大學教授雖然亦贈效祖國的禮品給尼古拉，但是這已經是開戰第二年的事了。誠然是比青年要落後一點。不過剛愎不馴的人，在學生中也是有的。沙若夫大學，及少數莫斯科大學的學生，曾經反對過這種示威，有封很好的抗議書，甚至在『俄羅斯指南』上登載過，我之所以提起這點，就是要你們不要以爲在當時整過的學生羣衆中連一個明白的人都沒有。重複一句，這許多讀報青年，小資產階級的青年與愛國心之表露，較之大資產階級要早得多。大資產階級之走上愛國

主義的道路却是緩緩的，只有當他們明白了解戰爭對於工廠的利益之後，在他們明瞭戰爭本身是大市場的時候，才會走上愛國主義的道路，戰爭是一個極大的市場，戰爭的時期雖短，但這短期中的利益有等於數年之所獲。

試看開戰後第一年各工廠的利潤罷，土耳其工廠戰前每年平均利潤為一百八十六萬盧布，在開戰之第一年則為八百三十九萬盧布，加爾鐵廠戰前利潤為二百十七萬盧布，開戰後第一年則為四百七十二萬盧布，沙爾莫夫廠戰前利潤亦為二百十七萬盧布，在開戰後之第一年則為三百七十九萬盧布；在加皮兒廠戰前為一百四十萬，開戰後第一年為三百三十四萬。很明顯的，在這情況之下，新的工廠新興的股份公司將如雨後春筍之怒發，在一九一五年中共創設了一百三十六個股份公司計資本一萬八千九百萬盧布，在一九一六年至十月一日止，共創設了一百五十九個公司計資本二萬一千萬。這些資本究竟怎樣分配的呢？下面有一個關於一九一六年所設立的股份公司的表，在這表上，有新創立的分司，亦有資本增加的舊公司。如以紡織工業為例，則新公司僅三個，增加資本的舊公司只有十二個，資本的比例如下：新公司的資本為二百六十萬，舊公司所增加的資本為三千一百萬。試以五金工業為例，則新工廠為

十七，增加資本的舊工廠則爲二十一。新工廠的資本二千五百五十萬，舊工廠所增加的資本爲三千八百五十萬，較之紡織工業多得多了。其次則爲與五金工業有連關之礦業，新的工廠二十個，資本增加的舊工廠二十三個。新工廠的資本四千五百萬，舊工廠所增加的資本爲六千三百萬。最後爲準備一切爆發物之化學工業，新的七個，增加資本者十個，新工廠的資本爲一千四百四十萬，舊工廠增加資本六百萬，你看廣大羣衆所需要的消費品在戰爭中得到最少，但也是獲利的，因爲兵士不僅需要鎗械、炮彈……等等，而且亦需要穿衣服，監督處預備了大批的棉織品，至一九一八年春，莫斯科蘇維埃慎重地討論了是否要把這些紡織品推行到民間去的問題，因爲當時工業品恐慌，人民多年赤身裸體無衣可穿。而莫斯科的監督處堆棧中却還存有一千萬俄尺棉織品——一個極大的數量。以後這些棉織品都供給了紅軍，且用了很久。紡織工業在戰爭的影響之下發展較小，五金、鑛業、化學工業則大盛。俄國工業的一般地生產力增加了。試以一九一三年爲標準，一九一三年生產品的總值爲五十六萬二千萬盧布，二年之後，在一九一五年已經六十二萬五千萬，而一九一六年則爲六十八萬三千一百萬了。

俄國資產階級所得的利益，並不是單從戰爭本身得來，且還從俄軍失敗得來，這一點，對於估計一切愛國情緒，是很有興趣的，在戰爭政治史上，也很值得加以指明。這是極有趣的一點。我們的五金工業，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月不但無發展且即停滯了，這亦可拿彼得堡工人數量來證明。在一九一四年三月彼得堡的工人計二十萬八千人而一九一四年九月則僅有十九萬七千三百人，工人都應募從軍去了，而對於工廠都沒有多大妨害，因為工作很平靜的。我們的炮務局（其局長為羅曼諾夫族人）確信我們，那時戰爭的準備是很充分的，而『聰明』人都是以爲戰爭的時間極短，在兩三個月之內，我們一定可以把德國打得粉碎，縱使打不碎的話，到了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時德國就要餓死了，因為他們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把最後的一塊麵包都吃完。因之炮務局準備了比日俄戰爭多三倍以上之炮彈，總以爲對於戰爭之需要完全充足了。所以當時有些最蠢的私人製造所向陸軍部請求包辦子彈，而以大貴族西爾孟·米哈依羅維奇爲首領的炮務局則回答道：『還沒感覺得流霰彈之缺少』。當鎗炮開始射擊之後，才知道我們的炮務局估計太樂觀了。在八月之末，我們大炮中所放射的炮彈，已經是第三次儲藏品了，在當時陸軍總參謀部長耶奴書開維奇給陸軍總長沙火米利諾

夫的信中便已有炮彈不足之虞。我們的大炮不得已只有少開火，然而這對於軍隊却有莫大的影響，你們讀一讀這封通訊，就可知當時缺乏子彈的悲聲是與日俱增的。因此迫得沙火米利諾夫走出了他的溫暖的辦公室，奔波於各工廠主之前，請求他們急造子彈。

俄國軍隊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冬起所受子彈及火藥的恐慌，是一九一五年夏俄軍潰敗的主要原因，因為在德國三千發射擊時，我們只能回以數百發。這情形不但繁盛了我們的工業經濟，而且還增加了他們在政治的比重。炮務局把炮不足這點秘密隱藏了很久。米留可夫說：他似乎在一九一五年才第一次聽見這個砲彈是恐慌，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我上面已經說過，耶奴書開維奇與沙火米利諾夫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末已經在書翰中寫到了這點。無論如何，巴黎至遲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時，他已經知道了（同時，在巴黎的僑民亦知道了），因為那時正是俄國的軍事代表帶了俄軍在戰線上狼狽不堪的消息到巴黎去的日子。從法國派了專門技師到俄國來指導俄國的兵工廠，發達俄國的化學工業到必要的程度等等，俄國關於這一點在十一月間也知道了。當一九一五年五月麥更靜開始進攻，這裏已無從掩飾，只有在世界前承認，我們只以百尊大炮去抵抗德國三千尊大炮，在這種條件之下，非但不能進攻，而且

不能堅守。俄軍開始從蓋利村後退了，被虜了三百萬俘虜，失了濠溝等等，俄軍潰敗了，俄軍完全潰敗了。若以日俄戰爭中的奉天之役來與一九一五年戰綫上的潰敗相比，奉天之役只能算是一場小戰。這是不能掩飾的。一九一五年夏在彼得堡舉行了國防會議，有廠主工業家及國會議員等等之參加，當然這裏也有政府指派的官僚，然而大多數則為專門家、博學之徒。自一九一五年中起，俄國之工業資產階級，自一九〇七年羣衆運動失敗後，被打擊了的工業資產階級又捲土重來了。他們實際上是當時的主人，後方的主人，軍隊供養的主人，因為這時候，軍隊的供養是一切的基礎。

路得象哥在其回憶錄中說：在特別會議舉行後不久，前線上已經充滿了子彈。同時工人親在子彈上刻着『請勿顯惜子彈』的字樣。這一點是否正確，現在無從知悉。這裏曾經向外國去定貨，由外國運到大量的子彈；在外國及俄國工業之間會有一定的分工。就是要用大量的子彈作進攻時由外國工廠供給，日常的需要，自利加至巴古的戰綫上的防禦品，則由俄國工廠供給。俄國工廠怎樣的供給，其數目字我上面已經說過。這樣一來，一九一五年夏資產階級實際上已是軍事經濟的主人翁與領導的力量了。這就是一九一五年夏天的事實，從政治

的觀點看來，所以沒有多大的意義的緣故，尼古拉第二解除尼古拉·尼古拉依維奇的總司令之職，因為他是戰敗的罪魁（老實說，他並不會比其他的大貴族的罪來得大），俄國在實際上因之便成了拉斯普丁的專制，因為尼古拉是他妻子手中的玩物，而她呢，則直接的說，她為拉斯普丁所指揮，她解釋這一點的，當然是很神祕的。事實是這樣，拉斯普丁指揮她，而她則指揮尼古拉，話雖然如此，實際上戰爭的經濟命脈却握在資產階級的手中，所以她才能與拉斯普丁的統治周旋了許久。只在經過一年之後，她才開始驅逐他們，才開始革命的運動，即我在下講中所要講的二月革命。

你們記得，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資產階級想依賴羣衆。很可注意的，這種聯盟在一九一五年又重複了一下。資產階級又想依賴羣衆了，因此我們必須要費幾分鐘來說一說大戰數年中羣衆運動的狀況。

我不詳細的說明這時代的工人運動，因為你們也許已經在（或者將來要在）黨史的演講中聽到過了。我這裏所要說的就是工人運動，自一九一一年，特別從一九一二年四月（從林那事變起）已有偉大的發展了。一九一〇年共罷工二百二十二次，罷工人數四萬六千，一九

一二年罷工四百二十二次，罷工人數二十五萬六千，一九一二年罷工二千一百四十二次，罷工人數七十五萬，一九一三年罷工二千一百四十二次，罷工人數八十六萬一千，四年中罷工人數增加了二十倍。你們看，工人運動怎樣地發展呵！至一九一四年夏天工人運動又達到了高點，一九一四年五一罷工者百萬以上。這是一九〇五年以來未有的現象。當讀到資產階級的報紙關於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各處的事件的輕描淡寫的電報時，就不禁使我們（海外僑民）回憶到一九〇五年。特別是彼得堡，一九一四年夏簡直完全回復到一九〇五年的形式，在熱度上形式上等等都感覺到真正革命的爆發，一九一四年時，即我們中最悲觀的人亦覺得二次革命不遠了；他已不像我們在第一次革命失敗後所猜度的那樣遙遠。

這一點，不僅我們知道，而敵人方面也看到了，這就是俄國資產階級之所以在握取戰時經濟之後，日夜懸心於吸引工人羣衆到自己方面去的緣故。資產階級所發起的軍事工業委員會要叫工人代表參加此委員會。我黨當時，却曾堅決地反對工人代表參加此委員會，我們指明，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對無產階級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事。這一部份工作只在最先進的無產階級中，彼得堡的無產階級中，做得有點成效，然也不是盡善盡美。在彼得堡，很早很早就

有進行反戰爭的煽動，而在尾波爾斯基區則在戰爭剛宣之後，尙在國會召集之前就已經發表了反戰爭的宣言，隨後我黨彼得堡委員會也跟着發表了宣言，但彼得堡雖有此種煽動，然而也只能以比較的多數（九一反對八〇）通過拒絕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決議，莫斯科的無產階級並沒有鼓動起來，因之，他們便參加了軍事工業委員會。資產階級不願工黨的意志如何，居然把他在一九〇五年所幻想的那種聯盟實現起來。（這種聯盟也可以說是經過工黨的屍體而實現的。因工黨在國會中的黨團已經被捕，并須準備就刑。）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後，對專制政府及工人階級的關係，彷彿是得了復仇的勝利，現在我要講一講這復仇的時候是如何短促。

就在這次上，資產階級失算了。爲要了解爲什麼會產生這類的事變，那我們就必須從另一方面來觀察戰爭的經濟。我們剛才已經看到戰爭給俄國工業一種半肥的食料。但是這和一切的刺激物一樣，他能夠暫時的興奮人的機體，但同時却又破壞了、損害了這個機體的基礎。我們現在要轉過來觀察這一方面，第一點，就是戰爭的組織者是極少遠見的人——沒有看見看到戰爭對於運輸的影響。這點我應加以極大的注意。因爲他是一切東西的基礎，特別

是在俄國。俄國幅員廣大鐵路稀少，運輸的忙碌，實較他處爲多。

如果我們從這方面來觀察戰爭的影響與戰時的經濟，則情況如下：戰爭使得運輸工作增加到極大的範圍，因爲任何大的軍事動作必然地要調移軍隊。實際上，這時候的戰爭不僅在俄國的戰線上，就在任何戰線都是一樣，是一種鐵道的遊戲，而德國之用鐵道正是無上好手。因爲德國之鐵道比俄國發展得多，故在緊急之時，軍旅之增加有使敵人覺得草木皆兵之概。在二三天之內，就可以把幾百里內的軍隊完全調動就緒了。鐵道是現代戰術必要之一部，但是這需要極大的運輸工具及燃料等等的支出，這就是說鐵路要比平時多做無限的工作。若以火車所走的道路來計，則一九一三年爲一·九（以十萬萬爲單位）鐵道里；而一九一四年，開戰後第一年，同時不是全年而僅半年已爲二·二，一九一五年爲二·五，一九一六年爲三十萬萬以上。因此，這便增加到一倍半以上，這就是戰爭對運輸的第一個影響，運輸不得已只有加緊工作。當然，車箱之裝載量，亦不隨之而增加，在一九一三年每天的貨車爲——五八、〇〇〇輛，一九一四年爲四三、五〇〇輛，一九一五年爲七一、〇〇〇輛，一九一六年爲九一、五〇〇輛。當然，車輛每日夜所走的亦照此比例而增加，在一九一三年平

均每日夜所走的路——三六八、〇〇〇鐵道里，一九一四年則爲四一二、〇〇〇，在一九一五年六三〇、〇〇〇，在一九一六年至八〇〇、〇〇〇鐵道里。這樣一來，交通的工作就緊得多了。很自然的，在這種狀況之下，供給運輸的工業亦要發達至同樣的程度，但是這裏情況則完全不同。無論如何，在戰爭中最重要的是炮彈。故以前那些供給交通用的機器製造廠，現在都去準備炮彈去了。結果是這樣：沙爾莫夫廠的機關車的製造，一九一三年爲一百七十，一九一四年爲一百〇七，一九一五年一百十，稍爲多了一點，一九一六年只有六十四了，一九一七年却只有五十五了。（註）

供給運輸的工業，修理車箱、製造及修理機關車等等完全減了，同時運輸的工作，却大爲增加。此外，機器製造業，並且還要把價值三萬萬元的器具交給軍事當局——這大批的機器，以前大部份是供運輸工業之用，現在則去準備大炮與炮彈去了，這當然要使鐵道的運動感受極大的困難。

如以一九一三年每年所運貨物之平均數爲一〇〇，則一九一四年七月所運的糧食僅等一九一三年之七二%，八月只三五%，九月四七%，十月五八%，十一月五八%，在鐵道上糧

食的輸運永遠沒有達到和平的時期的水平線，永遠在他的六〇%以下，這就是運輸破壞對於人民直接供給的影響的好例。其結果則價格必然的增加，而且出人意外地迅速的增加了。試以莫斯科市場上牛肉之價格而言：（我不舉絕對的數目了，以便不使你們困難，僅以百分數來看）若以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之價格爲一〇〇，那末二月三日爲一一九，二月五日爲一四四，不到一月，價格漲了一倍半。這就是戰爭對物價的影響。蛋的價格從一九一四年四月至一九一五年四月增加六一 $\frac{1}{2}$ %，糖的價格一九一四年九月每普特五盧布五哥比，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爲五盧布四十哥比，一九一五年五月爲六盧布四十哥比，糖的價格每月增漲。我所引的還是批發價格，零售的價格其增加更大。零售商人也是一樣總想儘量的抬價格，因爲他賣了這批貨物之後，買進了第二批貨物時，價格已經漲了許多了。麵包的價格，最主要的食品的價格如下：一九一四年七月麵包的價格一盧布十五哥比，十一月一盧布十五哥比（這是受新收的影響），一九一五年七月一盧布四十三哥比，八月一盧布四十八哥比。九月一盧布六十四哥比。在一九一五年則甚至連收付價格亦無影響了，九月中還繼續增長。運輸的混亂，糧食裝載之縮減，其影響於城市供給，一至於此。

因此首先便減少了城市中的麵粉的供給，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列寧格勒麵粉的供給只有常時百分之九一，而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則只有百分之四七，在一九一七年正月用了種種方法才達到百分之五七。現在且舉一個拉斯普丁的聰明與熟練的例子來說一說，拉斯普丁確實預見了這一點，并想設法加以防止。在尼古拉的妻子給尼古拉的信上說：拉斯普丁怎樣的終夜皇皇，口中不絕的囁語，車站、火車、罷工，而其結果則有所謂『糧食週』的命令，就是說在一星期之中某幾條路上專運糧食，這是一九一五年。在一九一五年時拉斯普丁便已經見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滑倒羅曼諾夫朝的西瓜皮了。自然，這許多事情必然要影響到工人羣衆之心理。你們還記得，在戰爭的『夏天』（雖然這個春天在九月中）學生對師長阿得利亞諾夫談話的口吻。在一年之後，甚至還不到一年，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工人便對副市長說：『在彼得烏勃來盛斯基市場上，爲了物價高貴的緣故集了一大羣婦女，當馬得爾先生嚴厲的對她們說話時，高漲的情緒立刻就遷到警察身上去了，一個女子以石擊之，他並被羣衆由汽車中拉出來，擁至河邊，同時馬得爾先生還不斷的要求：『姊妹們！請赦宥我對你們的行動』……等等，爲了這件事情召了些軍隊來，但是婦女們很大膽走到兵士前面高叫道：『難道你們沒

有妻子麼，她們的生活同我們一樣的難堪呵！槍殺我們，就是槍殺你們的妻子。」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不列斯，格魯精在那裏有一個鋪子賣了牛乳給這人，而不賣給別人，結果把他家的玻璃都打了。

在一九一五年春工人羣衆的心理，在戰事經濟的反面的影響之下頗爲憤激。因爲這些羣衆雖在當時極端秘密的情況之下，已爲布爾塞維克所組織起來了，所以常表現着有組織的行動，這是一種對政府非常危險的形式。當時的秘密秘到何等程度，我可用一個事實來說明，即彼得堡委員會常在小池中開會，在彼得堡附近有很多的小池，這是唯一毫無危險的地方，在一九一五年末我們已經直接在戰線得到大的進步了。這就是鐵甲艦「剛古特」上著名的歷史，那裏準備真正的海軍暴動被政府發覺了。二個海軍被槍斃，其他的人移交法庭，以後並牽涉到革命的組織。這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被捕的，到一九一六年秋開審。很可以注意的，這時候羣衆的情緒高漲到這種程度，政府簡直不敢槍斃一個人，雖然在軍艦上準備暴動，從軍法觀點看來，本是極重大之罪犯，應該立刻處以死刑的，但是沒有槍斃一個，就是對海軍一度之審判，便引起了彼得堡十三萬人的罷工的緣故，如果再槍斃他們，那麼像十月罷工

時那的情景；便一定要爆發了。因此政府是退讓了。在資產階級的報紙上預先宣傳不會槍殺之消息。保護海軍的律師沙可洛夫說道：照法律一〇一與一〇二兩條他們本是槍決的，但是所以讓步則正是因羣衆革命情緒高漲之故。故在一九一五年時在工人羣衆中確已發現了一定的革命的情緒，有組織的表現是海軍暴動，無組織的表現便是我上面所說過的許多紛擾。

這戰時經濟的反面自然要防礙資產階級的政策之進行。資產階級採用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政策，起初做佛似有些成效，但現在却完全坍台了。至一九一六年秋，緊張竟達到了這樣的程度甚至社會民主黨內的保護祖國派的報紙也開始說，要設法停止戰爭，須預先消滅專制政府。一九一七年正月社會民主黨所散發之傳單已號召人民自己起來停止戰爭，因為沙皇專制政府是不能停止戰爭的，這種情緒連保護祖國派也是一樣，這是我們必須指明出來的。因為他們不敢堅決地暴動起來反對戰爭，所以他們便走上了革命的保護祖國的軌上去了。

自一九一六年秋天起軍事工業委員會內工人團的記事錄上，關於工人情緒的消息，很值得我們注意：「從十月初起在彼得堡盛傳着在莫斯科，哈爾可夫及其各省城的非常事變的謠言，從幾個城中來的私人信件中常問：「彼得格勒產生了些什麼事變？」實際彼得格勒什麼

都沒有產生，在彼得格勒工人羣衆中討論着極重要的問題：「關於莫斯科有什麼消息？」在彼得格勒各區的工人間盛傳着「莫斯科事變」的謠言，屢次迫得工人團去詢問莫斯科的同志，而每次些傳聞都是無稽之談……有許多工廠常報工人團說工人憤激的情緒異常高漲，照工人團的通訊員的報告看來，工人的情緒高漲到這種程度，甚至連小小的吵鬧，一小塊的鐵片下落，便可使工人立刻關車，擁向門外去。同時在城市中散佈着奇怪之謠言。」情勢是十分嚴重的了。當時革命的情緒與一九〇五年及法蘭西大革命之前夜的情緒完全一樣。法蘭西大革命前法國全國佈滿了大盜將至的謠言，即所謂「大恐怖」人民驚慌萬分，但在實際上却一點事實也沒有，純粹是無稽的謠言。重要的就是這種情緒不僅在工人之中而且還波及到軍隊中去了，「一九一六年秋彼得格勒李西尼午工廠罷工時，工人去阻攔別廠工人上工，警察來驅散他們。在新李西尼午廠之左右集聚了特別多的工人，廠旁爲一百八十一後備步兵團的營房，工人與兵士的關係是非常友善的，工人羣衆中，並且有兵士在內。據說是克羅衣辯夫的騎兵團的傷兵，當警察開始橫暴起來以鞭棒打擊羣衆之時，在隔離旁觀的兵士，忍不住了，衝擁而出與工人共同驅逐警察。當局調了哥薩克騎兵來逮捕兵士與工人，但是哥薩克兵

有行動，他們便退走了。兵士之擾亂使得軍事當局驚惶起來了，各級長官都到營房中去，一八一團中的『鬧事人』只在深夜點名歸隊之後才把他們逮捕，捕了一百三十人，并以交法庭懲辦恐嚇之。』

現在我要再說一說，這種革命情緒的物質基礎，並將這月來彼得堡工人階級的客觀狀況加以簡短的分析。你們該記得當我引用雪得洛夫同志的圖表的時候，我曾經說過工人羣衆之最革命的份子一方面是五金工人，另一方面則爲大工廠中的工人，首先就是彼得堡的工人一般的增加：一九一四年九月，一九七、〇〇〇人，一九一五年九月三〇五、〇〇〇人，至一九一七年正月到四〇〇、〇〇〇人，即比一九一四年九月增加了二倍多。這些工人怎樣分配的呢？自然，大多數都是五金工人，這是不難明白的，因爲彼得堡是五金工業的主要中心。五金工業的百分數是很大的，五金工人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七〇。工廠的比例是：在一千以上的大工廠的工人佔百分之七六·七，在一萬人以上的最大工廠中的工人佔百分之二二·八，因此集中在彼得堡的工人羣衆，其絕大多數都是在最革命的隊伍中——他們是五金工人與大企業中的工人，這是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六年秋天的工人運動的基礎。但同時，因爲無產階

級的羣衆運動，無論如何不能不影響到非無產階級的羣衆，特別是那些易受感動的小資產階級，故很快的便把那些青年學生拉到自己方面來了。一九一七年正月十二日莫斯科的學生照常地慶祝了大學節，但他們在慶祝會上所唱的却盡是革命的歌曲，副市長親身來了，並懇請他們只唱一次「天佑沙皇」之歌，但是終於未允！

第十講

在一九一七年春一切革命的成份都已經具備了。自以運輸破壞而起的經濟的大破壞，有同樣大的工人的聚合，而且是最革命的工人，五金工，大工廠中的工人，總之，至一九〇七——〇八年及以後革命運動所不會有的條件，現在都已經具備了。但是却缺少極有作用的一點，就是缺少在一九〇七年出現於政治舞台上的那個政黨，就是缺少那領導第一次革命的政黨，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他能夠領導第二次的革命。初時因為這個政黨不會出現於舞台之上，遂使舊制度多受八個月垂死的苦悶。這種苦悶對於國家的犧牲是很大的，特別在加深經濟破

壞的意義上。并因此而要進行第二次的開割（有時是這樣，割治未愈，重新發炎，再作第二次的開割），而這種開割當然亦可以省掉的。其所以如此者，當然不是上帝的意志，一部份是因為那俄國的執政者之自覺的支配，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之間凶殘的剿殺布爾什維克，不僅把布爾什維克黨人禁錮於獄中，充軍於西伯利亞，流逐於海外，而且還要消滅布爾什維克的思想，沒有一種出版物，會像布爾什維克的出版品一樣受到那樣嚴厲的搜查。我們在巴黎警廳的文書庫裏面，找到了一個很奇妙的文件，該文件是一個偵探也許是領巴黎警廳的俸金的文人所做的，該文件敘述布爾什維克的出版品在工人羣衆中的影響是如何的偉大。那裏關於我們當時所出版的那些公開的和秘密的書籍，還有一個很詳盡的目錄，並附帶地指出其害處，由此可知，羅曼諾夫朝（羅曼諾夫朝失敗後其海外的友人也是如此）直至最後一分鐘，也還在進行着自覺的爭鬥，來防止以列寧爲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境內之出現。在我們研究第一個革命時所分析過的那種力量，我現在又要談到了。當時我們曾經費了好幾分鐘的時間去講這個反動的力量，并欲說明他的本身究竟是什麼東西，現在我也想如此

講一講。

俄國統治階級內部因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間的利益對抗所造成的裂痕，促進了一九〇五年的爆發。但是這種的仇恨是不很深厚的，因為資本家很快地感覺到由羣衆方面來的危險。因此，他們便沒有分裂到底而終於合作了。一九一六至一七年冬間的情形，其特點就在我們的統治力量，可簡稱之爲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不論地主與廠主，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在他們目光中這個羣衆運動爆發的危險已經完全沒有了，以爲史托里平的流血時期之後，再不會有羣衆運動了，我不知道，曾經看到一九一四年夏天彼得堡工人運動的人爲什麼會有這類的夢想，但是這種夢想實際上是有的，米留可夫對伯烈烏魯而且曾經公開的承認過這一點，米留可夫的話，你們可在我們的文章中讀到，這確是很好的證明。米留可夫說：「這點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而一切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行動也都證明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工人羣衆的進攻。這是我們以後要再加分析的。我們還沒有把這個革命詳情細目都弄得清清楚楚，我們未曾澈底明瞭，到底爲什麼資產階級會有這羣衆運動的爆發是不可能的奇怪觀點。但是事實是有的，這事實且爲米留可夫所承認，即當時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政策也完全是如此。因爲羣衆運動，所以在一八〇五年沒有敢於分裂到底，但是現在這種勇敢心是有了，

二月革命雖不是當時上層分子中的鬥爭所引起的結果（二月革命究竟是什麼東西引起的你們當然知道）。而這鬥爭却使她容易了許多，這些上層分子已經完全忘記了世界上還有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存在，忘記了這個無產階級能在一個很好的機會中握住爭鬥者雙方的衣襟，把他驅逐到他們所不願的地方去。

普通都把一九一六——一七年冬間所發生的事情寫成純粹的宮庭之爭，但是當時直接觀察者柏烈烏魯，已經很清楚的看到爭論的根，還要深得多，這爭論除了宮庭之外，還為幾種社會的（照舊法說）力量所注意。若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分析的時候，很容易發現，根本的矛盾在什麼地方，在表面上好似進步派與專制派之爭，以個人論則為米留可夫、顧起可夫與拉斯普丁間之爭。進步聯盟派是在一九一五年實際上已經掌握了政權的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資產階級用『特別會議』的方法來把戰時經濟握在手中，在國會中他們組成了一個聯盟。極左派從立憲民主黨起，極右至民族派止。這叫做進步聯盟，表面上，似乎是進步派與專制派（以拉斯普丁為代表）間的決鬥的樣子。重說一句，這僅是外表……實際上矛盾要深遠得多。一九一七年冬間的爭鬥，便是那一對敵手之最後的決鬥，這雙敵手的爭鬥成為

俄國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俄國歷史的基礎。這兩種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俄國的領地上是永遠不能調和的。在戰爭之始，商業資本是欣悅的，奪取海峽的任務是商業資本主義的任務，這是俄國爭奪商業道路的時期，但是工業資本起初對於戰爭是異常的冷淡的，後來因為戰爭是俄國工業的大市場，可得更高的利潤，工業資本於是便慢慢的興奮起來。另一方面則俄國一切的出口都停止了，商業資本對戰爭的性情於是也漸漸的消滅。只要三四個月便能以光榮的勝利來結束這次的戰爭，商業資產階級這種希望完全沒有實現，一九一四年的收穫也損失了，一九一六年的收穫又沒有運輸到國外去。因此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主義間的利益便互相倒置起來。戰爭愈久，工業資本愈有興趣，商業資本則愈感覺困難與痛苦。這一點，在代表工業資本的進步聯盟，與代表商業資本的宮庭貴族彼此間的互相關係中表現得清清楚楚（因地主是商業資本的代理人，故宮庭貴族能代表商業資本。）

停止戰爭，好使俄國糧食運輸到國外去思想，一天一天的有力起來了，當然，有兩件事實可以使得商業資本變得和軟一點，第一就是收穫之減少，一九一七年的收穫降至三〇——四〇%（大麥小麥各不同）而其次則為軍事供給的貧乏也使得他更加軟和。無論如何，出超

之停止，出超變爲入超，這一點不僅使商業資本異常不安，而且還使俄國資本主義一般的積累都恐慌起來。工業資本對於這一點要鬆懈些，因爲他有大批進款到自己的袋子裏來，但若以整個的俄國資本主義來看，那就要成問題了。故從整個的看來，那就應該給那種和平的傾向一條出路，這種傾向，在戰爭開始時就已經見到，可是一點回響也沒有得到。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之大戰與一切的大戰爭一樣，一方面作公開的軍事行動，另一面，則進行秘密的外交手腕。這是現在誰都不會懷疑的了。在克里姆之戰時，在拿破崙之戰時，都是一樣，和平問題幾乎在宣戰後一天已經提出來了，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初我們已看到德國政府請求美總統威爾遜爲調人來與英法俄，協約國作和議的談判，對於這點，不將多說，非常有趣的，但是尼古拉第二，與喬治第五是消滅這第一次和平企圖的人物。這和平的企圖發生於在開戰後一月半以後。在一九一四——一五年之十二月與正月間（英法及俄國間對於海峽的協定，這是在一九一五年三月訂定的，英國真是咬牙切齒的簽了這協定，這從英國的通諜中可以聽到）在一九一五年秋——一九一六年夏（德國企圖以日本爲調人來進行談判），都曾經使用種種的方法來恢復和平的企圖。總之，這種企圖充滿了整個戰爭時期，這

點連協約國亦不否認，因為這是由德國方面發端的，德國是永遠注意着的，他常與某個國家談判和平問題，當然，對俄國亦曾做過這類的談判。在一九一五年春，尼古拉之妻已經有信給尼古拉說，他得到她哥哥愛而甯的信說：他已經派了親信人到這個人那裏去。信到尼古拉的妻子處，已經遲了一點，因之她很嚴重問尼古拉道：怎麼辦呢？這個親信人已經在斯多各爾了，而你却不在，你在前方，我很怕因此發生誤會。愛而甯之苦悶，即在委任愛而甯進行談判之破壞。這封信尼古拉在佔領彼利美書約之後才接到，這次的佔領是戰爭俄國惟一的大勝，而尼古拉當時的情緒是非常的好戰的，很明顯的，他拒絕了這意見，甚至還勸告她說：「夫人，下次關於這一點請你不要再寫吧！」至少，在以後的通訊中，我們沒有看到阿歷山大·菲獨洛夫娜談到她和她哥哥通訊事。但她與她哥哥的書翰往來那是無容置疑的。這也許——不僅也許，而且一定是——就是尼古拉在夏宮被捕後所燒掉的那封信。這在尼古拉的日記中可見到。日記有兩行說：「撕燒紙片……：……撕燒紙片」。克倫斯基對尼古拉個人的文件，不但沒有把他包封起來轉交臨時政府，并且還「不小心」的自由處置。現在被他收拾清楚了，因之尼古拉在戰時的「秘密外交」文件，就沒有遺留下來。文件雖然沒有，但

在許多事變之間，却不能沒有蛛絲馬跡之可尋，——譬如一個大貴族之妻伐西爾起可瓦之到彼得堡，這個人對宮庭方面是很親近的，而我們則知道她是帶了德奧外交界方面一定的使命而來的。伐西爾起可瓦在夏宮，離皇宮不遠。她很细心的注意拉斯普丁的動作，使亞歷山大·菲獨洛夫非常憤恨。總想設法驅去之。把伐西爾起可瓦從彼得格勒驅走的真正原因正如菲獨洛夫所說的一樣伐西爾起可瓦坐在亞歷山大的宮中「像貓兒」一般的觀察我們所做的事情。無論如何，其間特別是很明顯的，更明顯的，就是潑路托樸樸夫（他後來被亞歷山大·菲獨洛夫及拉斯普丁推薦為內務總長及後補內閣總理）在斯多克各爾訪問德使館的顧問瓦而蒲而的事情，這件事稍一不慎未能嚴守秘密，各報館便一概登載出來了。偶然的事情是不會有的，很明白的，不僅德國在主觀想進行和平的談判而且在客觀上他也已經找到了與他談判和平條件的人。

但是其詳細情形，我們還不會知道。我不知為什麼直到現在我們還不能夠在德國的文章中找出一些材料來。德意志共和國所宣布那些文件，只到一九一四年為止；這是很奇怪的。而在一九一四年之後的事，我們就不知道了。我祇能舉出事實：無論如何，談判是有過的。

在俄國方面主和者的大人物（這是從文件中知道的），就是實際上自一九一五年秋起的專制皇帝——拉斯普丁。我雖然怕被人譏笑和誤解我是站在『老翁』派的觀點上的人。但我還是要承認，在政治上，在商業資本這一派人中就是在專制派中，拉斯普丁是最聰明的人。不要笑他是一個文字不大通順的農民，他不是一個平凡的農民，他的不平凡處，就是他最初沒有抗議反對的話（這當然是過份的）但是他仍以戰爭為不幸，他很深刻的諷示說，有人把尼古拉及亞歷山大推到不幸中去了，很明顯的，他是知道主戰派及俄國總參部的挑釁政策的，他很憂慮的問自己及其屬下，那些引起戰爭的人對我們有沒有幫助呢，後來看到他們是不會有幫助的。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當俄國已經潰敗了，拉斯普丁決然的說，戰爭毫無益處的，塞爾維亞之不值得幫助正與保加利亞一樣等等。這一點從亞歷山大·菲獨洛夫給尼古拉的信中便可知道。因此柏烈烏魯所暗示的德國金錢實已毫無需要，拉斯普丁并不要錢，因為他手下的人是世界最富的人，雖沒有德國的金錢也能使拉斯普丁成爲俄國方面和平政策的中心。這和平政策的基礎，很清楚的是引起戰爭的商業資本主的客觀的利益。沒有出口，沒有對外貿易，住在一個四不通風的匣子裏，商業資本是忍受不住的。在十九世紀中葉克萊姆戰爭時

他已不能忍受，在一九一六至一七年冬，他亦不能忍受的。但是他不能放棄戰爭的捕獲品，即不能放棄海峽，故與德國一切談判之所以決裂的原因，也就是爲着這個問題『上海峽如何解決』？土耳其是德國的聯盟者，德國當然不願出賣土耳其。

戰爭愈久，德國的情況便愈困難。我們知道至一九一七年時同盟國（德、奧、保加利亞、土耳其）的情況已經是困難不堪了，關於這一點從趙而審論不列斯和約的雜記中很可知道。土耳其的情況愈壞，則他對這個方面也漸願讓步。在一九一六年秋在彼得格勒流行着一種謠言說，和約在日內就可簽字了，俄國在某種條件之下（何種條件不知道）得到海峽，並以此退出大戰與德國單獨講和。德國的領導者也希望如此，關於這一點在二月革命時代我們復得到了一點多少可靠的消息，二月革命對於德國的資本界，特別是銀行界發生了一個沉痛的感想。德國的一個銀行家對俄國的通信員說：『我們希望在不久之內，可以結締和平條約，但現在這種希望又落空了。』至於革命在實際上快要締和約這一點，却沒有爲銀行家所了解。羅曼諾夫與德國的和約究竟在什麼條件之下訂立的。關於這一點，實不值加以推斷。我的推想是如此：這和約根據俄德在一九一三年秋天關於海峽的談判而訂立的，但是這點你們

可不必注意。

祇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就是沙皇政府的上層份子已經走上了和平的道路。並且他在一條道路上必然的要與當時的好戰者發生衝突，這一點也是很顯明的。

商業資本又要如一九〇五年一樣重新與工業資本衝突起來。當時他們沒有分裂到底，就因為顧慮羣衆運動，現在他們偶然地把羣衆運動忘記了，而決定分裂到底，尼古拉的計劃在苦爾樂夫的雜記中寫得很清楚；其計劃就在解散國會，發表給農民以補充田地的宣言（即進行脫利巴夫在一九〇五年秋天所夢想的那種舉措）同時並宣布全俄民族一律平等，好使猶太人滿意。因猶太人在沙皇政府看來是主要的革命力量。白黨至今還是如此估計如此觀察俄國的革命，這是誰都知道的。故對猶太人的平等待遇和給農民以補充的土地，由尼古拉與其親近看來，定能得到羣衆對專制政府的同情。在這個基礎上於是便可解散議會和訂立和約。這就是說有了和平，土地與民族平等了。這個計劃是在三月間擬定的。無論敵方是否知道這個計劃，但是他已經決定用反攻的手段來抵禦這種攻擊，反攻是應該採用非常堅決的行動。當然，善戰者不僅是工業資本，而且那些親身作戰的高級軍官也是非常之好戰的。因之以進步

聯盟爲代表的工業資本便很容易的在軍官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者、有力者，甚至於如總參謀部部長亞歷西亦夫將軍亦參加於謀叛之中，這些軍官是此次謀叛的助手，他們都組織在進步聯盟的周圍，而以立憲民主黨，爲其神經機關。這個謀叛有許多人都知道。斯略潑尼可夫同志在他的書上很清楚的說道：

『有幾個進步聯盟中人知道謀叛這件事。他們指出這事的中心人物爲苦腦凡樂夫、顧起可夫與貴族開里爾，而在軍官中，則彷彿是克留姆夫，他後來參加過科羅尼夫暴動，失敗後爲克林斯基內閣所槍斃，參加這件事的有齊黑也德矣、史各比里夫、齊亨格里與克倫斯基，他們不僅知道這件事，而且與其他人一樣希望挽救這個宮庭的政變。前任勞動總長格俄史基夫告訴我，在軍事工業委員會及齊黑也德矣派之間爲了國會開幕宣言的問題發生了決裂。史各比里夫不僅不滿意宣言的內容與戰爭問題，而且還不滿意於這些問題的發生。國會中的孟什維克懼怕民衆運動損害宮庭政變的計劃。這種關係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孟什維克非常混亂。我記得每次碰到齊黑也德矣的時候，他總含含糊糊的，他在這「含糊」中自有其自己的邏輯，自己的『路線』。在戰爭時，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的黨團完全脫離了羣衆，落於資產階

級的反對派的營壘中去了。』

因此，可見在進步聯盟內還有立憲民主黨的更左派和工商業委員會內的保護祖國的孟什維克派都參加在內。這一點很值得指明出來，因為敵方從這裏會下了第一次的打擊。

這個政變的計劃却是很簡單的。也是這樣的，克留姆夫將軍率領其軍官隊去進攻沙皇到前線去的專車，捉住尼古拉迫其簽字讓位，不然則如但尼金在回憶錄中所說一樣，『將他殺死』。殺死之後則立小『亞歷山大』爲沙皇而以米哈衣爾·亞歷山大維奇（他是尼古拉之弟弟）爲攝政王。他以後自稱共和派，爲當時大貴族中最自由主義的人。他應該在實際上成爲沙皇。而名義上則以多病的幼孩充之。當然這小孩不會管理國家大事的。以後則應任命國會派的內閣，即進步聯盟的內閣，俄國在不久的時期內應實行資產階級的國會制。

這就是謀叛的計劃。敵方沒有知道這些詳情細目，正和進步聯盟之不知道沙皇政綱的詳情一樣（我們亦只從苦腦樂夫的筆記中才知道）。但敵方總是揣度着，那裏在準備什麼，因此採取了許多方法，來制止敵人。第一步，就是逮捕已經任命爲內務總長而且實際上是當時的內閣總經理潑魯多巴泊夫，並逮捕工商委員會中的工人團。工人團是進步聯盟與羣衆間的

聯絡者。因此最初就要破壞這個聯系。更進一步就應該解散國會。但是這步後來實行，在革命的高潮中才實現。因此便沒有意義。至於那關於猶太人平等及土地的宣言，則未頒布。因為彼得堡的工人不會給他們時間。

上層份子的決裂對於二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專制政府這樣快的崩潰了？為什麼不像一九〇五年一樣的長期的抵抗呢？這就是因為在這個時候，執政者內部都在那裏準備宮庭政變之故。當時彼得格勒的守衛軍是第二隊的新兵，是沙皇軍隊中最革命的一部份。在彼得格勒祇有後備軍。其中大多數是新兵，在彼得格勒及其四周，人數達十七萬以上。據各處來的消息看來，就可知道這是準備將來宮庭政變之用的軍隊。至於這十七萬人會落到工人手中去，這是誰都沒有想到的。因為對於工人誰都沒有計算到，誰都沒有以為他會有什麼進攻的行動。關於這點，不再多說了。事實是如此，對於工人之進攻是沒有預料到的，但是，這新的政權（即攝政王米哈米而，沙皇亞歷山大，及進步聯盟的內閣等人的新政權）究竟將要依賴誰呢？當然要依賴現社會中那班青年。這班青年的情緒是非常之仇恨專制政府的。你們該記得，學生在那大學節所唱的還只是革命的歌。新的『革命』政權應該

建築在這部份羣衆之上，故後來當米留可夫看見這部份軍隊的槍尖倒轉來反對進步聯盟的時候，你們便可想見。米留可夫是何等的酸鼻痛心。雙方都聚精會神的準備好了，一方面要解散國會，另一方面則要逮捕尼古拉。事變已經在工作日程中準備好了——他們的工作日程就是在三月中迫尼古拉讓位——而正在這時候就產生了彼得堡的爆發，這個爆發完全出乎雙方的意料之外。雙方都沒有預料到，謀叛只做了一半，只做到殺死拉斯普丁，拉斯普丁之被殺無疑義的是謀叛中的一部份，但是這樣一來就引起了對方的注意，以至毫無勝利可言。因為拉斯普丁只是實際上的沙皇，在法律上他并不是全國的元首。故拉斯普丁之被殺對於強迫尼古拉讓位及他們以後的計劃之進行。當然要便利得多，但是他們終於沒有做到，這就是因為二月革命已經爆發起來了！

這就是彼得堡能夠這樣迅速勝利的條件，最堪注意的，就是：這時布爾什維克還站在武裝暴動千里之外。斯畧潑尼可夫在其回憶錄中說，他甚至還阻止工人武裝隊的組織及工人武裝。

這是千真萬確的。他曾勸告工人去宣傳兵士。宣傳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好，宣傳兵士與工

人自己的武裝是兩件并行不悖互相補助的事情。無疑地，假使二月底沒有工人在彼得堡街赤手空拳之進攻，則決不能吸引兵士羣衆到這個暴動中來。兵士被吸收到工人羣衆中去了。自然，工人羣衆便成爲當時情況中的主人，他使爭鬥的雙方，在革命之後一日，即陷於極大的恐慌之中。

我很怕我這講之上半節所說的詳情細目，會使你們對於根本問題的了解發生模糊。情況是這樣的，工業資本希望繼續戰爭并藉此推翻尼古拉。另一方面則爲希望和平的商業資本其代表人物爲大貴族、宮庭貴族，及尼古拉自己，而實際上的首領則爲拉斯普丁。因爲戰爭把商業資本幽閉在密不通風的匣子裏，毫無存在之望。沒有麥類之出口，商業資本還能成爲什麼商業資本？正在這兩種資本的決鬥中露出了無產階級有力的鐵腕，把他們都驅逐到很不舒服很不安逸的地方去了。最初這些帝國主義的上層份子的代表的狀況（不論工業資本或商業資本）都是絕望的。這種絕望布滿在米留可夫與柏烈烏爾的談話中。這段話我在這裏不再引用了。一切彷彿都已經完了！所餘者，只有自爲慰藉，自己慰藉了無數次，還要欺騙外國，他們並企圖和外國這樣的說：進步聯盟雖沒有把這次叛變澈底做成功，然革命却正是進步聯

盟的勝利，革命是反對勾結德國的賣國賊亞歷山大與彼獨洛娜，及主張和平的尼古拉之愛國爆發；一團一團的兵士陸續的到國會表示其敬意。并願以愛國的熱忱繼續戰爭。一直到勝利爲止。

爲消滅這些毫無根據的謠言起見，最好讀一讀路特靜哥自己在將死之前，在一九二一年所寫的回憶錄。路特靜哥這樣寫道：「二月二十七日，那革命之第一日，不知在誰的命令之下，彼得堡之守衛軍兵士開始捕人……（不是那個政府機關捕人，而是彼得堡的守衛軍兵士捕人！）……」第一個被捕的大官僚，就是國務院院長悽特洛維托夫大羣的兵士（如沒有記錯的時候，那便是普列奧布拉仁斯基團的兵士）把他押到我這裏來，我當時爲此類行動所驚愕，因我并未發過這類命令，我便請悽特洛維托夫到我的辦公室去，但是這些兵士頑梗不放，說他們要把他帶到克倫斯基或工人代表蘇維埃去。當時我便試用我的權威，要兵士們立刻服從我的指揮，那兵士們便圍繞着這個俘虜，用最狂暴的態度把自己的槍械對指着我，以後我便不知道把悽特洛維托夫解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件事就成爲我與工人代表蘇維埃第一次衝突的原因，以後也就和緩了，因爲他把悽特

洛維托夫放了——即簡單的交給羣衆自己去審判，因之就把他臨時的押在國會的內閣閣員室內，而後來則由臨時政府的命令幽禁於彼得羅堡伏而監獄。』

『三月二日斯米而諾團全體兵士（然官長極少）到國會來見議長，當我致歡迎辭之後，彼等便大聲鼓掌，在我的室內高呼「萬歲」當時在我的辦公室內國會臨時委員會正在開會。

我演講之後，國會議員走齊黑也德矣便立刻出來說話極力的誹謗議長的演說，并叫斯米諾夫團人要求我，真確的說明我對於在俄國建立民主共和國及解決土地問題的意見，當我重入大廳時，斯米諾夫團兵士情緒已與先進時完全不同了。且有非常進攻的心理。但當時被議員齊黑也德矣的演說所激動起來的兵士，却又被解決此項問題之權，不在議長，亦不在臨時政府，而在立憲會議等等話頭所平靜下去了。

三月三日第二艦隊的海軍士卒亦整隊示威於國會之前，他們的情緒更加激昂，而且是少年軍官，剛補海軍少尉的青年們所領導，在這演講廳中舉行了極熱烈的演講，有一個演講者當我不在場時，毫不容情的說，我亦是值得槍斃的「有產的」，海軍兵士們也彷彿是不反對執行這一點。』

這是我們在革命後四年，在法國報上所讀到的賴特靜哥的回憶錄，這頗值得我們對賴特靜哥鼓掌。你們須知這種鼓掌有非常的特點。很明顯的，這時候政權是在羣衆之手中，而真正的主人就是羣衆的組織者工人代表蘇維埃。我在自己的論文中曾舉過一個例子，我更可舉一個別的例子。你們知道書爾金及顧起可夫曾向尼古拉取退位書。起初這個大典——即將尼古拉的退位書取至彼得堡來——賴特靜哥很想自己去做，因此他使用國會議長的權力要求專車。沒有給他專車，他就派了自己的副官到工人代表蘇維埃去要車，車沒有給他，因之賴特靜哥就沒有走成功。而且書爾金與顧起可夫亦只是因爲怠工的原因，才能走掉。他們到了車站，一個工程師以私人的關係，給了他一輛火車，偷偷的跑出了彼得格勒，絕不像正式政府的代表堂堂皇皇走的。

因此，工人代表蘇維埃便成了彼得格勒的主人。對於在當時彼得堡是否能組織工人政府的問題，我們可以堅決地回答說：假使那時候列甯在彼得堡，假使那時候有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機關在彼得堡，假使布爾什維克能參加這次革命，那當然可使俄國人民不經過第二次的革命（十月革命）不再犧牲無產階級的鮮血。便可立刻創設那一九一七年十月後所創設的制度

的。其所以不成功的緣故，就是因為那些在工人代表蘇維埃內偶然居領導地位的智識份子。大部份都去極力的幫助他人實現宮庭政變的計劃去了。照詩畧潑尼可夫的話看來，甚至於彼得堡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也主張組織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的聯合政府。換言之，即主張組織那非但不能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甚至不能代表貧農利益的政府，因為社會革命黨，誰都不知道他是個富農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彼得堡布爾什維克黨人竟居然以為聯合形式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你們在此須明白當時彼得堡的布爾什維克正是這些智識份子的極左派。假如他們所企望的聯合政府不能算做革命的政府，那麼對於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還有什麼希望呢？他們簡直直接地說：假如不讓立憲民主黨參加這聯合政府，則一切的事情都完結了。沙哈諾夫這樣的寫：『只有資產階級的政府才能夠代表沙皇政權應該以國會的「進步聯盟」的政權來代替脫利已夫與拉斯普丁，必須照這個方向去進行。否則政變便不能成功，革命就要失敗。』

沙哈諾夫這幾句話及其筆記中其他的話，列甯在臨死前一篇論文中曾加極嚴刻之批評。我并不想對沙哈諾夫個人說什麼壞話，我只將他的論文略引幾段出來描寫當時那些領導工人

運動的上層智識份子的意見。沙哈諾夫的筆記中說，他們在皇宮內輾轉徬徨不知所從，最後決定與他的兄弟們一路到路利克那裏去，尊敬地說：『請你來統治我們吧！』。米留可夫當然很歡欣的接受了。後來這不但是應該的，而且是必要的了，而米留可夫、顧起可夫等等的『革命家』，就很高興的來領導俄國的革命，他們領導這革命是為達到當時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目的，無論如何要繼續戰爭一直到戰勝為止。拉斯普丁的和平主義並不是受了德國的金錢的引誘，第一個革命政府為什麼會堅決的站在帝國主義戰爭繼續到底的觀點上，這並不是協約國用以組織政府的是最合式的一個人。因為他一方面有羣衆之信仰，而另一方面則照着帝國主義的道路，是協約國忠實同盟者，所以他要繼續戰爭一直到戰勝為止。因此實可說臨時政府是沙皇政府外交政策最忠實的遵守者。同樣十分明顯的，彼得堡的革命首先便是反戰爭的革命，這點連沙哈諾夫亦見到了。他決然的說，在二月彼得堡的露天大會所叫的喊聲都是『反對戰爭』。這就是因為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受了『青墨瓦爾的訓練』的緣故，但在實際其原因當然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比俄國資產階級更能代表俄國整個的國民經濟的利益之故，他不能不清楚的了解到：戰爭會使整個國民經濟陷於滅亡，陷於破產，俄國的無產階級

的論調是快要滅亡的俄國的經濟的呼聲，俄國最覺悟的勞動者，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不能再戰，因為繼續戰爭，就是完全破產。至於後來戰爭又繼續了八個月，這就使得經濟恐慌越發加深。如果戰爭在二月間停止了，那破壞一定可以少得多。應該起來挽救俄國的國民經濟，俄國的無產階級負了這個責任。用舊式的說法講呢，這就是他在俄國革命中之偉大的歷史的使命。他的確把俄國的經濟挽救起來了。這一點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把他實現。

因此彼得堡無產階級羣衆對戰爭的態度是非常的堅決的。祇有一部落後的羣衆中，祇有在軍隊中還有一些幻想存在着。歐洲的（協約國的）新聞記者在說明俄國革命的意義的時候，他們把所謂彼得堡守衛軍之愛國示威這點放在第一個位置上。但是你們從我們所讀的賴特靜哥的那段摘錄中你們就可知道這示威的意義何在。

戰線上情緒如何呢？在五月四日（革命後二個月）在彼得堡所開的軍官會議，曾把他下了一個總結。這還在布爾什維克的廣大的宣傳煽動以前。布爾什維克宣傳的第一次勝利是在五月三十日的第一次的工廠委員會代表大會上。這便是俄國非黨大會以絕大多數通過列甯、季諾維夫的布爾什維克的決議的第一次。而在五月四日（即布爾什維克第一次勝利前三星期）

各軍軍官會議已經把二月間在戰線上所發生的情景下了一個總結。所以我們如從這次的軍官會議上的情形去描述俄國軍隊中之情緒，可以完全不注意布爾什維克的煽動。煽動還不會有，還不會廣大的發展起來，他還沒有完全奪取彼得堡的無產階級。而同時西北戰線總指揮不魯西洛夫將軍關於自己的部隊的情緒曾經這樣說過：『有一團兵士說，他們不但不願進攻，而願望退出戰線，解甲歸田，委員會起來反對這種傾向，但兵士們要驅逐他，我勸導了他們很久很久，然後再問他們是否同意於我呢，他們要求讓他們以書面答覆，經過幾分鐘之後在我面前豎起了一面大旗：『無論如何要和平，反對戰爭。』』

在以後談話中，一個兵士告訴我說：『大家都說不要割地；在我們要這座山幹什麼呢？』我回答他們說，『這山對我亦沒有用，但是我們要攻打這座山上的敵人。』

結果，他們願意停止不動，而拒絕進攻，理由如此：『我們的敵人很好，而且告訴我們說：如我們不進攻他們，他們決不向我們進攻，我們重要的，是要回家鄉去，得到土地與自由，戰爭幹麼呢？』

這是簡單的農民的口吻，但是這證明戰線上的兵士亦不願戰爭，這是關於某團兵士的

話。不魯西洛夫在後面亦說到：「在駐紮於防守方面的一師，當要調動他們到進攻方面去的時候，他們不願移動，希望留守，同時並電各處。」

以後就是別一個司令特辣洛米洛夫將軍發言。「軍隊中的情緒都希望和平。凡是宣傳不要割地並給人民以自決權的極易在軍隊中得到信仰。對於「不割地」的口號有種特別的了解。愚笨的羣衆不懂各民族情況之不同，常常問道：「爲什麼協約國的民主派不同意與我們的宣言呢？」對於和平企望非常懇切，甚於有時不肯拿武器，「要我們幹嗎？我們不願戰爭。」工作停頓，必須要設法使得營壘中軍裝完善并須修築道路。」

以後就是詩爾技却夫將軍演說：「我就任不久，但已將部下軍隊檢閱一周，對於軍隊之思想狀況與戰鬥力的感想，適與以前各位所詳細說明者相同。其主要的原由即在羣衆的缺少智識。」

我所引用的這些將軍們的解釋都是很可注意的。至於對於下層羣衆的希望，則尙要加以解釋。如爲什麼西歐的民主派宣言說，不要賠款不要割地呢，這是很有道理的問題，但將軍各米洛夫却以愚蠢來解釋了，而詩爾技却夫將軍則以羣衆沒有受教育來解釋。「他們沒有受到

教育，當然不是他們的罪惡。這是舊政府根本的破產。內務部瞪着眼睛看着國民教育的問題，但是不懂得嚴重情形，我只指出俄軍之最好的一師（當然是十六師）在過去爭戰中所號稱『鐵軍』的那一師。把這一師調往前線進攻。他們不願進攻，不願做準備進攻的工作。在其附近的射擊師裏面亦發生同樣的情形』等等。不再摘引別的摘錄了，有一個總指揮會講到：『在斯文斯基之前，德國兵士開始和俄軍親睦起來了。有一個軍官想阻止並破壞這種親睦，被兵士把他驅走了。』而他的兵士（彼亞得哥爾斯基團）整夜追索他，想殺戮他。』這點特別可注意。因為他發生在革命後的第一星期內。布爾什維克的煽動，才着手進行反戰爭情緒，就在戰線上發展起來了。

更有甚者，就是在尼古拉的日記中亦有證據證明這點。尼古拉敘述他為什麼簽名讓位的理由說：『在使兵士們能在前線上安心作戰！』很明顯的在尼古拉讓位之前，從戰線歸去的企圖早就已經有了，而在沙皇四周的軍官也對沙皇說：陛下，因為你同德國人眉目傳情，所以前線的兵士不願戰爭了。無論如何，在尼古拉讓位之前，下列的事實是有的，軍隊不願戰爭，軍隊希望和平，前線開始潰散了。講十月革命的同志一定會告訴你們，就是一九一七年

夏天臨時政府的政策是一種偉大的（而且是暫時成功的）用電氣蘇醒戰爭的屍體的政策。米留可夫及利伏夫在這方面的才能要小些，因為大概都知道他們是韃靼海峽派的同情者。在這個同情韃靼海峽之基礎上他們在四五月間被逐了，你們知道，他們是與顧起可夫等同時被逐的。因之柏烈烏魯所指出的一點不是徒勞的，造成『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為首的『社會主義』政府亦不是徒勞的。這政府以繼續戰爭為自己的第一個任務。這政府是為了繼續戰爭而組織的。他開始逐漸的準備六月的進攻。這六月進攻是七月事變的推動者。繼續戰爭是克倫斯基混合政府的第一個任務。這政府的組織是把俄軍從那種混亂的狀況中挽救出來。我在『宣傳煽動雜誌』上所公佈的克倫斯基至路易喬治的信就證明了這點。克倫斯基在進攻失敗之後，一九一七年九月間在給路易喬治的信上這樣寫道：『從共同事務（克倫斯基與路易喬治的共同事務！）的觀點上看來，俄國的情況是十分艱難的，但我們認為現在比春天已經好得多了（就是革命後慢慢的好了）。那時在我國的前線上實際上已成爲休戰的狀況——這是「兄弟」口號的宣傳及軍事記律喪失的結果。德卜與他們都認爲必須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并希望抽調一部份軍隊起來反對我們的同盟者，這種情形使人益形不安，臨時政府看清了這種

危險，決定無論如何要消滅這種現象。我們的進攻，雖然先勝後敗，但是其主要的目的——停止休戰的現象與繼續戰爭（繼續戰爭這是最主要的目的！）應該列強最可寶貴的。克倫斯基聯合政府的意義就是恢復戰爭，消滅兵士不願鬥戰的現象。這就是吾黨之所以在其旗幟之上高寫着：『首先和平』的口號的緣故。或者更確切的說，便是要把各民族間的戰爭變為階級間的戰爭，與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樣一來於是便使吾黨成爲當時一般人物（『社會主義』者亦在其列）所恐怖嫌惡的對象，使他們不能不採用各種非常的手段來阻止吾黨的領袖及參謀部之回俄。

我曾在一篇論文中說過（這論文你們大概都不會讀過）列寧由德國回俄的意義即在衝破這反布爾什維克的障礙。不准布爾什維克黨人回俄這點，我有極充份的證據。我當時在巴黎之國民圖書館做事，在那裏我從佛蘭德米洛夫同志那裏得到了第一個關於二月革命的消息，他帶了登載着尼古拉退位等等的消息的『Information』報放在我棹上。這一點是我永世不會忘記的，但在不久之後，三星期之後，在看書的時候，來了一個在圖書館中認識我的（但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是布爾什維克）極著名的協約國派新聞記者潑士業兒，我與他常談

文學而避開政治問題不談。他問我誰是阿歷辛斯基，我很奇怪他不知道阿歷辛斯基，我對這個人下了一個分析。潑士業兒就安靜下來告訴我說：『那很好，但是有人說他是布爾什維克呢。』『那麼爲什麼有人向你說他是布爾什維克呢？』。潑士業兒停了一下說：『有人叫我調查，那些要求回俄的俄僑的政治面目。別人我多少知道一點，而阿歷辛斯基我却不大明白，好像他最近是贊成戰爭的了。但是別一方面說他是布爾什維克。』實際上這人也知道『不准布爾什維克回俄』的口號。而當列甯由德回俄之後，情況便大變了。立即請我們到公使館去說：有車可回去等等。同時在四月中允許了我們，到八月才准我上車。就是說儘量的怠工，不但阿歷辛斯基，就是更左的人亦不要詢問。異常的喜歡布爾什維克回去了，因此立刻改變了政策，布爾什維克到了俄國。

他們的行動，你們可在十月革命史中知道，一部份當然你們知道了，但是我不能不指出一點，當時在布爾什維克黨人面前客觀已經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列甯的頭腦中從外國帶來的，相反的我們有文件可以證明當列甯在瑞士還沒有得到彼得堡及俄國狀況的真實的消息時，當地被報章上的謠傳所隔絕的時候，他並沒有走出完成資產階級

革命之外。這是他在臨行前數日寫給瑞士工人的信。他直捷說俄國是歐洲最小資產階級的國家，他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直接的舞台，但是他希望俄國的民主革命給歐洲的社會革命一種推動。這是馬克思昂克思普列漢諾夫及盧森堡等人的普通說法。當他到了斯托克郭兒姆見了俄國革命的參加者，聽到了俄國的實況之後，才草就那載有社會主義革命的著名的大綱。什麼是社會主義革命呢？實際上這就是把生產轉移工人手中。我已說過俄國革命整個的意義就在無產階級起來保護為戰爭所破壞的俄國經濟。事實比我的說話要具體得多。這是一九一七年五月三日開的第一次工廠委員會大會代表的演說辭。工人伏龍可夫說：「二三月間工人停了工作走到街道上去，消滅沙皇政權。工廠製造所都停止了工作。數星期後工人又回到廠中去了。在此地亦見到許多廠主都爲了自己的命運而自由脫離了工廠。」

「這些工廠都沒有辦公處，那麼辦公呢？在工廠中立刻就選了工廠委員會，在工廠委員會的力量之下，恢復了工廠與製造所之經常的生活。」

「以後，革命便走上了軌道，走得更靜了。逃亡人看到了工人已經不是這樣熱血……：開始回到工廠裏來了，一部份極反動分子，工人就沒有放他回去。其他部份則放他們回去

了，同時亦派了工廠委員會的委員去監督他。因之工人實際上，就成了工廠一切的監督者了。」

生產轉受工人羣衆的監督，起初是自然而發生的，因爲工廠停工了，而工人則不願他停工。你們以後從十月革命史中可以知道，這不是一個短史，而是一個長期的爭鬥，是一九一七年一個極大的過程。工廠主看到了戰爭的結局，戰爭自然地停止了，而戰爭在過去却是一個極大的市場。因之他企圖縮小生產，而保持工廠，等待時機，以便全體開工，就是等待秩序之恢復，革命的消滅。這方面最顯著的事實則爲以斯米諾夫爲主席的莫斯科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歷史。他有系統的隱藏自己的原料，造假報告等等。總之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止他們專門對於自己的生產怠工，因爲他們知道他們的生產對他們已經無利可圖了，而他們的生產的目的都是爲了利潤。資產階級之進行生產不是在什麼清正的思想上產生的而是爲了利潤，所以在工廠無利可圖的時候廠主當然想保全自己的資本，停止生產。他每次恐慌發生的時候都是這樣幹的。在著名的大恐慌（俄國革命時）中也是如此的，爲了要繼續生產，爲了要防止工廠主的停止生產，工人們便不得不起干涉。

因此，二月革命不僅就其消滅沙皇政府及實際上握住政權的羣衆的社會成份看來，是工人的革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必然地在客觀上完全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重說一句，列甯頭腦中的社會主義並不是從外國帶回來的。而列甯偉大的頭腦則只是比別人更好更快的觀察了情況。了解了在那種條件之下，除了把整個的經濟過程轉移到工人手中（這就是我們所講社會主義革命）別無其他方法。因為當時的條件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爲進行這革命起見列甯不能不與那些羣衆爭鬥（如頓河流域苦班及西伯利亞等富農區域內的羣衆）與那些起初讓權於米留可夫的智識份子實行爭鬥，這些智識份子在米留可夫推翻之後，他們便徘徊不進自己既不敢奪取政權，又不准別人奪取政權。最可注意之事實，就是孟什維克在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得到了大多數，但是政權却沒有拿到，而組織了以克倫斯基爲首領的政府。

得了多數而不敢奪取政權，這是該時代內最可注目的事實。這是異常顯明的，那個政權能夠對於一切事變負責，那個政權敢稱當時國內一切的事變爲社會主義的革命，該政權當然是應該起來的。我們的共產黨便實行了這個政權。

民國廿二年六月廿五日出生

俄國革命運動史綱

——實價一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波格洛夫斯基

譯者

吳季蘭

出版者

陳寶驊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街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A541 212 0012 5457B

烏里雅諾夫著

杜畏之
彭葦秋 合譯

定價每册一元二角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下上冊

本書和『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都為烏氏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著作。作者以正確的經濟學觀點來研究和分析當時俄國的農業與工業的狀況。指出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及其趨向。在理論與實際兩方面證明當時民粹派經濟學之錯誤。是後來烏氏一切實際行動策略的基礎。若想對目前中國經濟狀況有個正確的認識，不僅要懂得馬克思主義，尤其重要的是學得馬克思主義之實際運用。所以，我們將這書供獻給讀者，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中國經濟的榜樣。全書共四十餘萬言，除中國外世界各國都有譯本。本書係直接根據俄文本中譯出，間或有參及日文之處。

新生命書局發行

02